

## 卷首语

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是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来的。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是党委政府和文化工作者，尤其是文物部门和地域文化工作者、研究者肩负的历史责任，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应有之义。

说到“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不少政府官员，许多有经济头脑的人，首先想到的是使文化遗产变成可以创造经济效益的物质载体，让文化遗产创造效益，产生GDP。这其实是误读。设立中国文化遗产日的初衷，就是为了宣传文化遗产的价值，唤醒国人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而不是为了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的过程中捞取什么金钱上的好处。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优秀文化的根脉所在，更是一个民族特有精神价值的体现，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复制性。“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关键，是要大力宣传、展示文化遗产的价值，唤醒国人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深深扎在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心里。这样，文化遗产才可能真正活起来，活在中华民族广阔无垠的大地上，活在中国人民的经济社会生活里，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目中。

### 江海文化研究

主办：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

南通日报社

南通广播电视台

编辑：《江海文化研究》编辑部

地址：南通市建设路1号

老年大学内

邮编：226001

电话：0513-85512323

13806291885

电子信箱：2925817828@qq.com

陈小平信箱：\_\_\_\_\_

1134663682@qq.com

电话：13809088108 \_\_\_\_\_

# 目 录

特 稿	
1 如皋长寿历史与长寿文化溯源	徐建平
学术探讨	
15 《红楼梦》与如皋	沈新林
22 雒水才媛咏红楼	三 木
26 濠河文化概论	赵明远
江海文化人	
31 钱嘯秋与钱素凡	宋 方
37 冒辟疆与评话艺术家柳敬亭	黄天铨
39 我与袁运生	季修甫
文史钩沉	
42 读古诗 说古寺	吴希林
46 “利和场”古镇考	季 智
48 关于通州骑岸镇张家沙	殷秀才 高志华
51 难以忘却的名人墨迹	周思璋
56 活跃在《国医砥柱》里的通如名医们	一 亭
民俗民风	
60 沙地庙会	盛永康
63 最后的石器(三题)	夏俊山
家谱研究	
67 陈氏祖训传千年	陈寅生
地名掌故	
70 联吟通州	陶国良
收藏天地	
73 买碗“买”出一首诗	王其银
新作推介	
76 为贾佩峰民间文学笔记选本写的总跋	尤世玮

## 《江海文化研究》

### 编辑委员会

顾 问:李明勋 姜光斗

主 任:李 炎

编 委:

施景铃 沈启鹏 周建忠

徐仁祥 顾 华 陈 亮

吴声和 羌怡芳 陈冬梅

黄鹤群 尤世玮 王建明

陈鸿庆 沈玉成

主 编:沈玉成

副主编:陈小平

封面题字:冯骥才

封面设计:沈 梁

封面篆刻:李夏荣

封面图片:

园博园远眺

贾涛根摄

# 如皋长寿历史与长寿文化溯源

徐建平

【提要】如皋长寿现象源远流长。今日闻名遐迩的中国和世界长寿之乡,是历史长寿现象的延续和升华。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如皋悠久的长寿历史,灿烂的长寿文化,多彩的长寿风情,丰富的长寿物质遗存。第一部分综述如皋长寿历史悠久的史料依据,并遴选三位长寿名贤、三则长寿传奇以示寿史久远之端倪;第二部分完整梳理展示历代县志所载的长寿史实,对其三种反常现象寻根究底,深入研究,得出结论:县志所载长寿人群遗漏了农村,尤其是女性的长寿者;第三部分,对长寿者六种个性特点的归类,即:孝者寿、善者寿、淳者寿、睦者寿、勤者寿、乐者寿;第四部分,展示如皋长寿文化丰富的物质遗存和非物质遗存,包括长寿习俗、百岁坊、百岁桥、寿井、古树及其大量的长寿养生典籍等。全文以史实为依据,汇次群籍,去粗取精,释疑纠谬,较为全面系统地挖掘和揭示了如皋深厚的长寿历史文化积淀。

如皋人长寿,如皋人长寿的历史悠久,如皋长寿文化灿烂迷人,如皋的长寿风情丰富多彩。如皋人亮出的“世界长寿养生福地”这张城市名片风靡华夏,响彻海外。

如皋这块长寿养生风水宝地处长江三角洲一马平川的江海平原,是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县市之一。无论是国际自然医学会认定的其它五大“世界长寿乡”,“中国人口监测中心”公布的“中国六大寿乡”,还是现时中国老年学学会评定的当代一些“中国长寿之乡”,如皋并不具备其他一些长寿地区所拥有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然而,从 2002 年起,十多年来,如皋的百岁寿星都持续增加,至 2014 年元旦之日普查统计,全市百岁寿星已达 272 位。其原因主要是 80 岁、90 岁以上高龄群体队伍庞大,为百岁寿星队伍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如皋人为什么会长寿?十多年来,国内外研究生命科学的著名学者,热心于健康长寿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和知名人士,对如皋的气象、水土、物产、生态、民风、习俗以及高龄人口的空间分布、饮食结构、线粒体 DNA 单倍群与极端长寿的关联等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的研究,均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大千世界,万物皆有其源,今日如皋的长寿现象,亦是如此。深厚而凝重的如皋长寿历史文化积淀是今日如皋成为世界长寿之乡坚不可摧的基石。

## 一、长寿历史 源远流长

古人云：“夫志犹史也，国无史无以志国，故郡不志不郡，邑不志不邑。”如皋自东晋义熙七年(411)建县迄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县志之编纂，始于明天顺八年(1464)，至民国十八年(1929)先后共修编11次，计160余卷。

纵观现存明嘉靖、万历、清乾隆等时期县志，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均有长寿史料的记载。尤其是清嘉庆九年(1804)知县杨受廷、左元镇主修的《如皋县志》(以下简称《嘉庆志》)、道光十七年(1837)知县范仕义主修的《如皋县续志》(以下简称《道光志》)、同治十二年(1873)知县周际霖、胡维藩修编、邑人吴开阳纂辑的《如皋县续志》(以下简称《同治志》)、自民国四年(1915)开始，至民国十八年(1929)由知县刘焕等修编、邑人沙元炳等历时14年纂辑的《如皋县志》(以下简称《民国志》)，此四部县志中长寿史料最为丰富、考订最为翔实、文字条理最为严谨的当为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沙元炳先生“汇次群籍，补遗纠谬”主持编纂的《民国志》，该志在前三志新增“耆寿”、“贞寿”专节的基础上，不仅记载了长寿老人的姓名、年龄、身份、住址，而且增加了其生平简历、个性特点、家庭情况等方面的具体内容。无疑，沙元炳对如皋长寿历史文化的发掘和传承所作出的贡献，是前人无可比拟的。

除明清和民国等时期编印的《如皋县志》《如皋县续志》以外，《三国志》、《宋史》《明史》、《清史稿》、《舆地纪胜》、《中国历史大辞典》等大量文献史料中均有高寿的如皋乡贤名宦记载。有三国名将东吴大司马吕岱，北宋大儒“百代帝师之功臣”胡瑗，明代右都御史何塘、工部尚书孙应鳌，明末清初文化巨匠李渔、江东才子文学家冒辟疆，清礼部、兵部尚书戴联奎；嘉庆、道光之师，左都御史沈岐；有乾隆年间“文园六子社”创立者、诗人汪之珩，有为慈禧治病的一代名医薛宝田……

现仅简述如皋三位长寿名贤，三则长寿传奇如下，以示如皋长寿历史悠久之端倪。

长寿名贤之一：吕岱 《三国志·吴志卷十五·吕岱传》记载：吕岱，字定公，东汉海陵如皋人。生于东汉延熹三年(160)，卒于吴太平元年(256)，享年97岁。吕岱投效孙权，驰骋疆场，身经百战，屡建奇功。80岁晋升上大将军，92岁时官拜大司马。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强令滨江郡县徙民，如皋遂成一片荒无人烟的隙地。东吴赤乌四年(241)，吕岱奏请孙权，获准招抚乡民回归故里，复置海陵县，如皋方得以重生。吕岱一生廉洁奉公，临终前嘱咐儿子吕凯：“殡葬之制，务从俭约。”凯遵父嘱，以“素棺疏巾布襦”葬于故里——如皋高阳荡(现为白蒲之林梓)。

长寿名贤之二：冒襄 《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八·冒襄传》记载：“冒襄，字辟疆，别号巢民。如皋人。父冒起宗，明副使。襄十岁能诗，董其昌为之作序。崇祯壬午年(1642)副榜贡生，当授推官，会乱作遂不出。与桐城方以智、宜县陈贞慧、商丘侯方域，并称四公子。”清兵入关后，拒不为官，自称“巢民”，被毛泽东誉为“真正具有民族气节”之人。冒襄博学多才，是集诗人、书法、社会活动、戏曲导演、园林艺术、文物鉴赏诸家于一身风华绝代的文人雅士。他与金陵八艳之一的董小宛的婚恋轶事，早为世人传诵，而冒襄出身于宦宦长寿世家却鲜为人知。

据史料记载，如皋冒氏始祖冒致中，元海陵安定乡人，是忽必烈第九子，元镇南王脱欢的后代。元至正年间，任两淮盐运司丞，卒年不详。冒氏二世祖冒思中“竟卒于

溘”，亡年亦无从考据。三世祖冒基，以 74 岁高龄去世。冒襄族高祖冒政，明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正德二年(1507)任右都御史、宁夏巡抚，终年 77 岁。高祖冒承祥，任南京光禄寺监事，生六子，分授六宅于如皋县城集贤街之东西，富甲一方，遂将集贤街改为冒家巷。冒承祥夫妇皆寿登 92 岁。祖父冒梦龄，为“金台十子”之一。明万历、天启年间，三任地方官而宦囊不丰。崇祯八年(1635)去世，享年 71 岁。次年，祖母宗太宜人去世，寿逾 70。父冒起宗，崇祯元年(1628)与史可法同登进士，官至山东按察副使，督理七省漕储道。明亡归隐如皋城。清顺治十一年(1654)辞世，享年 65 岁。康熙十五年，冒襄母亲 87 岁病卒。

康熙三十一年(1692)初秋，冒襄年已 82 岁，仍遍邀亲友中八九十岁的老人举行闲人会、画会，次年作古，享年 83 岁。

长寿名贤之三：沈岐 《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记载：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沈岐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这是清代中央检察机关的最高长官。

沈岐，如皋白蒲镇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生，同治元年(1862)病逝，享年 89 岁。沈氏家族素有“礼让相先，亲睦相守，有无相通，患难相恤”的传统。沈岐自幼勤奋好学，“十岁能文”。27 岁中举，37 岁中进士，为官 50 余年，曾任侍学讲士，侍读学士，辅导过嘉庆、道光、咸丰三帝。67 岁时晋升都察院左都御史，于 87 岁时获重赴鹿鸣宴的殊荣。

如皋流传于民间的长寿神话、野史稗记、传奇轶闻甚多，以下三则传奇故事皆有史可循。

传奇之一：汉代寿仙乐子长 南宋王象之所著《舆地纪胜》载：“汉乐子长，如皋人，游霍山遇仙人韩衷，授巨胜灵飞散，令服之。曰‘蛇服此药，化为神龙。人服此药，返老还童。升云上下，改人形容。崇气益精，起死养生。子能服之，乃得度世。’于是举家服焉，俱不得死，年百八十。以其得道于潜山，号潜山真君。唐明皇为赞。”

传奇之二：八仙神翁徐守信 如皋灵威观，历代名道辈出。宋代名道徐守信，曾位列八仙，称之为徐神翁。元杂剧中的八仙为汉钟离、韩湘子、铁拐李、曹国舅、吕洞宾、蓝采和、徐神翁(守信)、风僧寿(或元壶子)。明后，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传》中将徐神翁、风僧寿换为何仙姑、张果老。现今，存世最早的山西侯马金氏墓砖雕的八仙画像中就有徐神翁守信。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山西芮城永乐宫元代壁画《八仙过海》中就有身背葫芦的徐神翁，其貌栩栩如生。

《如皋县志》载：徐神翁，宋代如皋人。因其时隶属泰州，故《泰州志》称他为泰州人。《海天三仙传》、《道藏语录》中均记述：徐神翁日诵《度人经》，有问修咎者，借经中语以告，言事必中。苏辙《龙川志略》卷九载：“徐神翁不知所从来，日归观中地，时言人祸福，必应。”文中还记述北宋词人秦观求徐神翁指点迷津之事。

宋代蔡绦所著《铁围山丛谈》卷一记载了“哲宗问嗣”的真实故事。说的是哲宗因无子继承皇位，于元符二年(1099)遣使引徐守信相见，特以立嗣之事相询。徐守信缓言答道：“上天已降嗣矣！”说完，以指沾茶，在案上写下“吉人天相”四个大字。哲宗不解其意，守信曰：“日后自当应验。”建中靖国元年(1101)，端王赵佶继位，号徽宗。众人方才领悟徐神翁“吉人天相”的真谛。“吉人”为赵佶之名，“天相”为上天之意。由此，徐

神翁名声远扬。徽宗亲作《天真降临示现记》颁示天下，并授意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赐徐“虚静冲和先生”。

徐守信自幼丧父，嘉祐四年(1059)在如皋仁威观被浙江天台山道长余元吉一眼看中，收之为徒。此后，得其真传，刻苦修炼，深得要旨，尤其在预测学方面，达到“言事必中”、“言人祸福，必应”令人折服的高超水平。他何时羽化，则无文字记载。

元明二代有关八仙的著作、戏曲中都有徐神翁，为什么明后却被换成何仙姑呢？《三教九流大观》一书作者指出，出于舞台效果，在八仙中添一女仙，更为人们喜闻乐见。

传奇之三：南宋 109 岁寿星李嵩 如皋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百岁寿星多达 50 多位，而出生较早、年事最高者为宋代的老寿星李嵩。

清乾隆十五年《如皋县志》载：“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三月，桑子河孝里庄忽产牡丹一本。明年三月，花盛开，乃魏紫也。人争异之。有杭州推官过此，欲移植之。掘土尺许，见一石如剑，长二尺。题：‘此花琼岛飞来种，只许人间老眼看’，遂不敢移。自是乡老生辰，值花开者，必造花下，引觞为寿。间有刻日欲至，而花一夕萎者，辄不吉。惟八十翁李嵩以三月初八初度，岁必一造，至一百零九岁终。凡醉花前三十春矣。石剑所题验云。”

宋代如皋百岁老人与紫牡丹的情结，吸引了历代多少文人雅士为之感怀。元陈应雷有《题孝里庄牡丹》诗：“墨染猩红露未干，仙姿未许少年看。魏家池馆今荒落，剩有飞来紫牡丹。”清乾隆年间文坛巨子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援引了李嵩“自八十看花，至一百零九岁”的轶事。时隔 200 多年后，文学巨匠郭沫若在《读〈随园诗话〉札记》一文中写下了《如皋紫牡丹》诗一首：“无种而生无此理，题诗人自见深心。护花预为防移植，埋石居然止盗侵。琼岛飞来成美梦，花园宴集赖高吟。牡丹有意酬知己，料已纷披直到今。”

## 二、长寿史册，谜团剖析

清朝康熙、乾隆二帝曾先后四次举办盛极一时的“千叟宴”，其中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四举行的一次规模最大。这次是为庆祝乾隆六十年来的“文治武功”、“盛德高望重茂行”的辉煌成就和乾隆禅位、嘉庆即位典礼而举行的“千叟宴”，更是盛况空前，计有 8000 人参加。内有 3000 人是来自各省及京城在职和退休 60 岁以上的皇亲国戚、文武官员，以及年逾古稀的护军兵丁、匠役、耆老士农。这批人在紫金城、宁寿宫和皇极殿入宴。另外 5000 名 60—70 岁的老者因宁寿宫容纳不下而“俱令预宴”，分发酒食，恩赐礼品。此次盛典，如皋有两位老人有幸入宁寿宫赴宴，一是吴际昌，一是施景禹。

《嘉庆志》载：吴际昌，如皋白蒲考授更目，“年 81 岁，遇纯皇帝千叟宴，以八品冠带匍匐丹墀，蒙恩赐鸠杖、银牌，千载旷典也……”吴于回如后撰写了《赴千叟宴恭记》，记述了当时盛况。嘉庆七年卒，寿登 88 岁。现《恭记》尚存，而供奉在家祠内的御诗、如意、鸠杖、银牌等早已佚失。

施景禹，太学生，工书画，精篆隶，好客四方名士，《嘉庆志》亦有他“恭逢旷典，得观天颜，蒙恩赐鸠杖、银牌、绢帛，真异数也”的记载。享年 77 岁。

如皋一县邑竟有两人晋京入宁寿宫御宴,也许受此启发,知县杨受廷主修《嘉庆志》时,首次独辟“耆寿”新章,由此开创了如皋地方史志辟专章记载长寿现象的先河。

古代人的平均寿命不高,自《嘉庆志》以后编纂的县志皆以 70 岁以上的长寿者作为收录的标准。随着时代变化与社会发展,2000 年全国平均预期寿命已达 71 岁,如皋市已达 75.58 岁。基于此,本文舍去县志中 70—79 岁年龄段的资料,以 80 岁以上的长寿者为研究分析的主体。现将如皋《嘉庆志》、《道光志》、《同治志》、《民国志》所载 80 岁以上长寿者人数整理列表如下:

表一 如皋县志所载长寿者简况表

县志名称	≥100 岁			90—99 岁			80—89 岁			80 岁以上合计			备注
	人数	其中		人数	其中		人数	其中		人数	其中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嘉庆	1	1	0	20	20	0	75	75	0	96	96	0	
道光	7	1	6	40	29	11	115	90	25	162	120	42	
同治	5	2	3	42	26	16	129	113	16	176	141	35	
民国	38	5	33	281	140	141	1053	720	333	1372	865	507	
总计	51	9	42	383	215	168	1372	998	374	1806	1222	584	

说明:《嘉庆志》(1804)见卷十七·列传、耆寿;《道光志》(1837),见卷七、八、九卷之宦迹、耆寿、贞女、节妇、义行;《同治志》(1873),见卷九之耆寿、宦迹、方技,卷十二之贞寿;《民国志》(1928),见卷十二之耆寿、贞寿。

表一所示数据,出现三处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很有必要深入剖析。

其一、从《嘉庆志》开始,至《道光志》、《同治志》三部县志相距 69 年,所增长寿者人数甚微,而《同治志》至《民国志》相距 56 年,却出现长寿者人数陡增现象(详见表二)。

表二 长寿人数增长量对比

时期	相距时间	90 岁以上长寿者		80 岁以上长寿者		备注
		净增加人数	年均增加人数	净增加人数	年均增加人数	
1804-1837	33	26	0.79	66	2	嘉庆—道光
1837-1873	36	同为 47 人未增	0	14	0.38	道光—同治
1873-1928	56	272	4.86	1096	19.57	同治—民国

说明:1、90 岁以上者,含百岁寿星;2、《道光志》载:百岁者 7 人,90—99 岁 40 人;《同治志》百岁者 5 人,90—99 岁者 42 人,同为 47 人。

由上表可见,从 1804 年开始至 1873 年的 69 年里,《道光志》记载的 80 岁以上的高寿者仅比《嘉庆志》增加了 80 名,尤其是从《道光志》到《同治志》的 36 年中,80 岁以上的老者仅增加 14 人,平均每 3 年才增加 1 人。而《同治志》至《民国志》,80 岁以上老者,从 176 人猛增至 1372 人,增长了 8 倍;90 岁以上的老者从 47 人增加到 319 人,增长近 7 倍,百岁寿星从 5 人增至 38 人。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何在?史料证实,从清乾隆、嘉庆时期至民国初,如皋行政管理区域基本稳定,不存在因扩大行政范围新增人口基数导致长寿者骤增的因素。同时,从清末至民国初年中,国内正处于外强欺凌、国力衰竭、经济萧条、民无宁日

的灾难岁月,如皋平均寿命不具备如此猛增的可能性。那么,到底是何原因出现嘉庆、道光、同治期间如皋长寿者增速如此之低? 历史文献资料揭开了这一谜团。

史载:“北宋崇宁中,合海陵如皋登民数户五万六千九百有奇,口倍之。以皋中下淮海陵之望,约得十之三四。”而出现登记上报人丁仅有实际人丁十分之三四的根源在于当时征交赋税和分摊徭役的政策。史家对此秉笔直书:“古今户口之盛,无如宋之崇宁大观,斯时本邑(指如皋)民数准志核之不足四万,明一代万历、天启为盛,亦不过四万有奇。非前代户口之数止于如是,其供徭役出赋税者,止于如是耳。”接着,又具体指出:“清康熙年间定额四万九千八百六十三,较宋明多不及万,其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至宣统(1909—1911)时竟于定额十四五倍之多,此保甲造报之丁非额输赋之丁,盖丁不尽赋,自古以来,昭昭然矣!”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少报人口,是为了少缴赋税。当中央政策一明确:“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曾几何时,如皋人口陡增十四五倍。笔者查阅了明洪武、永乐、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等各年号之间的如皋人丁数,洪武年间为 34640 人,天启年间最高为 40117 人,成化年间最低,仅有 16144 人。崇祯年间为 38337 人。从洪武到崇祯 280 多年,平均年递增丁口仅 13 人(按:古时候称男为丁,女为口,合称丁口)。康熙五十二年下诏,以五十年丁册为常额,生人丁永不加赋,名为盛世滋生户口。雍正九年,节次编审滋生丁口 784 人。乾隆三十七年,停止编审,岁稽其数以保甲丁额具管收除在册上之。这样,客观上就形成按丁口赋税和按实际人口造册的两本帐。到宣统二年(1910)再次重申遵康熙五十二年恩诏永不加赋,其目的就是要各地如实报足人口而已。据史料记载,道光三十年(1850),如皋人口已达 1137238 人。同治十二年(1873)增至 1180164 人,民国二十一年(1932)人口增至 1428304 人。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如皋人口达到 1541192 人,成为旧中国人口第一大县(清朝及民国时期,如皋含现如东全境及海安县、通州部分)。

由上可见,出现长寿者人数增长速度前低后高现象的原因,一是受按丁赋税政策因素影响,人口基数上报不足,致使清道光、同治期间相当数量的长寿老人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二是由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进一步落实,以及人口年自然增长的累积,清末及民国初年如皋人口基数已经达到 130 多万。再有,过去人口统计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完整精确,更不可能像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人口普查,划分年龄结构。《民国志》尽管所记载的长寿人数要比《嘉庆志》、《道光志》、《同治志》多得多,而这些长寿者都是从编写县志的工作人员走访调查而来的,即所谓“徵访稿”。且所记载的长寿者,大部分是地方上的知名人士。可以想象,在广袤的农村,能有多少长寿者会被载入县志呢?《民国志》尚且如此,嘉庆、道光、同治三志遗漏的当然就更加突出了。

其二,四部县志所记载的长寿者皆为男多女少。即 80 岁以上的长寿者男性大大超过女性。

按照寿命性别差异的一般规律:女性平均寿命要高于男性。新中国成立后,如皋历次人口普查的老年人口资料均为女性多于男性,呈现年龄逾高,女性占比逾大的趋势。以 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为例:如皋 65 岁以上人口数男性为 73084 人,占总人口 11.08%,女性为 94660 人,占总人口 13.47%,女性人口数是男性 1.3 倍;90 岁以上人口数男性为 649 人,占总人口 0.1%。女性为 2033 人,占 0.29%,女性人



口为男性的 2.9 倍。上述四部县志所记载的长寿者性别比例却极为反常。《道光志》载:90 岁以上者 40 人,男性 29 人,是女性 11 人的 2.6 倍;80—89 岁者 115 人,男性 90 人是女性 25 人的 3.6 倍。《嘉庆志》所载 96 名长寿者,无一女性。《同治志》所载 90 岁以上者 42 人,男性 27 人,是女性的 1.8 倍;80—89 岁以上者 129 人,男性 109 人,是女性的 5.4 倍。《民国志》所载 90 岁以上 281 人,男性 140 人,与女性基本相等。而 80—89 岁者 1053 人,男性为 720 人,女性 333 人,不足男性的一半。

出现上述反常现象,盖源于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纵观如皋七部旧志,无一不笼罩轻视和歧视妇女的阴影。从长寿者的记载上来看,姑且不论万历、嘉靖、乾隆、嘉庆四县志中均无女性长寿者的独立记载,就是道光、同治、民国三志,从表面上看,虽有对女性长寿者的记载,但是所记的仅仅符合封建理教“三从四德”标准的“节妇”、“贞妇”、“烈女”、“贞女”。这就是出现女性长寿者少于男性的反常现象的根本原因。

其三,百岁寿星与高龄群体比例严重失衡。高龄群体是产生百岁寿星的基础。高龄群体人数逾多,则产生百岁老人的机率就逾高。据 2000 年如皋人口普查资料统计,百岁老人与 90 岁以上高龄人数之比为 1:81,与 80—89 岁人数之比为 1:774。古代老年人口的死亡率比现代的要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命科学的进步,健康知识的普及,如皋 2000 年老年人死亡率比 1990 年有明显下降。其中 80—89 岁年龄段死亡率从 1990 年 103.08‰。下降到 87.92‰;85—89 岁年龄段从 156.64‰下降至 139.04‰;90 岁以上的从 247.6‰下降到 230.05‰。由此可以推断,如皋历史上的百岁老人与 80 岁以上长寿老人的比例理应高于现代。而县志中所记载的百岁老人与 80 岁以上的长寿老人的占比却低于现代数倍,这明显与人口增长规律不符(表三)。

表三 县志所载百岁老人与长寿人数比

县志别	性别	百岁人数	90—99 岁		80—89 岁		80—99 岁合计	
			人数	与百岁比	人数	与百岁比	人数	与百岁比
嘉庆志	男	1	20	1:20	75	1:75	95	1:95
道光志	男	1	29	1:29	90	1:90	119	1:119
	女	6	11	1:1.8	25	1:4.2	36	1:6
同治志	男	2	26	1:13	113	1:56.5	139	1:69.5
	女	3	16	1:5.3	16	1:5.3	32	1:10.6
民国志	男	5	140	1:28	720	1:140	860	1:172
	女	33	141	1:4.3	333	1:10.9	474	1:14.4

显然,表三所示的现象是上述第一种现象和第二种现象综合作用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尤其是第二种现象几乎使女性百岁老人以下年龄结构出现断层。

上述三种现象实质上反映了县志记载如皋历史上长寿老人仅其局部而已。这一局部充分显示如皋县志上漏记的长寿老人何其多也。至于未被县志所载的长寿老人究竟有多少,是已被记载的几倍,还是十几倍,这已是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一局部,为我们品读如皋长寿历史文化,解析古代长寿奥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客观依据。珍惜和利用好如皋先贤留下的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造福于子孙后代,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尽的责任。

### 三、养怡是福 德者长寿

三国时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所写的《龟虽寿》中有如下诗句：“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如皋长寿史册中所记载的长寿老人的生平事迹，确是魏武帝“养怡是福，德者长寿”的佐证。

如皋县志记载 80 岁以上的长寿者 1806 名。其中有近一半只记载了姓名和年龄而无事迹说明。记载生平事迹较为详细的有 681 人。此 681 人，有 100 岁以上者 21 人，其中男性 1 人，女性 20 人；90—99 岁者 124 人，其中男性 90 人，女性 34 人；80—89 岁者 537 人，其中男性 465 人，女性 72 人。按其品德、性格、家庭、职业、爱好等特点归类，略分六种类型。

(一)孝者寿。长寿事迹中记载“孝”者居多，有“奉嗣父孝”、“事母至孝”、“孝孀母”的；也有“孝友诚笃”、“孝事舅姑”、“孝行贞操”、“性孝友”、“性至孝”、“子孙贤”的。孝为天职，凡长寿者在道德素养上均离不开一个“孝”字。不孝者耻——这是如皋的传统民风，也是长寿者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奠基石。

卢崇孝，字勋占。天性纯孝。7 岁侍父寒夜必温其溺器。父病守护身侧七日七夜。父逝，家境清寒，母亦病，遂精心习医。“屡活人危，不受重馈，贫者尤力却之。”其母体弱双目失明，精心照料十余载。一日突染重症，无法施救，卢悲哀至极，焚香拜佛，愿以身替代母病，并施以重剂，竟出奇迹，其母病愈，且双目重明。自此，人愈加敬之，称其卢孝子。名士姚澍以记。卢崇孝 83 岁无疾而终。知县范仕义亲访，录其舆论，以孝行详奏，于道光十五年受朝廷表彰。

刘汝奎，字啸云。附贡生。参加乡试时，闻讯母病，倾即停试，急归奉母，从此以后“更不重试，以益母寿”，享年 95 岁。

胡申毅，字念贻，号朴园，太学生。已授命担任县丞，却因母年迈，不忍离其左右，遂不赴任，一心侍奉母亲。胡“秉性谦和，持身恭俭，不以富贵骄人，孙曾绕膝，时训以敦厚退让，仿佛万石家风，宜其福臻，厥躬寿跻，期颐也。”寿登 99 岁。

(二)善者寿。县志中浓墨重彩记述“积德行善”、“和厚好义”、“恤贫解难”、“见善必为”的长寿者多达 123 人，有修路建桥、资助育婴堂养老院、置田为义冢、岁歉赈灾、施衣舍药的；有解囊济危、倾力相助的；有清贫自守、慷慨乐输、刚直好义、排难解纷的；还有的怜恤孤寡、常年不懈，或以医行善，义诊施药。

陈叔，字翼圣。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一生乐善好施。尤其到了晚年，见善必为。他说：“遗金于子孙，不如积德行善。”这位于道光十七年(1837)时已 99 岁的老人，一语道出了人生价值的真谛，至今仍令人深省回味。

何邦彦，字世明。嘉庆六年(1801)运粮抵达京都管辖的保定于家村时，暴雨顷盆，洪水猛涨，村庄淹没，无数村民溺水身亡，攀高嚎叫和附物浮水呼救者已奄奄待毙。何见之不顾个人安危，亲率从人冒险“救挽千余人”，并“食以粥糜”。七天后水退，被救村民感激不已，无以回报，决意以人相赠，何坚持不受。保定人感其恩德，即在寺庙中高悬大匾供奉，以兹垂念。一次，路过扬州见一贫妇卖身葬父，当即解囊相助，不留其名。何一生就这样好义行善，不图报答。享年 94 岁。

吴世云，字锦庆，国子监学生，性和厚，好施予。家庭并不富裕，生平济贫，修桥等

善举甚多,仅对贫民施棺就累至百余具。享年 88 岁。其妻冒氏,性宽厚,邻里凡有难者皆倾力相助。清咸丰丙辰年(1856)春严重饥荒,她毅然倾仓粟谷数百斛(旧制 1 斛为 10 斗)赈济灾荒。寿登 90 岁。

沈子瑜,字又珍,少时丧母,兄亦早逝。他家境清贫,自节衣缩食,终年以粥充饥,而抚养孤儿如亲子,以助人为乐事。生平无疾言忿色,寿登 95 岁。临终犹言子孙以“为善最乐”。

早在南唐保大十年(952)在县境内城河东段,即有人捐募建有木桥,取名“迎春桥”。明嘉靖十三年(1534)知县吴宏功捐银 500 两,改为石拱桥。清康熙辛卯年(1711)重修此桥,邑人吴文征在南北桥栏各设石碑一块,刻上“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这副对联既表达了如皋自古以来积德行善的美德,也反映了长寿历史文化的久远。

(三)淳者寿。淳朴谨厚,慎言重诺,和俭恬淡,与世无争是长寿者的性格特点。此特点显著者 74 人。

杨廷柱,字槐公,号蓑吟。一生纯谨笃诚,乐于吟咏。常以“不忤不求,知足知止”八字自勉。享年 85 岁。

贾以义,号西园。幼年丧父,生平以不能事亲尽其孝道为憾事。为人质朴谨厚,刚直好义,遇有是非争执,出面调节,片言顿释。有贫困者相告:所借之钱,用于维生,无力偿还。他便背地里将其借据焚毁,不求人知,并捐田文昌阁,继续行善。寿登 90 岁。

陈茂龄,字彭侣,性恬淡。为人处世敦朴纯厚,举止言行循规蹈矩。捐资倡修族谱、宗祠。县内赈荒济困各项益慈善之事,凡力所能及者无不尽力赞助。安命守分,颐养天和,寿登 96 岁。

朱榆,字雨时,号容村,太学生。自律谨严,循礼守法,教子孙以敦厚退让。终身以事教育,兢兢业业数十年如一日。所教之学生各有所长,皆取得成就。享年 85 岁。

(四)睦者寿。睦,指家庭和睦,邻里和睦。县志中记载的“睦”包括:“夫妇齐眉”、“一堂姻睦”、“兄弟友爱,至老弥笃”、“敬师重友”、“瞻族恤邻”、“睦和乡党”、“笃友爱弟”、“相夫持家”等内容。此类长寿者达 187 人。

朱学颖,字孔达,号巢侣。性醇谨,与乡党恂恂相处,似不能言。寿 88 岁。妻沈氏,孝慈淑慎,谐老如宾,寿 87 岁。其兄学廉,弟学领、学乾皆 70 岁以上。长子朱履新寿登 90 岁,御赐八品冠带。“闻乡称之为:一门寿考长寿之所直也。”

监生韩璋妻刘氏,性和顺,举家和睦,姑室无间。族党里有贫困者,知悉后即劝夫倾力相助,常以仁义道德教育子孙。寿至 102 岁。

陶天爵,字廷方,乡里尊为长者。与妻吴氏举案齐眉,一堂姻睦,全家高寿。夫妻二人,同年生死,寿 88 岁。长子佩仁 82 岁,次子佩德 86 岁,三子佩玉 94 岁,妻吴氏 82 岁,孙金声 80 岁,孙媳吴氏 84 岁。

夏怀纲,字纪方。兄弟三人,亲密无间,至老弥笃,皆高寿。其兄怀聪 82 岁,弟怀柏 84 岁,怀纲本人寿登 99 岁。每与宗族聚会,必讲授兄弟友爱、家庭敦睦、和谐处世的道理,族人皆以为重。

(五)勤者寿。县志中有事迹记载的大部分人职业难以界定。可以确定其职业的

仅存 59 人。其中贡生、廪生、举人、国学生、增生、附生以及居官宦者达 101 人；从医者 29 人；从教者 24 人；务农者 21 人；习武者 11 人；工书法善诗画、著书立说者 26 人；从事家务的女性 47 人。这些长寿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勤。

●读书者勤。刘元祉 87 岁手不释卷，吟咏弗辍；薛际云 88 岁，重游泮水，好学不倦；石渠文 89 岁，犹自著书，被载入艺文志；石瑾 91 岁，仍闭门穷经，至老不衰。

●务农者勤。如皋自古为农业大县。寿者绝大部分理应源于农夫、农妇。遗憾的是从事耕牧者县志中仅记有 21 人。而且大部分是“幼读长耕”、“耕读传家”、“莳花种竹”、“怡情花草”之类的兼农户。只有《同治志》记载了标有“农民”二字的长寿者 6 人。由此，可以断言，县志大量遗漏记载的长寿者就是勤劳耕作的农民和农村妇女。所幸在 6 名纯农民中尚有二位典型。

一位是农村妇女，南乡农民王兆刚妻钱氏，寿登百岁，身犹纺绩。常以勤耕力田训其子孙。

一位是种花专业户张志硕，80 岁。自幼酷爱花竹，在他的田园内仅牡丹、芍药就种了数百株。

值得一提的是如皋素有花木之乡的美誉，自古以来，城乡居民即有莳花种竹、怡情花草的偏爱。所谓“耕读传家”并非皆为务农的读书人，有相当部分是“案上古书数卷，庭前异花数十种”的文人雅士和市民。无疑，这对于健康长寿是十分有益的。

●从教者勤。志载 20 多位以教学为业者，皆“勤课生徒、多所成就”。

成周礼，号荫堂，增生。学富五车，品行端正。门生成材者甚众，其中二人考中进士。寿登 86 岁。

陈汉源，字砚农，庠生，笃于孝友。其妹守节，无依归养 40 余年。为人耿直，不取分外之财。以德育人，门生散游四方，“望而知为先生弟子”。

●从医者勤。医者，救死扶伤，积德行善之业也。29 位长寿医者中，有“工医而不业”，义医施药、济贫行善者；有“世代行医，活人甚众”者；有三代同医，皆登高寿者，有“尝于疫年屡活人危”者。

朱榕，字南荫，庠生。少孤贫，善事母，性嗜学，尤精岐黄术。乾隆丙午年（1786）暴发流行病疫，群医束手无策，朱榕开出药方，贴于市中，救治无数疫病者，全乡人感恩戴德。寿登 86 岁。嘉庆二十三年（1818）旌其闾。

●事家务者勤。47 位主内的女性长寿者，她们都是“勤俭持家”、“克嫗妇道”、“孝行贞操”、“茹苦抚孤”、“孝抚子孙”的节妇。

蒋宗发妻卜氏，年 28 岁亡夫，守节 76 年，勤俭持家，寿登 104 岁。子振旺 88 岁。

监生王炽妻凌氏，夫亡，辛苦持家，侍奉两世孀姑，抚养十岁儿子成家立业，寿登 99 岁。

●勤俭持家、克嫗妇道、茹苦抚孤者中最为典型的，当首推钱沈氏。钱沈氏是江西库使钱善勳的续弦，25 岁时亡夫，携幼子扶櫬回归如皋故里。独自挑起上孝公婆，下抚幼子、主持家务的重担。不久，公婆去世，沈氏悉心抚养儿子成家立业。未有数载，子媳相继而亡。她含悲收养族中嗣孙，使之中选入学，并结婚成家，生育三子。不幸的是，嗣孙夫妇又双双夭折。她又含辛茹苦抚育三个曾孙，皆入选升学。就这样辛

勤苦度了 66 年,寿终 91 岁。

(六)乐者寿。如皋县志所载长寿者其“乐”形式多样:有积德行善、乐善好施,以善为乐者,有清贫自守、针黹度日、安贫乐道者,有性格豪爽、放达不羁、侠义为乐者,有闭门穷经、博览群书、诗画自娱者,有莳花种竹、煮茗衔杯、把酒吟咏、悠然自乐者。但如皋最为突出的是四世同堂、五世同堂、一堂和睦、天伦多乐。

在 681 位长寿者中,四世或五世同堂的有 91 人;在 21 位百岁老人中,有四位五世同堂。《嘉庆志》记载了一户在公堂领受“五世一堂”匾额的欢乐情景,兹抄录如下:

“纪东海,年九十又二。长子孔昭,孙正南、正学,曾孙沅恺、沅长、沅达、沅宗、沅连、沅龙,元孙允康、允安、允才,于嘉庆八年(1803)九月二十六日跻公堂,耆、老、艾、壮、幼、弱前后跪拜,领《五世一堂》匾额,兼蒙酒食,白叟衔杯,黄童捧果,有依依膝下洵哉。”文中仅记长子一门即有 2 个孙儿,6 个曾孙,3 个玄孙,余皆略。

县志中记载五世一堂人数最多者,当数《民国志》所记 93 岁的许文岑,他有五子、九孙、二十一曾孙、八玄孙。平民阶层,五世一堂,不包括女性在内,人数有如此之多实在罕见。

自古以来,如皋一直沿袭着几代同居一宅的传统。据载,同治八年(1869),全县有 135097 户,总人口 1177857 人,户均 8.72 人。大多数是二代、三代同堂,四代、五代同堂的仅是少数。

几代同堂是家庭和睦、幸福温馨的沉淀,是天伦之乐的聚集,是长寿老人最美的精神享受,也是长寿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晶。随着时间推移、社会的进步,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在城市内已不复存在,在农村亦难以寻觅。但如皋人尊老、敬老、爱老的风尚、享受天伦之乐的亲情,并未因之而湮没,只不过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孝、善、淳、睦、勤、乐六个字集中体现了如皋深厚的长寿文化底蕴。也正是这种长寿历史文化的演绎与传承,将如皋这块风水宝地推向极致,使如皋成为中国和世界闻名遐迩的长寿之乡。

#### 四、长寿习俗 寿物遗存

如皋自唐宋起,民间即有多种长寿习俗代代相传,且有相当丰富、极其珍贵的展示长寿的物质遗存。如果从文化视角观察,存在于如皋人思想意识中的精神、道德、观念、心态、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等的长寿历史文化是一种隐形的软文化的话,那末,展示如皋长寿历史的大量丰富的物质遗存则为显形的硬文化,难能可贵的是如皋长寿历史文化隐形、显形的硬软文化兼而有之。

走进如皋县城,迎面而来的万寿路、福寿路、益寿路、仁寿路,百岁巷、长巷、白头巷(卜泰巷)、朱衣巷、青云巷,健康桥、益人桥、迎春桥、丰乐桥等路、巷、桥名就令人置身于长寿文化的氛围之中。民国时《如皋白话报》载一以桥名嵌成的上联:“冒家姐姐看迎春,益人丰乐”,征求下联,应者如潮,佼佼者以巷名对下联:“白头公公中状元百岁朱衣”,成一时佳话,传诵至今。

如皋带有鲜明地方色彩的长寿习俗甚多。如:“过百路”、“掖百岁碗”、“千家米”、“添寿面”、“借寿”与“避寿”、佩带“长寿锁”、“长寿项圈”、“贺九不贺十”等等。这里略述“过百路”的习俗。

所谓“过百路”，就是新生婴儿出生百日那天，所举行的祈求婴儿长寿的祝福活动。这一天卯时(上午5—7时)，由外婆或者祖母抱着佩带刻有“长命百岁”银饰小锁的婴儿，带着线香和小笱帚(辟邪之物)，在如城从长巷、百岁巷、状元坊、集贤里、朱衣巷、青云巷走过，最后再到定慧寺焚香拜佛，以祈求婴儿长大之后金榜题名、长命富贵。

“过百路”为何从卯时开始，又为何一定要走“长巷”？这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如皋《万历县志》上记载“长巷”原名“石家巷”，位于县城中的东西向小巷。此巷仅长约150米，尚不足通城巷的四分之一。相传明天启年间，此处有几户人家，其中有位孤苦伶仃的常姓老太。在她80岁寿辰的那天，邻里们为她祝寿，正巧有一位财主过此，知悉此事后，询问从者：“这老太太为何长寿？”从者道：“她哪会有老爷命长，只不过因为这块地风水好，老太太沾了光，多活了几年而已。”财主听了未过数日，便霸占了这块地盘。常老太苦无栖身之处，正欲自寻短见之际，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飘然而至，将她引向西边的一块隙地落户。后来这位老太太一直活到100岁又三十天卯时，无疾而终。由此，迁来居住者渐多，遂成一条巷道。因百岁寿星常老太早居住于此，故以常之谐音取名“长巷”，以寄长寿之意。又因为常老太卯时仙逝，故“过百路”从卯时出发。

如皋长寿历史文化物质遗存除县志中长寿史册以外，还有大量的诗词书画、长寿养生著作、百岁牌坊、百岁碗、百岁床、长命锁以及名家寿匾、御赐匾额、旌表资料等，这些遗存大部分散落民间。有的已在“文革”中被毁，有的仍完好保存至今。

#### ● 百岁坊

如皋历史上所建各类石制牌坊多达100多座，其中百岁坊即有16座。这16座皆为清朝时期所建，6座是雍正、乾隆时期的，其余是道光、同治时期的，皆为朝廷敕建。为谁而建，为何而建，建在何地，都有明确的记载。而江安苏家巷东西两头曾于乾隆、同治两朝建了两座百岁坊，传为美谈。原来苏门第十四代孺人苏丁氏寿登102岁时，乾隆帝恩赐粟、帛及旌表“百又二岁”金匾一块，并敕建百岁坊于苏家巷西首，于1782年建成。其曾孙媳妇苏门徐氏101岁卒，同治帝恩赐蟒袍一件，敕建百岁坊一座，建于苏家巷东首，苏家祠堂前，同治六年建成。因苏家四代之中出现两位百岁老人，两次五世同堂，所以家人即在大门上贴有“重逢五代，叠庆期颐”及“百岁同堂双五世，一门四代两期颐”的对联。能获此殊荣的，不仅如皋独此一家，恐怕全国也很罕见。

时过境迁，如皋数以百计的石牌坊早已在历次政治风浪中被摧毁消失，所幸的是1771年，乾隆皇帝御赐“寿登百岁陈天祥之坊”的长石条，现在被收藏在白蒲法宝寺内。江安苏氏百岁牌坊上刻有“圣旨”二字的汉白玉石块，还被他们的后人保存着。

#### ● 百岁庄、百岁桥、百岁祠、百岁巷

百岁庄，位于如皋西乡卢港东南，原村名为草荡庄。清光绪年间，该庄王瑞林妻卢氏，寿103岁。村民引以为荣，遂易名“百岁庄”。

百岁桥：如皋县志中记载百岁桥有4座：一在东陈镇汤家湾北的张家庄。一在雪

岸镇薛家庵西。一在西场(今属海安)东北朱家庄古河上。还有一是许树兰,字纫佩,享年 84 岁。其妻仲氏享年 87 岁,为母周氏百岁建百岁桥,地址不详。

百岁祠、百岁巷:在县城西大街谢恩桥东,为陈元济妻宗氏所建百岁坊的南巷口,陈氏子孙建了一座百岁祠,南巷由此得名百岁巷。旧城改造后名百岁街。

#### ● 寿寺、寿庵、寿山、寿井

如皋以寿字命名的寺庵史料记载共有 7 座。有明嘉靖年间所建的福寿庵、万寿庵;清顺治年间所建的延寿寺。康熙十九年(1680)建延寿庵,还有康熙以后所建的仁寿庵、万寿庵。七座寺庵,分布于县城内两座,农村 5 座。其中同名万寿庵的有 3 座。一在县城海月寺前,一在县北七里阕,一在县东冯家堡。

寿山位于掘港(今属如东县)西南 1.5 千米左右。此山山躯因沧桑之变,被土湮没,仅露山顶突兀地表,民以此山未被全部埋入地下,有与天地齐寿之意,故名寿山,又因此山隐而不露其高,虚怀若谷,又名谦山。

如皋水质优良,有益于健康长寿的古井甚多。明万历《如皋县志》、清乾隆《如皋县志》即记载 20 多口。有“味最清胜”的潜玉井;“水味清冽,人争取汲”的霞山井,“泉味甘冽,人共德之”的德井;有“色如琼玉”的琼井;“行人掬饮,泉味清胜”的杨花井,还有“泉味莹洁,独甲城中”的甘露井……至今,如皋尚存集贤里唐井一眼(位于今如皋高等师范学校内),宋井三眼:位于白蒲的济忠井、城西何庄八角井村的“度军井”、县城内中禅寺东的玉涓井。因玉涓井水最清冽,北宋龙图阁学士王觐有诗赞云:覆栏常浸桐阴冷,煮茗犹呈玉色寒。市民谓之“延年益寿”之井。

#### ● 古树

如皋名木古树闻名遐迩。它既是如皋人长寿的益友,更是如皋长寿的历史见证。尽管历经摧残,所幸存者十仅一二,但仍在我国东部沿海平原地区居领先地位。现千年以上的古树尚存 5 株,高明镇大杨庄、九华镇赵家园、常青镇横岱村的 3 株古银杏以及搬经镇加力村的老槐树,树龄均在 1200 年以上。最高的已达 1500 年。

如皋是银杏之乡,自古即有“千年银杏百岁人”的民间谚语。现存百年以上的银杏 33 株。《江苏古树名木志》记载:“苏北南乡赵家园有株银杏诞生于唐朝后期。”赵家园即如皋九华镇的一个自然村。该树经历 1300 多年沧桑巨变,现在依然郁郁葱葱,生机盎然。树冠直径达 32.4 米,高近 30 米。居住在古银杏树附近的金桂荣老人,寿登 106 岁。105 岁时,他生活能够自理,乐于串门,与邻居聊天。同年,该村 95 岁以上的耄耋老人就有 5 位。九华镇百岁老人多达 14 位,95 岁以上的老人多达 109 位。笔者询问其长寿的原因,村民皆言沾了千年银杏的“寿气”。

松柏类的树木能大量分泌芳香杀菌,有益于人的健康。如皋仅如城镇现存百年以上的古松、古柏就有 23 株。其中生长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皋水绘园内的古桧(俗称“六朝松”)为宋时如皋县令曾易占所植,树龄近千年。

#### ● 长寿养生典籍

如皋历代名医甚多,县志记载的就有 242 人。明洪武年间,县衙即设有医训科,管理医生行医事务。每当疾病出现,医者则出巡诊治。除名医开设诊所坐堂应诊外,还有大量的游医摇铃串乡,谓之“走方医”,俗称“郎中”。加之如皋土生药材资源丰

富,多达 400 余种。良医云集,药业发达,为如皋人延年益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史料记载,如皋古代杰出的名医有明隆庆年间被誉为“佛心神术”、“国手”、“扁鹊”的张伯仁;有清顺治年间集文才、医学与养生于一身的进士丁其誉,他的传世名著《寿世秘典》1990 年已被中医古籍出版社按照清“颐吉堂”刻本影印线装再版发行;有嘉庆、道光年间“歧黄之学冠绝一时”、“出为名臣,处为名医”,“政绩与医理均臻绝顶,伟抱宏敷,奇才出众”,历任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的吴箴。他历官 30 余年,以清廉才干出众为民拥戴。史书、地理、诗词著作多达 66 卷。其医学专著《临证医案笔记》6 卷刊行于世(道光十六年树滋堂刻本),为医界珍本;有“精治痧疾”的权威专家胡杰,在道光元年(1821)痧疫盛行,杰以其《痧症全书》广为传授医方,“赖以存活者无算”,他的《注穴痧症验方》等四部专著于光绪十九年(1893)由上海玉海楼铅印传世;还有出生于名医世家的薛宝田,“能世其家学,于歧黄诸书无不得其秘奥”,光绪六年,慈禧病重,“太医罔效”,朝廷征召外省名医进京诊治。其时薛在杭州,因其医德高尚,“活人无算”而名满浙中,并被委派主持“官医局”。浙江巡抚谭钟龄即保荐薛入京,为慈禧治病。薛在京历时 44 天,切脉十五次,立过 20 多个药方。慈禧病愈,传谕:“浙江巡抚谭所荐医生看脉立方均尚妥。”薛宝田将此行全过程详细记录于他的《北行日记》一书中,1985 年河南人民出版社重印了此书。

如皋历代名医不仅为如皋人的健康长寿作出了贡献,而且所留下的大量医药著作,丰富了华夏医学宝库。据不完全统计,仅明清时期,如皋的名医著作即有 40 余部数百卷。在这些医学著作中,除了《临证医案笔记》、《医学精理》、《医学刍议》、《医录》、《医考》、《验舌要》、《内经注》、《春温集方》、《温病条注》等等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有关长寿养生方面的专著,如丁其誉所著的《寿世秘典》、王珏所著的《泰定养生主论》、姚国干所著的《食谱》等。尤其是丁其誉,早在 240 多年前,就提出“善服药者不如善保养”的养生观,其科学性至今仍有其指导意义。在《寿世秘典》这部著作中,有按月令顺序,逐月阐述了各种生活习惯与天时相适应的具体做法;有从衣食住行等方面论述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有介绍日常食物的医疗作用;有叙述常见疾病的病因、病理和治疗药方。全书所论述的养生精要,只在饮食起居之间,简要而实用。无疑,《寿世秘典》这部著作揭示了如皋人长寿的源头——重视养生。

如皋长寿历史文化,是如皋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独特而珍贵,有着丰富的内涵。本文仅是打开如皋长寿历史文化宝库大门的一孔之见而已。大量的长寿历史文化遗产,尚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整理和研究。当今,如皋人正在继承、发扬长寿历史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谱写长寿文化历史的新篇章,它必将有益于今人,造福于后代,泽及于华夏,风靡于世界。

2014 年 3 月 21 日改毕



# 《红楼梦》与如皋

沈新林

《红楼梦》与如皋,本文的标题分明包含着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红楼梦》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最复杂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经典书籍;而如皋则是江苏省长江下游北岸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县级市,隶属于南通市,面积 1477 平方公里;现有人口 142 万,以长寿之乡闻名,她与新疆吐鲁番、广西巴马齐名,是全国著名的长寿之乡。南通,最近被世界自然医学会、世界长寿乡认证委员会命名为世界第一个“长寿之都”。看来,《红楼梦》与如皋,这两者确实八竿子打不着。如皋非同寻常,既是古老的文化名城,而又是新潮的开放城市。要说如皋古老,还真的名不虚传,她已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不但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而且历代英才辈出,宋代的胡瑗、王观,明末清初的李渔,冒辟疆,等等,流芳后世,妇孺皆知,确实是著名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古城。要说如皋新潮,就是如皋人民喜欢读书,勇于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善于钻研,并且敢于提出新鲜的见解。

怎不?笔者在 2011 年 9 月,应邀赴浙江兰溪参加纪念李渔诞辰四百周年及首届国际研讨会。会前参与学术组审阅大会代表提交的论文,发现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法官朱江兵先生,撰写了一篇六万字的论文,节选其精华部分提交大会。他的主要观点是,《红楼梦》的作者是明末清初出生于如皋,说如皋方言的文化巨人李渔。我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杜书赢研究员,扬州大学黄强教授认真阅读了论文,三人经过商量,一致认为,这种论点不合情理,违背常识,太离谱了。基于研讨大会要包容吸纳各种不同意见的宗旨,我们商定,让作者用五分钟时间向大会介绍论文观点,但大会论文集不宜收录他的论文,可作存目处理。后来才知道,朱江兵先生就是如皋人,本来学生物,当教师;后来改行当了法官;现在对文学产生兴趣。看了很多书,也考察了不少地方,然后形成了这一观点。

无独有偶。今年 4 月 11 日早晨,我正准备上课,原如皋市政协副主席,现如皋历史文化研究会负责人徐建平先生从南京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惊人的好消息:如皋有几位老学者研究《红楼梦》作者,提出作者是如皋的冒辟疆的新说。我当时时间紧迫,简单地表明我的观点:“《红楼梦》的作者绝不可能是冒辟疆。”并善意地转请徐主

席奉劝他们不要浪费时间。徐主席慎重地说,他将把相关材料寄给我看看。5月9日,收到徐主席快递来的11份材料,我用一天时间阅读了以冒廉泉先生的《红楼梦作者解谜》为主的一系列论文,基本掌握了他们的核心观点:其一,《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其二,《红楼梦》的作者是冒辟疆。我当即告诉徐主席,他们的研究成果我同意前一半,《红楼梦》的原作者确实不是曹雪芹。我目前也在研究这一课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另一观点,《红楼梦》的作者是冒辟疆,我不敢苟同。两个星期以后,徐主席和黄裕龙局长亲临南京,约我面谈。5月28日下午二时,在位于明故宫的武英楼宾馆307房间,徐主席和黄局长亲切地接待了我,并介绍了如皋讨论《红楼梦》作者的来龙去脉。我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出示了《红楼梦》和《红楼梦研究》两书中的相关段落。那就是《红楼梦》的作者不可能是冒辟疆的证据,黄局长一丝不苟地进行摘录。讨论在和风细雨的友好气氛中进行,前后大约两个小时。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红楼梦》作者李渔说的持论者朱江兵先生,在兰溪会议结束时,曾将他的六万字的长篇论文拿来请我审读。我业余时间看完全文,提出了意见。否定了他的《红楼梦》作者李渔说;肯定了其论文中关于《红楼梦》苏北方言的研究。大约一年以后的冬季,正好在春节前的寒假期间,我突然接到朱江兵法官的电话,他花费一年时间,钻研了《红楼梦》的蒙古王府本,发现其中如皋方言很多,特色鲜明,而且写成了专题论文,要送给我看——因为我曾研究过《红楼梦》中的苏北方言,也发表过论文——其实,我对方言只是一知半解,没有专门研究。因此,我建议他举办一个小型的民间学术讨论会,邀请一些专家参加;并承诺可以帮他邀请著名红学家与会。江兵的活动能力很强,朋友很多,通过努力,几天后,学术讨论会筹备成功。2013年1月19日下午,他派一辆专车来南京接我去如皋。到如皋后,江兵的朋友陶建兵先生开车,把我们带到位于水绘园旁的泊云酒家。小朱正在向专门研究如皋方言的老专家吴凤山先生请教问题,准备次日的学术报告。我也参与了热烈的讨论。朱江兵先生希望我能主持次日的会议,并做会议总结,我慨然应允。

次日清晨七点,我们开车去接南通大学的两位教授和南通电视台总监周鑫华先生以及摄像记者。南通大学的钱健教授是李渔研究专家,前年在浙江兰溪李渔国际研讨会上见面,后来也有一些联系,可算是我的学术界的朋友。徐乃为教授则是当今著名红学家,乃为兄是我大学同学,也是我的好友,前几年往来联系较多。这次我邀请他前来参会,他本来很忙,但老友相邀,他不好推却。周鑫华总监是南师大古文献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本来留在南师大古籍所工作,后调回南通,在电视台工作,不断升职,当了总监。去年为李渔研究事宜,曾专门来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采访过我,自称学生,听取我的意见。在李渔研究和纪念方面,他满腔热忱,本来应有大的作为,但此事后来无疾而终,想来有他的困难和苦衷。这次听说我来如皋参加会议,就带记者来采访会议。我与徐、钱两位教授一路畅谈,到了长江中的长青沙的生态园。会议的环境十分优雅,晴空万里,绿树环绕,空气新鲜,生态环境优美,会场古朴大方,布置得古色古香,令人忘俗。九时许,二十余名代表基本到齐。由我主持会议,宣布会议开幕。先介绍了到会的代表、专家,南通邮政局副局长陈玉东,现在是南通市

政协常委,算是市领导了,应邀到会指导。原来他也是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如皋人,毕业后分配在搬经中学教书,后来考上了南京大学研究生,学古汉语专业,读了博士学位。先分到邮政局办报纸,又参加了民主党派,还当上了领导,被派到南通市当副局长。从学术方面讲,对方言确实是内行的。多年未见,快五十岁了,其面貌并没有大变,今天不期而遇,他虽当了局长,还能执弟子礼。会议主角朱江兵先生做了学术报告。他讲了近两小时,主要是《红楼梦》中的如皋方言举隅,他侧重看了蒙古王府本,也对照了其他版本,并进行比较考察。发现该脂本中如皋方言较其他脂本更多。这一发现很有价值,收获不少,举例约有数百条,其中也有新的发现,当然也有的解释比较牵强。然后,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大家一一发表意见。大多数代表给与了热情的肯定。徐乃为教授即兴赋诗一首云:

天有晴光地有风,景嘉端为友喜逢。商量最重笠翁处,十二楼头可著红? 壬辰冬末,江兵先生召议红楼与笠翁,因作小诗一首奉赠,徐乃为于霄泉斋。

并亲笔写在宣纸上,在会上当众展示,赠给江兵作为纪念,令人耳目一新。他的字写得好,圆润质朴、飘逸老到,是一幅珍贵的书法作品,这也许是对江兵认真读书钻研的嘉奖吧。但是,他的观点很明确,《十二楼》和《红楼梦》风格迥异,不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李渔绝对不可能写出《红楼梦》这样伟大而复杂的小说。他直截了当地对江兵过去的观点表示了鲜明的否定态度。

不仅敢于挑战学术界关于《红楼梦》作者的权威观点,而且独力举办民间学术讨论会,居然请来了大学教授、电视台记者、总监,南通电视台还播放了新闻,实在是够新潮的了。

## 二

《红楼梦》与如皋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一点联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应该是有一点关系的。无论是《红楼梦》作者李渔说,还是冒辟疆说,其持论者都看了不少书,而且他们第一学历都不是文科,他们能够对《红楼梦》原作者提出质疑,这本身的学术勇气,敢于“亮剑”的精神,就难能可贵,值得高度赞赏。平心而论,他们都看到了一些《红楼梦》与如皋的关系。

说来我与《红楼梦》颇有缘分,大学期间,有幸聆听了著名古代小说研究专家谈凤梁教授的《红楼梦研究》选修课,于是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毕业的学位论文,就是论述《红楼梦》中林黛玉形象的。后来,学校决定我毕业后留校给谈凤梁教授当助教。一年之后,谈凤梁教授被提拔担任校领导,由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常务副校长,再到校长,一直到他病逝,真是日理万机,再也没有时间上课。他所教的课程只能由我来接替。三十多年来,“红楼梦研究”这门课反复讲了多少遍,已经记不清了,大概在五十遍以上。印象中南师大历届中文系本科生、研究生,研究生班、教育硕士班,以及南师大博雅课程班,都上了这门课;还延伸到南京的各大高校,南通大学、南师大泰州学院、常州信息职业学院、泰州实验学校,还有南京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宿迁的泗阳图书馆等文化教育单位,遍及全省各地。此外,我曾与另一位著名专家合作撰写了《红楼梦研究》一书,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多次印刷发行,成为红学爱好者的启蒙读物。多年来,我坚持每年写两篇红学论文,聚沙成塔,陆续发表论文数十篇。至

今已经阅读《红楼梦》不下几十遍。自己觉得,对于《红楼梦》多少有一点发言权。我以为,《红楼梦》与如皋确实有不少联系。

首先,《红楼梦》原作者熟悉苏北方言、如皋方言,肯定到过苏北,也有可能到过如皋。试举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中几例典型的如皋方言,加以分析:

1、堪堪,第二回,“堪堪又是一载的光阴”。堪堪,不足、差不多。如皋方言。

2、望亲,第四回,“一为送妹待选,二为望亲。”望亲,探亲。如皋南乡的张黄港以及毗邻的靖江、泰兴南部一带的方言。望,看。如,“这本书给我望望。”

3、强如,第五回,“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打呢。”强如,比……好。如皋方言。“轻微的体力劳动强如锻炼身体。”

4、先不先,第六回,“先不先,那些门上的人也未必肯去通信。”先不先,首先。如皋方言。

5、嚼用,第十回,“反倒在他身上添出许多嚼用来呢。”嚼用,吃穿零用等开支。如皋方言,至今民间还用。

6、多早晚,第十七至十八回,“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多早晚,不知什么时候。如皋方言,至今犹用。

7、谈话,第二十回:“你只教导他,说这些谈话作什么?”谈话,白话,扯淡。如皋方言,至今民间犹用。

8、村话,第二十六回:“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村话,粗俗的话。如皋方言,至今犹用。

9、稿子,第二十九回:“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稿子,代词。口语中东西和一切事物的代称。如皋方言,至今犹用。

10、餐,第四十一回:“你又赶来餐茶吃。”餐食,蹭饭吃;餐,如皋方言,读 zi,这里指蹭茶。如皋方言,至今犹用。

《红楼梦》中的如皋方言还有很多,可能有上百条。笔者仅举以上十则典型的如皋方言,意在说明,《红楼梦》原作者确实熟悉苏北方言、如皋方言。上述十例中有的在苏北其他地区也流行,不一定是如皋地区独有的。当然,《红楼梦》中也有吴语方言,如“落”(下)、“物事”(东西)、“事体”(事情)、“侬”(我)、“打降”(打架)、“派头儿”(盼头儿),等等。可见,《红楼梦》原作者也熟悉吴语。《红楼梦》中也有南京方言,最典型的如,n,l不分、“多大事?”,等等。学者邓牛顿甚至提出《红楼梦》中有湖南方言,认为小说作者是湖南人。当然,学术界普遍不认同他的观点。所以,单凭作品中出现的方言,是不能论定小说作者的籍贯的。

其次,《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到底在哪里?是南京还是北京?清初大才子袁枚曾说过,《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即吾家之随园也。其实,艺术典型不能简单地与生活原型划等号。鲁迅认为,艺术虚构手法有两种,一种是以一个原型为主;另一种是杂取种种人。大观园其实不是“以一个原型为主”,而是采取了“杂取种种人”的手法,塑造出来的艺术典型。学术界一致认为,大观园杂取了南京曹家西花园(即袁枚的随园)、芥子园,北京什刹海、恭王府、醇王府、明国公府,杭州南园、苏州拙政园等园林的特色。

大观园的垂柳像北京什刹海;密密石笋,像李渔芥子园;鸡鸣狗叫像韩侂胄南园;进门的巨大屏障像苏州拙政园。此外,大观园极有可能也吸收了如皋水绘园的某些特色。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提出,如皋冒辟疆的水绘园就是小说中的大观园,秦淮八艳中的董小宛曾跟随冒辟疆居住过水绘园,显然事出有因。可惜水绘园面积太小,现在的水绘园也没有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恢复清初水绘园的原貌,留下了不小的遗憾。(参见沈新林《水绘园探佚》,见《首届明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师大出版社,2004·10)看来水绘园与大观园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些方面需要有关地方领导重视,也需要学术界的深入研究。

再次,旧红学家索隐派的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的核心论点是《红楼梦》写清世祖(顺治皇帝)与董小宛(董鄂妃)的爱情故事,把林黛玉形象附会为冒辟疆的爱妾董小宛。“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奇女子也。相传世祖临宇十八年,实未崩殂,因所眷董鄂妃卒,悼伤过甚,遁迹五台山不返,卒以成佛。”而秦淮八艳之一的名妓董小宛,与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一见钟情,间关相从,历经风波,婉转跟随,在如皋水绘园生活过八年左右,制作了流传至今的董糖,最终病逝于如皋,演绎了一段生死不渝的爱情佳话。当然,索隐派的论点经不起推敲,不足为据,后来,孟森的《董小宛考》和《世祖出家事实考》发表,《红楼梦索隐》的核心论点便不攻自破,无立足之地了。简而言之,从人物年龄的差距,就可以看出索隐派完全是无稽之谈。董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1624),比顺治皇帝大十四岁。而董小宛二十八岁病逝时,顺治皇帝年方十四岁;头脑正常的人都会明白,这两人根本不可能产生爱情。但是有一点倒可以肯定,那就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形象里面,多少包含有董小宛弱不禁风,多才多艺,聪明可人,多愁善感,追求纯洁爱情的影子。至少索隐派作如是观;这也正是索隐派立论的理论依据所在。

笔者认为,《红楼梦》与如皋,至少有上述三个方面的联系。

### 三

《红楼梦》的作者肯定不可能是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之前(分别是1680和1693年)的如皋人李渔、冒辟疆。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红楼梦》到底写了什么内容?当然,对于《红楼梦》的内容与主题,争议颇多,至少有十多种不同说法。笔者在《红楼梦研究》一书中综合了为学术界大多数学者一致认同的综合主题说:“《红楼梦》以贾宝玉的爱情、婚姻悲剧为线索,写贾宝玉的人生道路;以贾宝玉的人生道路为重点,写贾府的子孙不肖,后继无人;以贾府的子孙不肖,后继无人为中心,写贾府的衰败;以贾府的衰败为典型,写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的衰败”。(《红楼梦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

我们认为,《红楼梦》主要是通过贾府写曹家的衰败,全书写了贾府一百年的历史,共计写了贾府五代,就是“水”字辈(贾源、贾法)、“代”字辈(贾代化、贾代善)、“文”字辈(贾政、贾赦、贾敬)、“玉”字辈(贾珍、贾琏、贾珠、宝玉)、“草”字辈(贾兰);重点写了最后二十年,从宝玉出生到十九岁出家。前八十回写了十五年时间。小说创作的规律告诉我们,一般带有自叙性质小说的作者都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形象和感情倾注在第一号正面人物身上,所以,原作者应该对应为小说的一号主人公贾宝玉。其

他,如吴敬梓《儒林外史》的杜少卿是“先生(吴敬梓)自况”;《家》中的觉慧身上有作者巴金的影子;曲波《林海雪原》中少剑波是作者的自画像,《青春之歌》的作者借小说一号人物林道静形象寄托自我,等等。那么,可以类推,贾母对应为曹寅母亲——康熙奶妈、一品夫人孙氏,曹寅则对应为贾政,早逝的曹寅之子曹颀对应为贾珠,曹寅之孙曹雪芹对应为贾珠之遗腹子贾兰,因为原作者对应为贾宝玉,所以,应为曹寅的儿子,应该比曹雪芹长一辈。袁枚所说的《红楼梦》作者为曹棟亭之子曹雪芹,是他不小心记错了作者的名字,而他说的作者的辈分是对的。《红楼梦》作者只能是曹家人,而且必须是曹寅的儿子辈。小说里有不少通过贾府写曹家的证据,现略举数例如下:

第五回,宁荣二公之灵囑吾云:“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无可挽回者。”国朝定鼎,指清代开国的1644年,贾府随满清统治者入关,已经过了百年,那么,小说是写贾府在清朝开国后的一百年历史,原作者应该生活到18世纪中叶以后。

第十三回,秦氏道:“……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百载,百年,与第五回的“虽历百年”照应,两者用以互证。这可以证明,小说的创作时间,确实在18世纪中期。

第十八回,写元春省亲。学术界认为,其生活原型是康熙南巡,曹家接驾。甲戌本十六回有脂砚斋批语云:“以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据史料记载,曹家三代四人担任江宁织造近六十年,曹寅任职时间最长,从康熙31年(1692)到52年(1713),长达22年之久。曾经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四十六年(1707)接驾四次。小说第十六回借赵嬷嬷之口说:“只预备接驾一次,花的银子像淌海水似的。”“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暖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相信。”“江南的甄家”,就是贾家的影子,“假作真时真亦假”,其生活原型也就是曹家。在元春省亲的具体场面描写的文字旁边,庚辰本侧有脂砚斋批语云:“难得他写的出,是经过之人也。”评阅者脂砚斋的身份应是原作者的书童(沈新林《脂砚斋与红楼梦原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2期),他和原作者有相似的遭遇,曾一起经历过康熙南巡的接驾盛典,其言当属可信。那么,原作者肯定是亲身经历康熙南巡和曹家接驾的人。

综上所述,李渔(1611—1680)、冒襄(1611—1693),出生于明万历年间,均逝世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之前,没有经历过康熙南巡,更没有经历过接驾,根本写不出《红楼梦》中关于接驾的内容和场面。可能有些持论者没有注意到小说中的这一系列的描写,更没有搞清其生活原型及其深刻内涵,也没有看过脂砚斋批语,单纯考虑作者的文字表达水平而已,于是充满自信,一厢情愿,所以马上得出大胆的猜测和结论。唯此,笔者郑重建议,凡染指《红楼梦》研究者,务必要认真读懂原著和相关评论,尤其是脂砚斋批语。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红楼梦》视为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与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相并列的特色之一;江苏海安籍著名红学家蒋和森先生则说过:“中国可以没有万里长城,但不可以没有《红楼梦》。”在他看来,《红楼梦》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万里长城。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作品中,《红楼梦》最为伟大,最为复杂(没有之一),不仅是古代小说的高峰,而且是古代文学的高峰。《红楼

梦》最不容易读懂,务必要下大力气,花大功夫,绝不能与其他一般小说等量齐观。笔者经常对学生们说:“不读《红楼梦》,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人。”看来,普及红楼文化已经刻不容缓了。

顺便说一句,现在学术界所认同的曹雪芹为《红楼梦》原作者,其实也不可靠。《红楼梦》原作者必须是和曹寅一起生活过,经历过康熙南巡接驾的人。这是无法改变的必要条件和刚性指标。而曹雪芹生年为 1715(或 1724)年,在其祖父曹寅死后方才出生,他没有见过曹寅,更没有接驾经历。雍正六年(1728)曹家被抄家,曹雪芹离开南京时年龄太小,也缺少创作动机。据资料记载,他只是诗人、画家,显然不可能创作出《红楼梦》。他作为曹家的后代,只是对《红楼梦》“批阅增删”的整理者,“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并按照脂砚斋的要求,改写了第十回至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的来龙去脉;并奉命写了不少回前诗;也做了一些评批工作,可谓最早的评批者之一。《红楼梦》的原始作者当另有其人。这个人应当是曹寅养子曹颀,是曹雪芹的伯父。当年曹寅三十无子,曾抱养一子,次年生下雪芹之父曹颀。曹颀,河北丰润籍,康熙二十六年(1687)出生,比曹雪芹大 28 岁,颖博聪慧,从小在江宁织造府长大,曾随曹寅在苏北仪征、扬州等地读书、生活多年,熟悉南京方言、苏北方言、吴方言,并亲历曹家接驾的盛典。后来因兄弟龃龉,不务正业,杂学旁收,对女性用情太多,有叛逆倾向,地位逐渐下降,遭到冷落,最后未能在曹寅身后接替江宁织造,并被遣返原籍。他“无材可去补苍天”,又经历过曹家的鼎盛时期,且目睹曹家的衰败,对曹家满腹牢骚,况又熟悉曹家的种种内幕和情弊;具有相应的思想水平和足够的才力,看到曹家衰亡的必然性,于是写下了传世巨著《红楼梦》。

甲午端午节于金陵亚东仙林茶苑百世堂

(通讯地址: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茶苑一栋 104 室,邮编 210046)

# 雉水才媛咏红楼

三 木

如皋自古女史多。她们中有数位与《红楼梦》颇有因缘。

冒襄的小妾董小宛是与《红楼梦》有密切关系的如皋佳人。笔者存有多种旧版《影梅庵忆语》(民国原版),其中录有相关内容甚多,简介如下。力推董小宛是《红楼梦》原型之一的是“索隐派”。此派有两本名著。一本是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蔡先生在书中说道宝琴的原型是冒襄,其例证之一就是“相传董小宛并非病死,而被劫入清宫,才有了石头记第五十回中灯谜‘草化为萤’的故事”<sup>①</sup>。另一本是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他主张《红楼梦》是暗指“顺治与董妃的爱事,而董妃就是被抢进宫中的董小宛;董小宛就是林黛玉的原型:‘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是苏州人,黛玉也是苏州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扬州。小宛来自盐官,黛玉来自巡盐御史之署’”<sup>②</sup>。由此可见,小宛是否入宫是成为她是否是林黛玉原型的关键;而小宛的死因又是小宛能否入宫的关键。陈衍先生在《石遗室诗话》中认为宝玉因黛玉死而出家就是隐寓小宛入宫顺治出家;罗惇融在《宾退随笔》中开始怀疑《影梅庵忆语》的真伪:“辟疆《影梅庵忆语》追述小宛言动,凡一饮食之细,一器物之微,皆极意缕述,独至小宛病时作何状,永诀作何语,绝不一及。死后若何营葬亦不详书。”<sup>③</sup>周瘦鹃先生在《读影梅庵忆语》一文中也对该文中小宛的结局表示怀疑。陈寅恪先生在名著《柳如是别传》中关于董的观点比较折中,他以为小宛非董妃,但是小宛不是病死,而是为北兵劫去。

撇开小宛与《红楼梦》的缘分,还有几位如皋女史曾经题咏《红楼梦》,值得一书。第一位是熊琏女史,如皋人,乾嘉时期著名的女才子。她的命运与袁枚三妹素文有相同之处:幼时由父母定下与同里陈家联姻,后陈得废疾,夫家欲废婚约,熊琏不从,嫁到陈家;后半生因家贫,依附母弟家中<sup>④</sup>。

熊琏曾作一首《满庭芳 题十二金钗图》:“日暖花梢,香飘帘幕,十分春在红楼。传杯满酌,笑语不知愁。试问偎红倚翠,东风谁最温柔。都猜作神仙谪降,笙鹤下瀛洲。赏心人已醉,栏干倚遍,一片云头。任轻翻舞袂,慢转歌喉。谁道书中有女,终输与金谷风流。多应是明珠买艳,花月尽勾留”<sup>⑤</sup>。

《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年间,可见熊琏是最早为红楼梦填词的女史之一。词中未



有一丝悲色,描述了十二金钗宴饮游戏、比才斗智的娱乐生活场面,不禁使人想起了《红楼梦》中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和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的场面。如此乐景在高鹗的续集中已“了无踪影”。熊琏所见的《红楼梦》应是最初的八十回本。《满庭芳 题十二金钗图》对于红学研究非常有意义,曾入选中华书局于1963年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二册。周汝昌先生曾在《买椟还珠可胜慨——女诗人题红篇中》称熊琏为名人,《清史稿》有记,并根据词义推测这首词可能是熊琏的少女之作。笔者曾翻阅过《澹仙词钞》,发现这首词排序非常靠前。古人的诗词集往往是按创作时间排序;因此《满庭芳 题十二金钗图》很有可能是熊琏的早期作品。在时间上,熊琏少女时代应为乾隆时期;在地方上,熊琏只有婚后一段时间客居同里,其余时间都住在如皋;少女时代的熊琏在如城就见到《红楼梦》!换一句话,如皋在乾隆间就出现《红楼梦》了。

熊琏为何有机会接触到《红楼梦》呢?传统说法都认为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南通红学研究者邱华东曾在《曹家巷·曹雪芹》一文中记述,冯其庸曾告知他,如皋有条曹家巷,曹雪芹和如皋曹家祖上同族;曹雪芹曾去过如皋。邱文在冯先生的启示下,进一步考证出曹寅、曹雪芹很有可能与如皋文人墨客有所交往。熊琏的诗词作品中说明她曾与多位如皋文人有过交往。因此熊琏能在乾隆时期读到《红楼梦》不足为奇。

第二位是娱清女史郑兰孙,清末钱塘人,夫徐鸿谟为诸生,子徐琪为进士,工诗词,为俞樾赏识。郑兰孙虽不是如皋人,但如皋可以说是她的“第二故乡”。笔者存有光绪元年刻本《莲因室诗词集》(郑兰孙著)。据此书记载,徐鸿谟在扬州为官(任扬州府经历)，“咸丰癸丑扬城告警(1853年,“太平军”准备攻打扬州)<sup>⑧</sup>”,郑兰孙携家人迁往如皋躲避战祸,在如客居多年,直到她离世。

郑兰孙作有《读红楼梦前后传奇戏题》二首:其一是“情长情短总情痴,飘渺红楼事可知。漫把灵犀通密意,空将凤纸写相思。缘深木石遭媒妬,雨冷潇湘欢病迟。莫怪骚人心不死,文章做到返魂时”;其二是“诗思如蚕乙乙抽,分题睹韵共绸缪……红楼几许关心梦,不是情深不解愁。<sup>⑨</sup>”时为清末,高鹗续集已经流行,《红楼梦》也早被改为戏曲,流传于民间。“缘深木石遭媒妬,雨冷潇湘欢病迟”明确表示郑兰孙已经知道续集中“林黛玉是病魔缠身,宝黛的爱情最终以悲剧收场”。纵观《莲因室诗词集》,诗序基本以作诗时间为序。此诗为上卷前列,很有可能是郑兰孙来如之前或在浙江或扬州所读《红楼梦传奇》的感受。

郑兰孙还有一首写过友人宗友石的古词《前调(宗友石嘱题其友人画(红楼梦)歌伶纨扇)》:“即空即色,幻境荒唐人不识。恨海情天,黄土朱颜尽可怜;韶华难驻,几个聪明能觉悟。曲度云屏,多少红楼梦未醒。”<sup>⑩</sup>这首词作于如皋。理由如下。第一是诗词序中的时间暗示。在《莲因室词集》中,《前调》排序靠后,多首之前录有《壬子七月二十夜纪梦》;显然《前调》写于1852年之后(郑兰孙大约在1853年后来如客居)。宗友石是郑兰孙的好友,《莲因室词集》录有数首郑兰孙写过宗友石的词作;《莲因室诗集》中也有一首《题宗友石扇》,排在《如皋寓斋感怀》之后,由此可推宗友石很有可

能是郑氏来如后结识的地方文人。宗友石的生平证明了笔者的上述想法是有道理的。宗金树：“字友石，清如皋人，道光二十八年贡生，选新阳县训首”<sup>9</sup>。笔者所存光绪庚寅秋雕印的《莲因集》（悟能和尚编，内容为晚清如皋文人诗词集）也录有宗友石诗作多首。因此宗友石是如皋诗人无疑。宗友石请友人绘有《〈红楼梦〉歌伶纨扇图》，再请郑兰孙题诗。

第二从内容上也可判断出是郑兰孙在如的作品。“即空即色”等词句都充满悲观的佛语感悟，说明郑兰孙通过阅读《红楼梦》已经有感人生的无奈和苦闷，以及人世间的荒唐。在来如之前，郑兰孙过着相对悠闲的生活，幼时随外祖父学画写诗，后嫁于官员徐鸿谟。直到“太平军作乱”，她不得不过来如避难，逃难过程中，饱受人间疾苦，夫离女散，看破世事。从《莲因室诗词集》所录作品可以看出，来如后的郑兰孙笃信佛教，常读佛经，并与地方文人莲友多有交往，还游玩了定慧寺等如皋寺庙。因为有了自身的“乱世经历”，郑兰孙在看《红楼梦》时别有一番“因缘”在心头，才能写出充满佛家哲理的《前调（宗友石嘱题其友人画〈红楼梦〉歌伶纨扇）》来。当然从作画到题诗，也客观上体现出如皋文人对《红楼梦》的喜爱之情。

最后说说广陵女史赵笈霞。她是扬州人，仲振奎的妻子。民国时期，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第十二章就说“仲云润（仲振奎）改篇《红楼梦》最早”。近人刘聪泉在《红楼戏曲第一人——〈红楼梦〉戏曲首编者如皋仲振奎》一文罗列出“仲振奎为时为泰州如皋西场（今属海安县）人”的种种证据。因此赵笈霞也可视为如皋人的媳妇。她写有长诗《〈红梨梦〉传奇题辞》：“是真是幻总难真，幻出无端梦里身。一树红梨花落寞，凄风残月独伤神。断情漫道竟无情，悄曳虚廊玉佩声。一行阑干春寂寂，愁魂扶病认飞琼。范范无路莫相思，便是相思梦岂知？灯暗书牕人不见，三生缘短泣残丝。休伤梅叶展香囊，空向梅花唤断肠。一曲歌残红泪尽，春风春雨忆兰娘”<sup>10</sup>。诗末“兰娘”是剧中主人公，并非“黛玉”：《红梨梦传奇》与《红楼梦传奇》是两个剧本。在仲振奎的剧作中，并未有《红梨梦传奇》传世。作为一位女性能为此书题词，《红梨梦传奇》可能是仲家人自己的创作，仅限于家人间流传。从此书的题目《红梨梦传奇》到“是真是幻总难真”的主题，均与《红楼梦》相近，再次说明了如皋文人十分喜欢《红楼梦》。

红楼有梦雉水情，女史作诗千古传！

#### 主要参考文献：

[1]熊琏，《澹仙词钞》，嘉庆二年茹雪山刻本。

[2]郑兰孙，《莲因室诗词集》，光绪元年刻本。

[3]赵笈霞，《辟尘轩诗钞》，清刻本。

#### 注：

[1]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p51。

[2]赵茗狂，《影梅庵忆语考》，《影梅庵忆语香畹楼忆语合刊》，上海：世界书局，1943年，p5。

[3]罗惇融，《宾退随笔》，《影梅庵忆语》，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p67。

- [4]如皋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如皋县志》,香港新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 p782。
- [5]熊琏,《澹仙词钞》卷一,嘉庆二年茹雪山刻本。
- [6]徐琪,《莲因室诗词集附记》,《莲因室诗词集》,光绪元年刻本,卷下。
- [7]郑兰孙,《读红楼梦前后传奇戏题》,《莲因室诗词集》,光绪元年刻本,卷上。
- [8]郑兰孙,《前调(宗友石嘱题其友人画红楼梦歌伶纨扇)》,《莲因室诗词集》,光绪元年刻本,卷下。
- [9]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编,《江苏文艺志南通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P404。
- [10]赵笈霞撰,《<红梨梦>传奇题辞》,《辟尘轩诗钞》,清刻本。

(如皋怡年路 118 号 102 东室 彭伟收)

# 濠河文化概论

赵明远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历史名城都和河流紧相毗邻。河流作为重要的资源和环境载体,维护着城市生存,影响着城市风貌,也培育着城市的灵气。南通的濠河也是这样一条河流,从公元十世纪起,她一直拥抱着南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今天,濠河更是生态宜居、人文荟萃、景观亮丽、活力四射的文化名片。

“濠河文化”是南通文化区位的核心,是凝结千年的文化精华,是城市的灵魂和标识。“濠河文化”承载着南通“天人合一”的城市智慧、“上善若水”的地域性格、“智者乐水”的文化创造和“崇川福地”的美好追求。

—

南通地处“江淮之委海之端”,是长江口漫长地理发育的成果。这里气候温润,地平壤沃,河网密集,湖泊棋布,生态资源丰富。濠河区域在今天南通城区的中心地带,它的历史可上溯南北朝时,当时还是长江口偏远蛮荒的沙洲,史称“胡逗洲”,至唐末方同大陆相连。最初来这里的开发是来自天南地北的“流人”,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垦、制盐。唐代中晚期,这里设有“盐亭场”、“狼山镇遏使”,经济社会有了缓慢的发展。

唐末天下大乱,长江口南北两个割据政权隔江对峙了数十年,南通“濒海控江”的地理位置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同时出于控制沿海盐产资源的需要,建城已成为当时军政机构的必然选择。唐末有姚氏家族割据于此,“修城池官廨”,前后历五世。公元 958 年后周军队占领此处,设“通州”,筑州城,濠河的基本功能正式开始显现。

自古以来,逐水草而居就是人类生存生活的最初形式,依山傍水就是对居住环境的理想选择,江河湖泊对城市的形成有着巨大的意义。南通先民在这块年轻的土地上建造城池,选址构筑颇见匠心,它讲求山川形胜,关照风水气象。他们利用沙洲发育过程中形成的水泊河网,加工成濠河环抱城市,城内有水泽池塘,市河蜿蜒,呈现城水相拥的水城景象。州城面向长江,以署衙前为中心,呈“方型丁字街”的典型格局。这座城池展现了南通先民“天人合一”的建城智慧。公元十世纪奠定的南通城池格局延续了一千年。

濠河基本的功能首先是与城墙共同构成的城防系统,濠河“特深广,望之汪洋,足称壮观”,<sup>[1]</sup>对护卫城市有很大作用。但是南通地处偏僻,“南阻江,东北濒海,士大夫罕至”,远离政治中心,经济尚不发达。宋初以后,通州战略地位并不为兵家看重。一千多年来,南通城除了经历过宋末、元末的战事和倭寇的袭扰外,长时期处于和平安定状态。宋代这里即有“淮南道院”之称,明清更有“崇川福地”之誉。

濠河不仅是护城河,它更为城市生活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人们初赖鱼盐以为业,更由耕织楫运而饶足。濠河发达的水系为城郊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南宋时州治所在静海县已成“望县”。明代以后南通的棉业生产发展起来,“香稻穗抽闻哈吠,白棉花发似人高”,“夹岸柳丝云碓响,万家篝火布机鸣”,<sup>[2]</sup>通海平原逐步成为了重要的棉花产区,城郊土布业也发展起来。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商业渐趋繁荣,商店沿街分布,各城门、河稍、桥坝处形成各有分工的商贸集市。濠河城外“北接淮水,西汇江潮,东达诸场”,城内“市河”折流贯穿,水运发达,“城中民擢楫运刍粮,转输百货,东西南北往来不绝如织”<sup>[3]</sup>。城市内外发达的河道水巷,为居民提供了用水、船行、货运、排污的便利,为市井生活提供了良好环境,发挥了生态调节的功能,自古即有州城的“人身脉络”之称。

在长江口北岸、江海平原上,濠河默默地滋养着通城万兆百姓,并承载着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功能。一千年来,濠河环绕的这片区域成为南通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带。

## 二

一千年多前,南通的先民背井离乡、飘零汇聚于此新陆,他们面对的是江潮海飓,蛮荒僻壤,他们辟斥卤而为膏壤,变沧海而为桑田。江海阻隔的地理条件,来自各方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军屯开发、官盐劳役的集体生产方式,各种因素在此狭小区域内汇聚交集、充分糅合,共同构成了“濠河文化”的基因,形成了“濠河文化”独特的风貌。

南通成陆初期恶劣和危险的环境塑造了濠河居民勤劳、坚韧忧患的品性,也延续了敬畏自然造化、崇拜祖先神灵的心理。宗教信仰与神灵崇拜通州一直都很兴盛。建城之初,城内已有光孝天宁寺,宋代太平兴国教寺、兴化教寺、城隍庙等陆续兴建,保留至今。至清代,各类庙观祠庵达八、九百座,而以“童子会”为代表等各类祀祖祭神、巫傩戏会更是遍布乡野。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濠河文化有着崇尚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共生的鲜明特质。濠河先民自古即以良善淳朴、与世无争、安贫轻利的社会风尚著称于世。北宋通州知州杨阜谓:“讼庭多虚,圉圉空隙,殆有古之淳风。”<sup>[4]</sup>明《万历通州志》记载:“通州风土庞厚,民俗醇雅,甲诸维扬。”特别是通州城内市民长期安逸生活,养成了他们“性柔脆,不任劳苦”的性情。<sup>[5]</sup>虽然南通地区盐、棉、布生产商品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但人们的从商意识很淡漠,“商不列肆,不赶集,不以妇女主店,不久客在外,仅于本土贸迁有无”。<sup>[6]</sup>以致本地外输的棉、布多由山东、福建、广东、南京等地客商集散。

但是,无论南通先民如何迷神信教、良善无争,对“儒学”的倡导和追求仍是他们

的精神文化主流。五代时通州始建州学,静海有县学,宋代通州始设书院,建文庙。科举方面宋时已有“利市州”的赞誉,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是南通读书人的奋斗目标。南通人甚至不惜资财移壮武营射埭、疏浚市河淤塞、建文峰塔于濠滨,以利科考“风水”,助文风兴盛。近代以来,更是著名的“教育之乡”。濠河之畔家弦诵而户诗书,南通人崇文重教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钟灵毓秀,美丽的濠河滋养和激发了南通人文化灵感,濠河成为地方人文气聚集、文人荟萃、文脉延续的胜泽佳境。“濠河文化”是南通地域文化的核心。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自明代以来,南通文风日盛,乡贤墨客雅集结社,借助濠河景观建起珠媚园、退园、冠芳园、云深馆、苍翠园、石圃、借水园等林苑别馆,“山茨社”、“五山画社”等社团笔墨交游于其间。“楼阁参差胜迹留”,濠河迎来了冒襄、李渔、李蟠、黄慎、郑板桥、袁枚等名人的游迹,历代文人留下翰墨丹青无数,《光绪通州志·艺文》著录的明人著作共 400 多种,《崇川诗抄汇存》诸家合集收诗 113 卷。其中以诗书传后世家大族有“司寇一门俱善诗”的陈氏家族,“十世衣冠数卷诗”的李氏家族,诗文延绵十三世的范氏家族等等。

濠河之滨具有深厚造诣的文化名人层出不穷。明代名医陈实功所著《外科正宗》以“列症最详、论治最精”见称,顾养谦、范风翼、包壮行等的书画名声鹊起,祖孙三代“白氏琵琶”、柳敬亭评书艺惊通州城。清代南通书画更为兴盛,张经、李堂、李山等结“五山画社”于濠滨,“通州三钱”的山水画、“陶朱李白”书法著称一方,而“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以及“江南江北个道人”丁有煜的诗书画影响深远。晚清南通还有金石学家冯云鹏、云鹓兄弟,天文算学方面的专家蒋煜、周懋琦等,范当世作为“同光体”主要代表载入中国文学史册。历代文化名家为濠河不断增添底蕴和色彩。

### 三

自古以来,南通地域文化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空间构成形态,即长期并存着几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例如北部有“海陵文化圈”、南部“沙地文化圈”等,它们分别被认为是维扬文化、吴文化的支脉,古通州中心地带的“濠河文化”对它们影响力有限。十九世纪以降,中华文化整体上已呈颓势,随着漕运、盐运的衰落,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战火的破坏,维扬文化、吴文化中心地带的经济社会趋于萧条,而处于中西文化碰撞前沿的海派文化异军突起,迅速形成优势。此时的南通在周边强势文化消长的夹缝中,抓住机遇,实现了“濠河文化”的整合和提升,成为外国友人心目中的“理想的文化城市”。

“濠河文化”的提升首先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成果。十九世纪末,中国社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和动荡中,南通以张謇为代表的先贤以“地方自治”为倡导,开展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实践。从 1895 年创办大生纱厂开始,他们大力引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文化,实施“地方自治”,希望为中国的进步探索一个可资仿效的模式。以大生纺织公司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的土布业、植棉业紧密结合产生了巨大的“联进效应”,南通地方经济由此崛起。随着大生企业集团的现代经济实体延伸至苏北各地,“通崇海泰总商会”、“通海五属学务公所”等跨区域团体组织影响的扩大,南通的势力直接延伸至广阔的江北淮南,南通城拥有了区域中心的地位,“宛然有为江

北一带之首都之现象”<sup>71</sup>。

“濠河文化”的提升又是南通城市发展的成果。南通的近代城市建设重点区域在州城之南濠河沿岸。1902年起,张謇等在南濠河畔集中兴办数十家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市政水利、通讯公交、金融贸易、慈善公益机构设施以及各类自治机构和社会团体,近代意义上的城市经济、文化功能日益完备。张謇将南濠河沿岸规划为新的城市中心,开辟新式马路、疏浚河道、新建桥梁、拆除城墙,五座公园临河而建,城市风貌更为疏朗开阔,濠河的景观价值大为提升。“濠南苑囿郁璘彬,风物骈骈与岁新”,<sup>72</sup>濠河之滨渐次矗立起城南别业、濠南别业、俱乐部、总商会大厦、淮海实业银行、更俗剧场等高大的西式建筑,这些建筑和景观不仅改变着城市空间格局和风貌,更让南通人强烈感受到一个全新的时代来临。

“濠河文化”的提升还是中西文明交会聚集的成果。近代南通以“包容会通”的全新理念主动吸收西方文化,积极传播科学知识。“南派北派会通处”,濠河文化的开放和包容,吸引了王国维、陈衡恪、江谦、沈寿、欧阳予倩、诸宗元、雷炳林、朱东润等大批名流学者以及特来克、金沧江、木村忠治郎等数十名外国专家前来任职任教。戏剧大师梅兰芳和欧阳予倩在更俗剧场同台演出,沈寿将苏绣发展为“仿真绣”获世界博览会大奖,徐立孙、邵大苏从南京高师带回了“梅庵”古琴,陈衡恪、李苦李带来了“海派”书画艺术。“苏社”、“中国科学社”等著名团体以及杜威、梁启超、陶行知等中外名人纷至沓来,在濠河边集会、参观,留下无数赞美之语。

“濠河文化”的提升还是文化自觉与追求的成果。近代南通普及基础教育,发展现代文化事业,南通师范、女子师范、南通中学以及纺织、农业、医科、商业各专门学校为南通培养着新型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翰墨林印书局、博物苑、图书馆、更俗剧场、女红传习所、伶工学社等科教文化设施普及着科学知识;濠河之滨举行的赛会、展览、游园、戏剧、出版等新型文化活动潜移默化地提升着社会成员的精神品位,南通由此拥有了浓郁的现代文明气息。在新民主革命时期,濠河边还涌现出如新民剧社、小小剧社、青年剧艺社等富有影响的进步文艺社团和顾民元、史白、徐惊百、江村等一批有才华的文艺青年。一百年来,徐益修、孙支厦、王个簪、尤其伟、魏建功、袁翰青、赵丹、王铃、赵无极、杨乐等大家从濠河边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

近代南通以濠河为中心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向心力,使原来海陵文化圈、沙地文化圈对维扬文化、吴文化趋向几乎被扭转。这种凝聚向心的强大力量来自于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先进文化对原有形态的冲击,使南通不同地带的民众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归属和认同。近代南通所崇尚践行的艰苦自立、发奋图强、尚学求新、包容自信、诚信奉献等等精神理念为“濠河文化”注入了全新因素,是“濠河文化”的全面革新和提升。

#### 四

斗转星移,濠河已静静地流淌了千年,她是全国范围内保存下来为数不多完整的护城河之一。如今,濠河历史上所拥有的城防、供水、排污、航运等功能已逐步退去,旅游、景观价值与生态、文化功能则不断放大。她成为南通城市集体记忆的载体,是市民精神维系者和传统文脉的继承者。她时时唤起市民的乡土归属和文化认同,

满足着他们亲近与回归自然的心理。同时,濠河是中外来宾认识南通、感受南通的理想空间,是南通最为鲜明的城市特色和标志。

随着时代的发展,南通城市规模已与往日不可同日而语,但老城中心的濠河区域仍是南通现代城市空间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与新城区共生共荣。在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她仍然保持着健康的肌体和靓丽的青春,并一如既往地激扬着这个城市的智慧、灵感与创新的活力。她不仅在娓娓地讲述着过去的故事,还在演绎着全新的内容。如今,她的周边建起了十数个博物馆,她每年要迎接数十万中外嘉宾的来访;她的身旁活跃着数万名“莫文隋”、“江海志愿者”,演绎着精神文明“南通现象”;通过多年的治理,濠河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2012年更荣获国家AAAAA级风景旅游区。南通因濠河而拥有“文博之乡”、“教育之乡”的美誉,陆续荣获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殊荣。濠河凭借其区位优势、宜人环境和文化空间,持续保持其无可替代的中心地位。

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下,“城市能不能保持独具的城市文化特色、发扬城市优秀的文化传统,实现城市新的文化理想,这是一个艰难的行程,也是一片广阔的天地。”<sup>⑨</sup>今天,南通正把自己建设成为长三角北翼现代化中心城市而努力着,在我国大部分城市都以“千城一面”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南通精心打造以“濠河文化”为代表的城市特色,不仅避免了城市的平庸,而且对南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濠河文化”是南通的魅力所在,是当之无愧的城市文化名片。

#### 参考文献:

- [1]光绪《直隶通州志》建置
- [2]李懿曾《望江南·通州好》
- [3]光绪《直隶通州志》建置
- [4]见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
- [5]康熙《通州志》
- [6]万历《通州志》
- [7]驹井德三.日本驹井德三的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M].南通:政协南通市委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63.
- [8]张謇《营博物苑》
- [9]单霁翔《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7

(此文系作者为“江苏地方文化名片丛书”《濠河文化》所写的前言)

(联系地址:南通市世纪大道6号,南通市文广新局)



# 钱啸秋与钱素凡

——志同道合、禀赋通融的父与子

宋方

在通城寺街的石桥头巷内,有一座钱氏老宅,它是我市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钱啸秋先生和我市“三·一八”烈士钱素凡先生的故居。钱啸秋先生与钱素凡先生是一对父子,他们在南通市的历史上留下了重彩的章节。

钱啸秋先生(1890~1965)原名钱绳武。在南通中学读书时就参加隶属上海光复会的“侠团”,作为驻通的侠团重要骨干,“负责募集北伐捐款,支援山东烟台胡瑛,响应滦州起义。”通州光复后,侠团维持城厢秩序,“每日黄昏以后……即荷枪实弹,巡游城厢内外。”<sup>[1]</sup>1911年应聘任通州第一高等小学教员。1921年起,先后在南通商益初级中学、私立崇敬中学、张謇中学(今南通师范学校),南通县女子师范学校及南通中学任教,授地理、国文、历史等课程。后参与创立私立中学,任教导主任。20年代末,曾任《通海新报》主笔三年,1927年8月至1931年3月,任南通县教育协会主任委员、南通县教育会主任委员。1949年2月南通城解放,由市人民政府委任为南通中学校务委员会委员。1949年8月至1965年3月,任南通市副市长,分管教育、文化、卫生事业,是南通市第二届至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一生主要著作编入《钱啸秋自选集》。<sup>[1]</sup>

钱素凡先生(1912~1946)原名钱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沪江大学附中高中部读书,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开除学籍。回通后在南通中学求学,次年入中央大学地理系学习,继续参加抗日活动。抗战爆发后,在南通参与组织东北军57军111师抗日义勇宣传队,并编辑《军民导报》,宣传抗日。11月宣传队随军离通,钱素凡留通任教。1938年后,先后于上海通州中学、东台角斜南通中学、如皋潮桥南通商益中学、苏北公立南通中学、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等校任教,授地理、国文、历史等课程。1944年1月至8月,任女师校长。抗战胜利后又回南通中学任教。1946年3月18日,钱素凡作为南通市文艺协会七人理事之一,积极参加欢迎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淮阴执行小组来通,并组织进步青年游行示威活动,遭反动当局逮捕杀害,是南通“三·一八”惨案烈士之一。一生主要著作编入《钱素凡文集》。<sup>[2]</sup>

两位钱先生,是我市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爱国人士、民主斗士和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同出一个门第,虽然所处时代不尽相同,但他们这对父子的人生经历、

人生目标、职业志向、专业追求、做人品格诸方面,却有不少相通互融之处。从他们的人生轨迹看,既有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又有儿子对父亲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儿子的钱素凡死在父亲钱啸秋的前面,这虽然有违常理,但无疑是当时恶劣的时世所造成。不过,我们从中也可以发现,我们的民族、国家,小而言之,一个家庭,之所以有希望,那是因为常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壮观。这种动力,使我们的前辈甘于不惮前驱,努力作出无愧于后辈的业绩。

两位钱先生,他们终身的主要职业是教师,他们都把教育视为“立国之本”,认为“合理的公平的社会,要靠教育来建立”,而教师的主要责任是“教人、并不是教书”。他们同样认为,学校的人际关系,主要是师生关系。钱啸秋先生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不一定年纪大的人,学问一定比我好,年纪小的人,学问一定比我丑。师生是师生,年龄是年龄,是毫不相干的”。(注①165页)钱素凡先生谈到师生关系时,曾说:“人总是感情的动物,人不能没有知己。师生关系处得好了,便也成了忘年知己,这种趣味,是局外人所不能享受的。”他还说:“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决不能只靠了智技的授受来建立……要令先生们同个个学生接触的机会均等,影响的深度相同,在事实上也决难做到……但师生之间有了真的感情,其相互间的作用便有增无减”(注②659页)

他们一向主张,为师者首先要善于学习,勤于业务,把精力用在教学上。钱啸秋先生曾这样批评过教师的情急:“修改学生作文……一班有五十个人,一星期就要改五十本。苦恼诚哉是苦恼,可是既做了教员,就没法摆脱这苦恼了……某中学的高中科,听说每学期只做三篇(作文)。这种教员,恐怕非抽懒筋不可了”(注①142页)。他还说过:“人的精力,本来是有限的……但是用了过度,就要渐渐的丧失弹性,所以,这四会(会议、会客、演讲会、宴会)之中,会客和宴会两项,尽可声言谢绝,省点精力,去干正当的工作”(注①130页)。

钱素凡先生也同样认为:“学者也不过是表示他是一位笃于学、乐于学的人而已,因此……我们得先学最基本的,再学最适合于我的和最适合于人的,最适合于这个时空的”(注②640页)。他还说:学生所敬爱的老师,“必须学识渊博,教法纯熟,进度适中,道德高尚,生活严肃,最要紧的,还要明白学生的心理,肯耐心地帮助青年解决一切生活上的困难问题”(注②658页)。

钱啸秋先生与钱素凡先生共同的教师生涯中,还有一点值得一书:他们俩在学校又都主授地理学科。两人相较,钱素凡先生因在中央大学地理系的深造,他对地理学科的理解和探究显得更为深刻,相关的视野也更为广阔。但他们对地理学科思想的理解,都是一样的精深。他俩在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中,都视地理教学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因此他们都对之有哲学层面的思考。钱啸秋先生认为:“地理为须了解各种自然现象,便不能不借助于自然科学的天文学、地质学、气象学、海洋学、测量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等各种基本知识;为须了解人文演变之过程,便又不得不对社会科学之人类学、语言学、宗教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等,先有相当之研究”(注①187页)。钱素凡先生也认为:“时代越向前进展,人的相互作用便越发地错综,政治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之所以能独立成为地理学中的一个专门部

门,想来也是必然的趋势了”(注②367页)。比如他在《从气候学来研究中国的水旱》这篇地理学术论文中,就是用“纵史横地”的论证方法,从“历史”的方面,引用何西(A·Hosce)、竺可桢、陈达三位科学家的研究资料,同时又从“地理”的方面引用前三位科学家的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去探究中国水旱的原因及水旱的特点(注②374页~376页)。钱素凡先生的这篇论文,首先发表在中央大学刊物《校风》上。中央大学地理系,经常邀请水利工程专家到校做学术演讲,作为该校学生的钱素凡先生却大胆地提出:“大概是因为观点的不同,对于气候这一个很重要的地理环境因子,是没有听到他们提及多少……”(注②374页)。钱素凡这个未出茅庐的年轻人,敢于在权威面前提出新的观点,这是一种何等可贵的学术勇气!他的《意大利侵阿(阿比西尼亚,即今埃塞俄比亚)地理上的背景》、《开发华北问题之透视》等地理学术论文,还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华北开发与日本企图攘夺我国的预见进行地理学意义上的剖析。无疑,钱素凡先生的学术眼光更针对时事,更指向未来,把学科教学研究与现实社会问题研究结合得更为具体,更为紧密了。

这对志同道合的父子,在教学生做学问上是如此默契,在教学生做人方面,也同样戮力同心。他们以亲身参加社会活动的践行,以笔作刀枪,向着腐朽势力顽强战斗的勇毅,时时刻刻地感染着他们的学生。他们从民本出发,发于胸臆的大爱大恨,常常以校内校外的公众场合、报刊杂志为阵地,或高声疾呼,或轻歌漫语,充分展现自己的战斗策略,不但成为莘莘学子们的人格导师,还成为南通文化人的行为楷模。

更值得敬佩的是,他们父子俩,十分鲜明地展现出如此精湛的斗争技艺:在政治环境十分复杂的年代里,他们时常变换着笔名和报刊阵地,以“曲笔”的手法,绕过专制者的“审查”,让他们的战斗檄文得以见报发表,其委婉的手法,巧妙的战术,幽默的笔调,至今令人敬佩。

当时,这对父子发表文章的报刊主要有《校风》、《通中校刊》、《军民导报》、《通海新报》、《江北日报》、《北报》杂志等报刊。其间,钱啸秋先生担任过《通海新报》的主笔,钱素凡先生担任过《北极》(半月刊)的主编。这对父子,携着手,抱成团,发表大量揭露敌人、痛斥专制的诗文,“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钱啸秋先生在杂文《领袖》一文的开头写道:“天下最难做的人,莫过于领袖。”似乎在帮“领袖”诉苦,然而他笔锋一转,接着写道:“做领袖的资格,确确是非聋不可——聋而痴愈妙……能装痴的人们,无论任何包围,都不为所动。痴也是秘诀呢”(注①150页)。他在杂文《道德》一文中这样写道:“前天首都尧化门的火车劫案……当然谈不到什么道也德也,谁料他们包围列车分途抢劫的时候,彼此所呼的口号,却是‘道德’二字……‘道’其‘盗’之讹欤,‘德’其‘得’之讹欤”(注①151页)。他一针见血:这样的“道德”,实为“盗得”!

钱素凡先生的“曲笔”手法,同样运用得得心应手。他在杂文《蚊的威权》一文中写道:“我们在夏季所受那些专门的剥削人膏脂、夺人生命为生涯的魔鬼……第一要算蚊子,第二才是苍蝇……蚊乎!你们不要过于放肆!……须知以后无论天气是大热还是大冷,断乎再没有你们这些跳梁强盗插足的余地”(注②113页)。——你听,难道素凡先生只是在警告那些蚊子?钱素凡先生在杂文《假面具》一文中写道:“现在社

会上,每每有一种大佬,也像小孩子们一般,备着许多各色不同的假面具。他并非是像小孩子们套了玩耍的,他的意思是为应酬的,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到什么时候装什么脸,可以随机应变,令人神妙莫测,真是处世为人的好工具呢!”(注②81页)他对两面派、变色龙式的人物的揭露,是多么地痛快淋漓!

总而言之,钱啸秋先生与钱素凡先生一样,他们痛恨那些“专门以剥削人的膏脂、夺人生命为生涯的魔鬼”,痛恨那些“当着未上台的时候,总把台上的人骂得个痛快淋漓,及至自己上台,反而去传他们的衣钵”的市侩和两面派人物。在两位先生的眼里,那些站在民主大众对立面的虫蚁和魔鬼,全是他俩的死敌。

用笔作刀枪,在两位钱先生所处的年代,常常是有思想、有抱负、有理想的文化人惯用的克敌制胜的利器。两位钱先生,他们对各类文体,驾轻就熟,篇文章,意韵高远。在他俩的文集(均已出版)中,有的纵论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安全和平,有的详析官场内幕,乡俗民情,真可谓上穷远古,旁及异邦,近逮人生,远眺星外。他俩留给后人的文化财富,真是享用不尽!

我曾先后参与了《南通市教育志》和《南通市政协志》的编写工作,分别为志书撰写过钱啸秋先生和钱素凡先生的传略。而对两位先生的进一步了解,则是深入研读了《钱啸秋自选集》和《钱素凡文集》,特别是参与了对钱素凡先生的思想研究之后。我觉得,这一对父子在人生经历,人生目标,社会理想,思想方法,功绩建树诸方面有很多相似相通之处,于是,很早就想对这对父子作一个综合评述。

我在构思这篇文章之前,请教过钱啸秋先生的孙子、钱素凡先生的儿子钱炜先生。他对我说:“这篇文章的立意很重要。一个反常的现象是:子亡于父前。他们父子俩,由于所处的时代和所受的教育不尽相同,因此相互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子承父业’。说的是子女要继承父母,但我们的两位先人,他们是相互影响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培养固然重要,儿子对父亲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番话,成了我写这篇文章的主旨。我很想从这对父子的人生经历中寻找这个核心意涵。而这个意涵一定是蕴藏在这对父子的朝夕相处之中的。我努力地搜寻着,从他俩的生活中搜寻……

于是,我重视了这样一些细节性的材料:

▲1927年9月25日,在钱啸秋先生担任主笔的《通海新报》上发表了钱素凡先生(时15岁)的《儿歌五则》和《慈母》(诗歌)。此后,在《通海新报》等报刊上连发诗文。一位中学生,很快成了常在《中学生文艺》、《中学生》、《学生杂志》、《沪潮季刊》等报刊上发表作品的“文化人”。这中间一定少不了父亲的鼓励和提携。可以说,是父亲,一步步帮他进入了“文化人”的行列,扶他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界。十五岁的钱素凡(当时他名叫钱彤)在他自己装订成册的《彤的剪影之二》里,就有这样的“自白式”的题词:“他战栗了!这血腥的世界对于他是可怕而又可疑;但是他究很孱弱,没有了解其所以然……然而,他是在进步!”——是的,当时,他还“孱弱”,对“世界”还没有足够的了解,但是他知道,“他是在进步!”他是在父亲的引导下一步步前进的。

▲在1944年7月钱素凡先生担任《北极(半月刊)》主编后,“刊物以纯学术纯艺术的新面目,与读者诸君相见,”钱啸秋先生“因本此旨,写了几篇拙作以相应之。但

自问也属大杂拌儿,故取名曰‘杂烩集’。”钱嘯秋先生的多篇有关地理学科的论文如《在科学观点上纠正我国地理常识方面几种传统的错误》、《中国度量衡沿革考》、《地理学家苦闷的生活》以及《师友追忆录》等都在钱素凡先生主编的《北极》上发表。并在《杂烩集》的后记中写道:“我承认本集中的几篇文稿,是我恶作剧地把当时出版界的粗疏和草率,批驳得体无完肤……”与钱嘯秋先生曾是地理学科同行的素凡先生,能得到父亲这样严肃的地理学科学术文稿,自然是喜出望外,格外珍视了,因为这恰恰是父亲对自己的事业的支持。

▲ 钱素凡先生在沪江大学附中就读时,发表于《中学生》杂志的叙事诗《我的童年》中有这样体现父子深情的记述:“我天生就是一个柔弱的孱儿,药汤要和乳汁同喝进。妈为了儿的消瘦日日焦心,爸更愁忧着医生诊疗的酬金……由家往学校的路途很长,父便雇人一天接送我两次……升进城北高小也没有考试,我父原是那儿的先生……幸而不久病都痊愈,父亲也被聘为南通中学的教员。我便借了父力勉强插进初一,每天功课都由父亲监督练习……儿时的琐事不容易记起,只有那一次山游却永不忘记。我只是指向江上的烟艇向父亲发问,父亲就证明给我看地壳的球形。我看了果然先见船桅后见船身,喜欢得急急告诉给姥姥妈妈们听……”(注②203-211页)——在这首叙事诗里,素凡先生不忘记自己在病时父亲愁着医药费,每天还雇人接送自己上下学(当时素凡在离家较远的玉皇殿小学上学),因为父亲的关系,自己得以免试转入城北高小,后来也是因为父亲的关系进了通中。在一次旅游狼山的途中,父亲借着江上的烟艇,向儿子讲解地球的知识——这些珍贵的记忆留在了诗里,也留在了今天。它唤起人们去思索:如果没有钱嘯秋的育养,岂有至今还留在人们心中的钱素凡?

▲ 钱素凡先生牺牲时,钱嘯秋先生已 56 岁。但在南通“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一两年里,由于反动当局对惨案真相的掩盖,钱素凡先生的生死,一直令家里人一头雾水。钱嘯秋先生没有了儿子的下落,曾经托人打听消息,得到的回答是:“这事你就别再问了!”——丧子之痛,刻骨铭心。然而,钱嘯秋先生擦干了眼泪,依然昂首前行。在学校,他一节课也没耽误过;在社会,他每一天都投入繁忙的公务。在家里,他整理钱素凡先生的遗物,包括钱素凡先生的信件,发表的文章,读过的书籍,用过的文具、衣物,一次次分批交给他的孙子钱炜,一次次叮咛他的孙子要学习父亲,继承父业。南通解放后,人民政府接收了南通中学,他作为通中教师的代表,参加了学校的接收工作,并被任命为通中校务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学校管理。他经常在学生集会时谈起自己的儿子,他总是激昂地说:“我为有钱素凡这样的儿子而感到自豪!”“钱素凡先生未竟的事业,将由我们大家去继承!”此后,他又四方筹措,为钱素凡先生建起了“衣冠冢”,辗转通过时任中央文化部门的领导姚臻同志,得到了郭沫若先生“三一八惨案烈士钱素凡先生衣冠之墓”的亲笔题字。入墓的衣冠,均为钱嘯秋先生精心保存了多年的儿子遗物。

钱素凡牺牲后,钱嘯秋先生把“大爱”献给了人民,整日忙碌于社会活动之中。他先后出任南通市副市长、苏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南通市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南通市中苏友协副会长、南通市红十字会主席等职。他把繁忙的社会公务

活动视为对儿子事业的继承。他心里想的是：儿子没有与自己并肩参加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活动，但是与自己一样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活动；儿子没有机会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因此他要加倍努力，去完成儿子未竟的事业，去实现儿子心仪的理想——这是一种何等壮丽的继承呀！

钱啸秋与钱素凡，他们父子的这段经历，是一段历史真实，更是两代人精神的写照。我想，在我们的祖国，有多少像钱啸秋与钱素凡这样的父子，他们志同道合，前赴后继，一代一代地继承着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今天，我们纪念和缅怀这两位钱先生，就是要像他们一样，自觉地传递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为实现我们的中国梦而奋斗不息！

注：①《钱啸秋自选集》，2011年10月由南通市文联出版。

②《钱素凡文集》，1999年8月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 冒辟疆与评话艺术家柳敬亭

黄天铨

柳敬亭(1587-1677),明末清初杰出的评话艺术家,通州余西场人,后随父迁至泰州。敬亭本姓曹,年十五时因躲避仇家迫害,流落江湖,曾逃亡至如皋、泰兴一带。据周容《春酒堂文集》说,柳敬亭“亡命如皋,追捕已久,隐柳林获免,遂指为姓。”这一“指树为姓”的做法,大概是效法于道家的传说。据《八仙东游记》说,道家的始祖老子(李耳)诞生于李树之下,以手指树曰:“此吾姓也!”很明显,老子得姓于李树的说法带有神话色彩,而敬亭的改姓为柳却是现实中的真人真事。这也说明了柳敬亭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已把如皋视为他的再生之地,把如皋柳林视同他的再生父母了。其后柳敬亭抵达江南,拜松江莫后光为师,学说《西游》、《水浒》,从此到南北各地献艺,终于成为蜚声艺林的评书艺术家。

柳敬亭在演艺生涯中与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秦淮名妓等多有交往。说到他与复社文人冒辟疆(1611-1693)的关系,不能不回顾一下明朝末年复社与阉党的斗争。

明崇祯帝即位后,宦官魏忠贤虽被芟除,但阉党余孽仍根深蒂固。崇祯二年,张溥(即中学语文课本中《五人墓碑记》的作者)继承东林精神,组织了进步团体复社,继续与阉党进行不懈的斗争,“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也成了复社的中坚人物。为了揭露阮大铖勾结阉党,把持朝政的丑恶行径,冒辟疆与顾杲(东林领袖顾宪成之孙)、黄宗羲、陈贞慧、侯方域等于崇祯十一年(1638)集会,由吴应箕起草了《留都防乱公揭》,广为散发。据孔尚任的戏剧《桃花扇》中说,当时柳敬亭和苏昆生正在阮大铖家作客,柳、苏二人本来就是有气节的艺人,他们看到公揭,了解到阮的为人,深受震撼,耻于做阮的帮闲,“不待曲终,拂衣散尽”,“宁可埋之浮尘,不愿投诸匪类。”虽然阮大铖在戏剧艺术方面有些研究,对艺术人才也竭力网罗,但此时的柳敬亭却把他视作“匪类”,羞于和他为伍。我们认为,《桃花扇》中的这一段描写,应该是有其历史依据的。而孔尚任写作《桃花扇》时,曾向冒辟疆请教过,从冒那里了解到明末的许多史实。从《桃花扇》的这段描写,我们也可以看出冒辟疆对柳敬亭的肯定和赞扬,可以说,这件事应当是柳敬亭与冒辟疆的神交之始。

文人士大夫中,写作诗文称誉柳敬亭者甚多,如吴伟业(梅村)、钱谦益(牧斋)、周容(则山)、毛奇龄(大可)、黄宗羲(太冲)等,冒辟疆也写过《赠柳敬亭》诗,这首诗

被《江苏诗征》和《东皋诗存》二书收录。诗云：

“忆昔孤军鄂渚秋，武昌城外战云愁。  
如今衰白谁相问，独对西风哭故侯。”

说的是柳敬亭受宁南伯左良玉礼遇之事——柳敬亭刚到武昌拜见左良玉时，左误认为柳不过是一位江湖艺人，不宜从军，就想试试他的胆量，密令手下人在宴会的军幕中排列手执长刀的士兵，柳敬亭面对明晃晃的钢刀，开怀畅饮，谈笑自若，左良玉不由得暗暗称奇，于是留他在军幕之中，日夕谈论《三国》、《水浒》中的谋略战例。他为左良玉出谋划策，深得左的信任。后来左良玉率部东下，讨伐马士英、阮大铖，病故于军中，左军迅速解体。柳敬亭只得再度流落江湖，重理说书旧业。冒辟疆题赠柳敬亭这首诗时，柳已是白头衰翁，他与冒辟疆谈起当年在左良玉帐中的往事，不由得潸然泪下。末两句诗与梁清标《赠柳敬亭归白下》中的“天宝尚有遗老在，何堪白首说兴亡”诗意相近。

后来，冒辟疆重逢晚年的柳敬亭，在听他演说评书后，还作有一首诗相赠，诗云：

“游侠髯麻柳敬亭，诙谐笑骂不曾停。  
重逢快说隋家事，又费河亭一日听。”

此诗赞美柳敬亭有游侠之风，赞扬他说书诙谐，喜笑怒骂，感情十分投入。“快说隋家事”指的是柳演说《隋唐演义》故事，当时的艺人多有借说隋唐故事，表达怀念明王朝之情者，柳敬亭说隋唐故事也有这层寓意。

冒辟疆与柳敬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的次子冒丹书（青若）与柳敬亭也有交往，冒丹书曾写过一首《题左宁南军中说剑图赠柳敬亭》：

“玉帐登坛夜论兵，将军出塞气纵横。  
可怜多少衔恩客，写向丹青只柳生。”

原来柳敬亭与左良玉军中论剑，曾被画师画作一图。冒丹书看到这幅图后，题写了上面这首诗，赠给晚年的柳敬亭。诗讽刺了那些曾在左良玉身旁邀宠衔恩的人士，赞扬了柳敬亭与左良玉的交往。

柳敬亭所说评话，曾经由当时的文人整理成《柳下说书》八册，这一孤本奇书，曾被著名学者黄侃（季刚）先生收藏。据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云，此书“篇中字句多方密之、冒辟疆、钱牧斋、吴梅村、吴次尾集中常用之口吻……因而知此书必经当代文人过目，润色涂改而成。”意思是柳敬亭与冒辟疆等还有过一段文字缘，遗憾的是，冒辟疆如何帮助柳敬亭润色话本的文字，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已无法知道详情了。

（通讯处：如皋高等师范学校 邮编：226500）



# 我与袁运生

季修甫

一九五五年夏,袁运生以优异成绩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录取。通中五五届三小画家其他二人范曾、顾乐夫时均无名。范曾录取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

其后两载,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进攻中,我从《美术》杂志里获悉:袁运生列入中央美院学生中极右分子。虽我自身亦将不测,然见此消息,非仅为袁运生惜,亦为一艺术人材由此被埋叹,且为吾通失一艺术好苗子伤也。然无可奈何。明年,闻袁生回乡,余与袁无交往,在通中不过彼知余为教师,余爱其才而已。彼毕业前总复习,校方安排余以上大班形式为其辅导时政,如无此机会,恐彼亦不识我。以此余乃去石桥头袁运生家,询其生活情况。彼正在写生,见余至愕然中欣然相待。盖去访之者已寥寥。余勉其坚持艺术创作,一时浮沉,无大碍,并赠一磁笔筒,上绘大红官袍之天官。两年后脱帽回校,继续学习。而毕业创作“水乡之春”又以歪曲农民形象被斥,乃送去黑龙江某城文化馆使用。其间偶一遇而已,无甚可谈之语。余亦惶惶,度日如年。文革十年,绝无消息。七年后,报刊长文述袁运生喜得良伴张兰英,张慧眼在火车厢中识得袁,不顾家庭阻劝,终与袁结为夫妇,并生有子女三人。文革后,回母校任职,而袁去西双版纳、去延安,创作成册,渐为世所重,与乃兄袁运甫称“北京二袁”。人以为袁运生厄运已去,艺术生涯从此有保障,人将进入坦途云。其为北京机场所作“泼水节”巨型壁画,刊入人民画报,人赞之不绝。一九八〇年,袁与兄运甫并范曾回通举办“省亲画展”,一时通城纷纷传言:南通出大画家矣。余约二袁及其夫人小聚斗室甚欢。余著文为画展作介绍,并为家乡庆也。袁为余写生,殊精。曾几何时,忽传北京壁画将为西双之州长毁去,原因是此画污蔑其乡人形象。真是从何说起。明眼人知有后台敌视袁运生者。又传文艺界反复辟回潮,袁又首当其冲。呜呼,袁之命运何其多舛也。沈君由京回,云袁在美院仅获十平方小屋,住夫妇子女五人。牛衣对泣,自然不免,而袁已四十余矣。贫贱夫妻百事哀。又闻袁与张常口角,袁甚至逃往其兄家避其锋。想此等生活,安能出得艺术之作。其际,出国不难,袁遂去美,临行与张抱头大哭。运生出国后,从其同学口中,知有华侨之女愿共去美,以其劳动所得,供袁生活,使袁得安心创作。该女又一袁之知音也。袁在美美院授课,所得甚少,又不愿售其作品,故贫寒如故。女名秦黛华,数年得丈夫子,曰袁奕(袁之长子曰袁野)。于是袁张之间之

离异,已无法得免。有人以为袁寡情负恩,袁岂是寡情负恩之辈。余怜袁运生,亦怜张兰英。造化弄人,无如袁运生之坎坷者也。五七年至七五年,廿载风雨霜雪,使袁之才华不得大展,而家庭遭遇,可谓人世少有,大可作传奇之素材。虽然,余不能不为袁生幸,幸其在困厄中得张、秦之助,无张无傣女之画,无秦无今日北京之展。近年来袁屡回国回乡,每回乡必探余室,或约至其家聚谈。知余集邮,时寄美国佳品,余有求其作笔,亦乐应之。一九九三年四月运生回国,在北京办画展,与张氏解约。知将携妻儿回通,余盼之久。六月初,余侄季随来告,袁运生已回,只留三四日。其夜九时许,余去其家,知已来余家,适相左,乃亟返,袁与弟运镇,妻黛华、子奕已在余室候。余初见秦,全无现代留美妇女之印象,平易和穆,余又喜运生得佳妇,乃纵谈一切。邱丰亦至,余出示所藏,运镇为摄影,竟迟至十二时许始回袁老宅。余虽倦,但念运生从此或可步入坦途,亦忘倦矣。余允为其子治印。次日(六日)晨起,作“袁奕”朱文章,尚不恶。乃携小药瓶五与印,送袁家,又谈至午时,余以将赴宁辞去。袁夫妇送至门始别。其间袁奕(八岁)为余写生,乃以此扇而供其涂以实之。忽思何不自书与袁运生交往之经过,及对运生婚姻之看法,使后之览者,由此而得知余对袁之爱惜,对袁之遭遇之不平,对袁待余不薄之感想,以及当时一般人际交往情况,不逾于画乎。袁用钢笔,余亦用钢笔,率意书之,畅所欲言,存一南通文艺界之史料。此余之史癖,自思无妨听任之,因其书,而不计佳劣矣。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季修甫书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一日从扇面中录下复印,其中一份,由此次来南通的袁运生的前妻张兰英之长子袁野持去送袁运生,并得知现为袁的妻室秦黛华所生之子,余在其八岁时所刻阳文名章之袁奕已在今年病故。此次袁运生来家乡举行“作品展”,余从袁野处得知,自不与袁运生谈此伤心之事了。但我扇面正面有袁奕八岁时为我作写生画像,虽形体不当,但眼神仍有余形象二三。余深喜之,乃为作名章,而袁奕书表谢意。

此次“南通籍名家系列展——袁运生作品集”由我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印,6月12日展览开幕时有散发,印制相当精美。袁运生在其书签名。有“个人概况”、“主要成果”、“研究方向”、“文章目录”、“图版目录”,在他的“自述”中,知道他生于一九三七年(今年77岁),生下来就随家人流离出走……“一九四九年三月南通解放后,进南通中学初一学习”,“高中毕业后,我决心报考中央美院,其他美术都不考,竟然以第一名录取油画系,这决定我一生的命运。”“虽然我在二年级被划为右派学生,白天为农场干活,晚间和右派先生们漫谈艺术和人生,又结识了江丰院长。”“人是要有一身傲骨的,结识这些人是一生的荣幸。”“一九九五年靳尚谊去美,他邀请我回国当油画系国画室主任,这是我萌生了重建中国美术教育的志向,经过十几年的摸索,考察了十几个省、200多个市县,决定与西方美术教育的思路决裂,开始了重建中国的高等美术教育体系的奋斗历程。目前,这一思路与理念得到了国家有关领导的批示和支持,并获得相当研究经费,自此我的整个人生便与这一思路为伴。我的创作思路也随之改变,从西方现代主义的思路走向民族文化弘扬的立足点。十几年来,我的绘画为之一变,我的每一幅画都有抽象性,但不再是抽象画,这些大幅水墨便是其中的一部分成果。”(以上为其“自述”的主要内容,请争取看到袁运生的全文。)

说句老实话,自袁运生之小儿子袁奕为我写生后的近二十年时间,虽与袁偶有通信,但我已看不到袁运生创作,现在袁在近二、三年中所画的作品,我的鉴赏水平不高,是不能接受的,但我相信袁的画决不是乱涂,而是具有更高中国油画的水平,我可记录不下来了。

我已 91 岁,小腿肿胀,外出不能步行,要外出得坐手推车。这次我去中心展览馆不迟,袁运生在进场时,即看到我,前来和我握手,我感到幸福。分别了近 20 年的老友,我看到了,袁运生一眼也看到我这 91 岁的老残之人。

# 读古诗 说古寺

——如皋唐代古寺追踪

吴希林

诗者，言寺也，言寺便成诗，原来寺和诗的关系如此密切。不管仓颉造字的本意如何，古代诗人以寺庙为题材的诗作还真不少。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风雨中”；张继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常建的“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白居易的“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众多诗人描写寺庙的诗句，千百年来流传不息，脍炙人口。古代如皋，寺庙众多。正如清人黄钟《如皋对》中云：“荒途孤村，祠庙必存。而在城邑者……盖半于居人之墟。”寺庙多，自然关于寺庙的诗就多，大凡有点名气的寺庙，都能找到相关诗作。有的诗的确写出了某个寺庙的特色，能起到读诗识寺的作用。本文仅就几座已经消失或变化（含移建、重建）的如皋唐代佛教古寺，各撷选一首相关的古诗作些简要介绍，以飨读者。

咏广福寺

曹相

层楼矗矗耸青苍，传是江皋古道场。  
岁月几经秦劫火，巍峨重见鲁灵光。  
鹤归仙自夸丁令，钟动声能吼象王。  
惭愧带围无可镇，题名藻栋墨痕香。

诗人曹相的这首诗，主要是描写广福寺殿宇巍峨的景象。广大福寺，亦称大寺，创建于唐朝贞观年间。在县治西，原如城大寺巷（后曾改为带政治色彩的大治巷），即因该寺而得名。供奉的主佛为药师佛。为如皋人的祈福道场。该寺规模宏伟壮观，至明朝初年，有房屋 100 多间。诗人开句用“层楼矗矗耸青苍”来形容其殿宇高大，接着用“传是”指明这是如皋一个古老的道场。下面诗人又写了寺庙几经劫难又不断修复的历史，而且越修越漂亮，美轮美奂，就象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建造的鲁灵光殿一样华丽巍峨。这里的“秦劫火”，借用秦始皇焚书之事，暗喻几次灭佛。这实际上把佛教的文化地位更加突出了。是说灭佛同秦始皇焚书坑儒没有两样。接着，又用丁令威在灵虚山学道成仙，化鹤归来的故事，比喻广福寺祈福的灵验。而且寺中的梵钟声音洪亮，声动如吼，香客祈祷，和尚一敲钟，象王（佛爷）闻声就会保佑。该寺殿上有 10 尊佛弟子塑像，相传出自唐代雕塑高手。最后诗人决定在藻井（中国传统建筑顶棚形式

之一)栋梁上题写诗句,让墨迹永远留香。此诗用典较多,用得也很自然。

广福寺自清朝后期开始衰落。民国元年,曾为如皋议事会办公地点。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如皋县党部设于此。1946年12月,苏皖边区第一行政专员公署在广福寺办公。1947年夏,会堂被国民党飞机投弹炸毁。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此建人民剧场。

### 咏中禅寺

陈应雷

寻幽散履绕中禅,纵笔留题为象妍。  
半榻风清窗外竹,一帘月满定中天。  
花飞台阁香成雨,金点苔斑福有田。  
闻说曾公读书处,额名隐玉是何年?

此诗写景、写寺又写人。中禅寺创建于唐大中(849~859)年间,供奉的主佛为释迦牟尼。因其比大寺(广福寺)稍小,故邑人俗称小寺。但其实际规模并不小,歇山式大殿,斗拱回廊,雄伟壮丽,完全可以与其它名寺比美。该寺座落在县治东北,洗钵池西,周围环境十分优雅。东有水绘园,西有霁峰园,北有泰山行宫。所以,诗人开头两句就说,他是寻幽绕道到中禅寺,之所以纵笔留题,就是因为如皋的佛教名寺太多,个个争奇斗艳。这里象,是佛教的代称,佛教亦笔称象教。当然,这就无形中写出了中禅寺的名。接着四句用清风、修竹、满月、飞花、苔斑等来写中禅寺的景,同时景中也有情,就是“金点苔斑福有田”。“金点苔斑”,古有苔钱之说,指苔点形圆如钱。福田,是佛教用语,说的是就象农民耕田播种有收获一样,行善积德可得福报。最后两句是写人,就是写宋朝大文学家曾巩儿时随其任如皋县令的父亲曾易占,曾在中禅寺读书。曾巩深受如皋纯正学风影响,学业十分优秀,进士及第,对古文造诣极深,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后来,他的弟弟曾肇任泰州知州时,专程来如皋探访,在其兄读书的中禅寺东厢房题写匾额“隐玉斋”。中禅寺最大的特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名人效应。许多文人寻胜题诗,都是围绕曾巩读书,除元朝平江路总管陈应雷外,再如清朝著名文学家方苞亦不远千里,慕名到中禅寺探胜,留下“前贤读书地”,“地胜境乃佳”的感慨。仪征诗人吴铠甚至还觉到“公子书声夜未央”。

中禅寺清朝后期逐渐衰败,民国时期消失。

### 咏海月寺

周 煌

森森古木蔽城隅,金碧何年结佛庐?  
短碣书留唐北海,六桥人比浙西湖。  
晴开杰阁春日丽,秋静香坛夜月孤。  
至此顿忘名利想,软红界断一尘无。

这首诗着重写海月寺环境优雅。海月寺创建于唐开元(714~741)年间,供奉的是观世音,又称观音堂。座落于风景秀丽的古窑子河边,绿荫覆盖,碧水相环。诗人一开始就用“森森古木”把海月寺那种优雅幽静的环境烘托出来。至今,海月寺大殿门前的两棵古银杏尚在,确实堪称“古木”了。接着,用设问的方式提出海月寺的创建时间问题:“金碧何年结佛庐?”回答是圆顶的石碑上有唐北海的书法。唐北海,即李邕

(678~747),唐朝书法家,扬州江都人,曾任北海太守,故称唐北海。书法笔力沉雄,尤擅行楷写碑文。海月寺的碑文由李邕书写,实际对“何年结佛庐”的发问作了明确回答,肯定是李邕生活的唐代。以前县志说是建于宋朝天禧年间有误。接着写道:“六桥人比浙西湖”。就是说在六桥行走的人,象浙江的西湖边的行人一样川流不息。古时,海月寺前边的古窑子河上有6座小桥,即:起凤桥、落凤桥、海月寺门前的东西百子桥、望月桥、沙家红桥六座小桥,相隔很近,造型别致,十分优雅。邑人把这一带叫做六桥,或小六桥,是古如城的胜景之一。下边两句似乎是在写寺的“阁”和“坛”,实际上还是通过阁和坛写景:春暖日丽的晴天,打开“杰阁”就会看到天上美丽的云彩;秋高气爽的夜晚,在香坛旁就会看到明月当空、万籁俱寂的景象。最后两句作为诗人的感想:到了这种环境下,一切功名利禄都抛之脑后,与世间的红尘彻底割断了。所以,有人在照壁墙上刻上对联:“至此即生善果,何须远觅慈航!”

海月寺在民国年间逐渐衰落,现在广福路北、望月桥西仍有海月寺钟鼓楼、佛殿等建筑遗存。

#### 咏法宝寺

吴琴屋

郭外招提胜概宽,幽亭杰阁接云端。  
鹤来不信非蓬岛,月印浑疑是广寒。  
夹水众坡容象踞,镇山老树似龙蟠。  
已无法雨宝花在,绀宇巍峨尚可观。

此诗写寺、写景,寺之巍峨,景之优美,相互交融。法宝寺创建于唐大和四年(830),供奉的主佛为释迦牟尼,宋朝时为维扬八大丛林之一。该寺位于千年古镇白蒲镇东南,那里古木参天,幽篁成簇,殿阁巍峨,楼台耸峙。诗人开头就讲在宽广的镇郊(“招提”,梵语意为四方),隐隐约有亭阁高耸云端,仙鹤来了信为蓬莱仙岛,月光映照下就象天上的广寒宫。原来这里是一座形状酷似大象的古庙。象是吉祥物,是佛教的代名词。法宝寺的整个建筑布局就是一个大象的形状:金刚殿为象首,大雄宝殿为象身,荷花池为象口,几口古井分别为眼、耳、鼻孔,金刚殿直通山门的曲形长堤为象鼻,俗称象鼻湾,有诗云:“一湾成象鼻,法宝久闻名”。最后诗人感慨地说,即使没有什么法雨宝花,这巍峨的殿宇也很值得一看啊!

该寺初名圣教寺,曾毁于火灾。宋至和元年(1054),僧人亿山募化在原地重建。“掘得白龟献于朝,赐名法宝寺。”因有宋仁宗皇帝赐名,法宝寺规模不断扩大,不仅香火兴旺,而且寻幽探胜的文人雅士很多,郑燮、袁枚等都曾是法宝寺的游客。古镇白蒲又是文人荟萃之地,该镇的清朝进士顾颉、郑大德、沈锡庆、沈岐、傅希说等,都为法宝寺留下了诗文、墨宝。

该寺于1998年移建于镇西北。移建时尽可能使用了原有材料,基本保持了原有建筑风格。

#### 晓望丁堰山

丁鹏

半空露楼阁,云树影森森。

草木尽秋色，江山接地荫。  
林幽啼鸟缓，寺远梵钟沉。  
动我登临兴，凭轩入望吟。

这首咏寺诗与前几首不同，题目叫晓望丁堰（观音）山，而不是直接讲咏某某寺，这正是丁堰观音禅寺的独特之处。观音禅寺建于唐贞观（627~649）年间，这座古老的佛苑梵宫位于丁堰古镇北，占地面积 12 亩。四周绿水环绕，中有土山高筑，山上山下，古木修竹，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因如皋一马平川，垒起数丈高的土台，也就称之为山了。城里有泰山，上有碧霞宫，下有伏海寺；城北有三台山，上有御书禅院；九华镇有九华山，上有地藏寺；常青镇有土山，上有绍隆寺……在这些地方，山名比寺名更为人们所熟知，如到某某寺去，都说去某某山，这正是诗人将观音禅寺称作丁堰山的原委。在这些建在“山上”的寺庙中，丁堰的观音山寺最为古老，风景也最为秀丽。因此，诗人也着重写景，楼阁凌空，草木秋色，鸟语幽缓，钟声绵长，诗人就是在这样一幅美丽图画中吟诗，诗有画情，画有诗意，情景交融、令人神往。丁堰镇清代举人姜煊曾撰一联：“此地有修竹茂林，半村半郭，全揽东皋胜景；何处无慈航宝筏，一丘一壑，居然南海奇观。”同样把观音山的秀丽景色描写得出神入化。正因为这里有山有水，有亭台楼阁，风景别致，才唤起了诗人登临的愿望，而且激发了吟诗的雅兴。

丁堰观音山寺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毁于战火，1993 年于原址重建。主殿为圆通宝殿。

如皋古寺庙还很多，如建于隋朝的定慧寺，一直香火兴旺。它有“水环寺，楼抱殿，门朝北”等特色，而且佛像精美，被国画大师袁运甫教授誉为“当代中国佛像之冠”。定慧寺为皋民和游客熟知，不作专门介绍。如城迎春桥东有建于唐朝的药王庙，部分房舍尚存，两棵古银杏围径逾 3 米。还有建于汉代的灵威观，初名祖师观，现香火兴旺。因它们是道教庙宇，不在本文介绍之列。还有唐代高僧、天台宗十世祖行满大师创建的国清寺等，现已属如东县，亦不作介绍。

（通讯地址：如皋市东皋新村 114—203 邮编：226500 电话：15152876698）

# “利和场”古镇考

季 智

雄镇“利和场”，为清朝康熙年间之前，通州州治的古镇之一。城郭耸然，土山祠宇，烟火郁葱，百业杂陈。明《嘉靖庚寅通州志》、明《万历通州志》、清《乾隆两淮通州志》、特授两淮都转盐运使司通州分司秦永清主纂的清嘉庆五年庚申（1800年）《嘉庆两淮通州金沙场志》，清道光四年（1824年）甲申，太学生邱标所编纂的《道光两淮通州金沙场志》及四川青神县正堂、金沙举人孙傲于民国初所编纂的《光绪金沙场志》（未曾有缘拜读），均有载述：“利和场，在州治东五十里，又称利和镇市。与通州‘端平桥市’，平（政）桥市同享盛名。”

利和古镇，其地名最早出现于唐代中期。唐懿宗咸通八年（867年），载有郡人陈宗（字世本，人称陈孝子）建“广惠寺”于利和。宋朝又于镇之河北，建有“庆真观”。僧道两教，寺院宫观，气势辉宏，秩序谨然。由此可见“利和镇”规模之一斑。明成化年间，于镇中建“便民仓”，为“藏谷仓廩”（储藏粮谷）之所。嘉靖八年己丑（1529年），海匪（倭寇）时侵，通州州判史立模鉴于往岁时生盗警，镇民惶恐，乃于镇中建楼，为瞭望报警之用，名其楼曰“怀范楼”。“范”即指筑堤捍海的范仲淹，有示“怀贤于既往，防患于未然”之意。并撰文《怀范楼记》勒石。其文有云：“通州东五十里，有镇曰利和，实为米盐鱼稻，商贾辏集之区。居民环镇而食者，数百余家。”

至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州同知舒纓自利和镇向东开凿运河三十里，经余西场、四甲、余东场、包场、六甲，直通吕四场。再之利和镇东，旧有大江进鲜之港，俗呼“进鲜港”（金沙东之“进鲜港”，即旧港之最北端，尚有大河存焉）。利和镇西有“瞿灶港”，利河镇南濒长江，有“仓利港”、“树头港”、“李梢港”等诸港。至此“利和镇”可谓南来北往，商贾云集，舟楫衔尾，货物充裕，米谷殷实，百业鼎盛。实为通江达海之门户，濒江临海之要津，水陆码头之要冲也。

自元朝至正，至清康熙、乾隆的近三百余年间，江潮肆虐，江北堤岸，累经坍塌。据史记载，因江海堤岸大片坍塌，海门县治先后曾五次迁县治于南通县。

明弘治年间，庆真观因避江潮，迁至金沙场东进鲜港。由羽士（道士）俞景霖重建，并改称“排河观”。其阻江潮之坝头，在袁灶处，故斯地古名“老坝头”。其后江潮南退，庆真观复迁原址。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江潮大作,堤岸尽塌,崇明几尽,芦舍死屍,漂流江口,惨不忍睹。幸存黎民迁徙吕四,苟延残喘,暂度时日。

明万历二年甲戌七月(1574年),江潮暴溢,房屋芦舍,尽被漂没,百姓牲畜,皆葬鱼腹。其时庆真观复迁进鲜港,其址即今进鲜港北端“六总”处,亦名庆真观。而海门县治,迁移通城之东余东场。

清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年),海门塌江几尽,仅存田四十顷。遂废海门县为“静海乡”,并入通州城东,移民视其地为新生之地,故名“新地”(兴仁)。

清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年),江潮再次肆虐,江岸大片坍塌,江水直逼金沙市镇。利和场毁于江潮,部份居民迁居余西场南,古长江北泓畔。难民集中聚集之地,新建有“水流镇”。大部份居民定居余西镇,少部份居民定居余西场以外。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年)七月,江潮水溢,由进鲜港灌涌而进,塌及民舍,直逼金沙市镇。邑人邵青等捐资助工,筑坝在西河口边。金沙场大使朱必琳于八月十二日赴任,见其势惨急,乃曰:“民不堪命矣”。未及归署上任述职,即亲往西河,跣足簑笠,督工赶办。十三日堤成,随即劝商捐资,筑子坝在进鲜港南,即今之“海坝头”是也。其后江潮缓解平息,海门县归驻旧治,因伤民无算,斯时南通县移“清干乡”民六里,金沙场移民一里,以资民数(“里”为古代一种居民组织,秦时一“里”为二十五户,明时一“里”为百户,清时一“里”为一百一十户)。

桑田沧海,生灵涂炭,世事变幻,鬼神莫测。就是在康熙年间的两次江潮之中,一个具有八百余年历史、偌大的利和场古镇,就被江潮冲塌,沉没于大江之中,永远地从地图之上消失殆尽。其后随着江水南退,北岸渐成沙地,外来迁徙居民渐多,从事垦植耕种。因地处属涨沙之地,又多南来崇明、江南的移民,其地俗呼为“南沙地”,而所居之民,俗呼为“沙蛮”(旧时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方之民之说。“沙蛮”即沙地所居,南来迁徙之民)。而旧迹亦不复存在,仅空留有如“海界河”、“水流镇”、“新地”、“南海大队”(旧时谓长江为南海)等新旧地名,从而勾起一些老人伤心的回忆。

至于今之海门县,乃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年)之后,划通州、崇明沙涨之地于“茅家镇”设置“海门厅”而来。而原“利和场”隶属金沙场,故址即今油榨东南、袁灶南、余西西南今海门县的三星镇一带。

(通讯地址:通州区新金东路民政局宿舍 106 室 邮编:226300 电话 13270680005)

# 关于通州骑岸镇张家沙

殷秀才 高志华

要说通州的通海和三余地区的居民会说属吴语语系的“沙地话”，不会使人感到奇怪；可是在通州范公堤北段骑岸镇东南约 4 里路的地方，有块四面被“江（音缸）北话”包围的地方，它东起十总施家店、西至斜马路、南至滥港河、北至骑鸾河，面积约 5 平方公里，这里的居民说的都是“沙地话”，这就使人不解和奇怪了。

通州的通海地区在明清时代以前，便滨江临海，江坍海浸经常发生，大片土地坍入江中。后来长江主泓南移，长江上游带来的泥沙逐渐淤积，坍入江中的地方出现许多沙洲，以后逐渐连片成为滩涂，于是许多外地人便蜂涌而来围垦种植。“徙而垦者，崇明人属十之八九，通与他县不过一二”（摘自张謇《龚定庵海门先啬文书后》）。这些移民被称为“沙民”，和居住在通州老土的土著不同。通州原住居民因住长江北岸，被称为“江北人”，他们的语言属江淮语系，说的话称“江北话”。“通人先辈自负，视沙民仆塞易与，沙蛮、沙蛮呼之”（出处同上）。“江北人”称沙民说的话为“沙蛮话”或“沙地话”。

北宋天圣二年（1024 年），泰州西溪盐官范仲淹率众修筑阜宁至东台耕茶的捍海堰。为了纪念范仲淹的功绩，人民把这条“遮护民田、屏蔽盐灶”，总长 582 里的捍海堰统称为范公堤。范公堤中有这么一段：它东北起自掘港场东侧，向西南经马塘场外缘，至石港场东的卖鱼港，再经骑岸折向东南，经西亭场东北部的芦芽嘴、金沙场北部的十八总岸头，径直向东经余西、余中、余东三场北部而抵吕四。这个海湾三面环陆，形同马蹄，地理学上称“三余马蹄形海湾”。南宋建炎二年（1128 年）黄河夺淮后，挟带大量泥沙自淮河口迤南沉积，使黄海滩涂加快淤积，海湾也得到泥沙补积，海势节节东移。明嘉靖后期，海湾淤浅部分已到今纱场、唐洪、庆丰、十总等地。至清乾隆六十年（1795 年），今东灶以北、忠义等地淤涨成海滩，堤外形成了广阔的“三余海积平原”。到民国三年（1914 年），围垦海湾近海处的金陵荡和余西、余中、余东三场北部的淤浅部分时，大批的海门、启东、崇明的移民涌入。这些人的语言均属吴语语系，讲的话都是“沙地话”。因此，通州通海地区和三余地区的居民讲“沙地话”不足为怪。

早在明嘉靖三十五年至四十四年（1556~1565 年），通州盐运使俞南岳主持围垦了范公堤以东的五总、骑岸、纱场、唐洪、庆丰、十总等地，于是便有一些先民来这里

垦田谋生。相传约在清乾隆年间,崇明人张氏夫妇来范公堤外谋生,搭起“环筒舍”替邱姓看管荡田。路人经过此处歇息时询问此处为何地,答曰“此处为张家环筒舍”,或简答曰“张家舍”。后邱姓异地另谋,荡田转归张氏所有。至道光年间,张氏繁衍数房人丁,期间又有崇明的陆姓、蒋姓、吴姓、宋姓、俞姓等的先人先后来此落户谋生,逐步繁衍发展成一个庞大的“沙地人”集居地。“张家沙”与“张家舍”音近,南通方言的“江北人”便称此地为“张家沙”。这是笔者通过调查走访得到的口口相传的“张家沙”的来历。有无历史记载佐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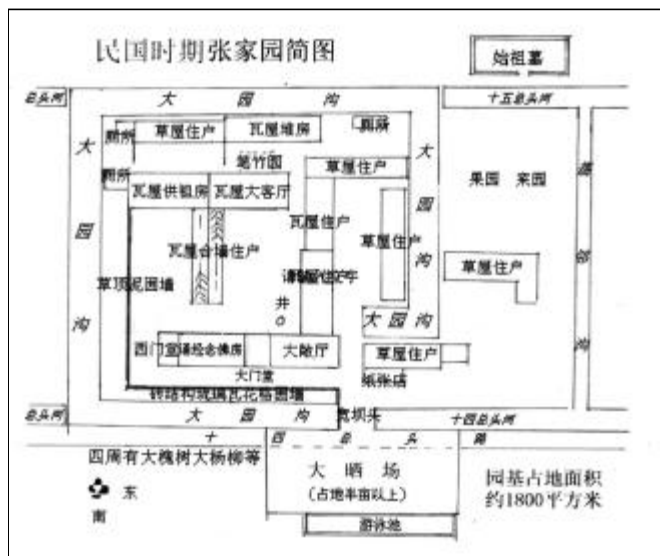
据1983年南通县地名委员会编的《江苏省南通县地名录》中“张家沙”条目载:“清朝初年,张象九夫妇在此垦荒定居,后来逐渐集居成村,得名张家沙。”那么,张象九又系何许人也?他与通州金西的一个大姓张氏家族有无关系?

笔者在通州张謇研究会工作期间,在翻阅《通州张氏宗谱》时,曾查阅到通州张氏南四房月川公支第十一世“昭晋,字象九,配王氏。男六。康熙甲申生”(即康熙四十三年,公历1704年生,卒年不详——笔者注。此段文字摘录于《通州张氏宗谱·卷之十二·第五十三页》)。众所周知:通州的张氏自始迁祖张建元末避乱由常熟迁居通州后,三世祖共生10子,分十房居住。从此支分派衍,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丁口之盛,以我三姓街张氏为最(摘自张謇《张氏四修族谱序》”,“丁繁逾万,散而处于四方者代而有之”(摘自张謇《南通张氏长乐支谱序》),“散之他州县者,亦往往而有”(摘自张謇《归籍记》)。可以肯定,张氏子孙中有部分曾到通海地区去开发谋生。这也有史可证:

就在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的那次大潮后,不断发生江坍,江边居民不断内迁避害。迁到通海地区谋生的张氏后人陆续迁回他们的发祥地三姓街。“绅子援,字汉功……号为成一。永安镇旧店坝有关圣庙,雍正朝因江坍临逼,公慨然移建三姓街旁,再修宗祠神庙”(即张氏后庙——笔者注,载《通州张氏宗谱·世德录·第九页》);“九世祖九龙,字飞卿。子启芳,字馨远,秉正持公。旧居永安镇,有云台山,为张氏古刹,江坍迁建于桐荫书院后”(即为张氏前庙内的云台山——笔者注。载《通州张氏宗谱·世德录·第三十九页》);“正殿后为山,亦五楹,名云台山,雍正中江逼旧河店,馨远公迁建于此”(载《通州张氏宗谱·卷首·神庙图说》)。从这几段摘录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移民通海地区垦荒的张氏后人不只一两家,而是一个较大的家族,因为他们不仅建有家庙,而且也有祠堂。

在这次大规模的内迁中,大批的张氏后人又要回到三姓街定居。他们原本就是因为三姓街人多地少才走出去谋生的,隔多少年后被迫无奈回来便更无立身之地了。因此必须另辟蹊径,寻求到其他地方去开垦谋生的机会。张象九夫妇就是这支内迁大军中的一员,为了生存,便来到范公堤东侧谋生,后又生六子,子孙繁衍不断。他们那种沙地人具有的精明的耕作技术、吃苦耐劳及习于迁移的精神,终使这片滩涂开垦成熟,加上以后又陆续从崇明、启海等地迁来的移民,便集居成村。居住在通州老土上的居民“江北人”便称此处为“张家沙”。

张家沙的行政归属累有变化。新中国成立前,地方政府以“头总路”为界,路南为张沙乡,由金沙区管辖;路北为中道乡,由骑石区管辖。解放后,张沙乡和中道乡合二



为一，称育盛乡。“公社化”时，张家沙东部归十总镇管辖，西部归骑岸镇管辖。现在张家沙西部为骑岸镇张沙村，东部为十总镇于家坝村。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被“江北话”四面紧紧包围的张家沙居民说的“沙地话”也潜移默化地被“江北话”同化了，现在的年轻人能说沙地话的是少之又少了，只有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才能既会说沙地话又会江北话。现在张家沙无沙地话，更无环筒舍了，然而骑岸镇的“张(家)沙村”“通沙路口”等地名，将永载史册。

行文至此，本可搁笔，但还有两个问题必须释疑：

一、口口相传的张家沙来历中说张氏夫妇来此垦荒是“乾隆年间”，《南通县地名录》中说是“清朝初年”，张氏宗谱中载是“雍正中”或“雍正朝”，究为何时？其实清朝前后十代皇帝，从顺治建国到第三代皇帝雍正朝，乃至第四代皇帝乾隆朝，说成是“清朝初年”，对长期生活在乡下的农民来说并不奇怪，也不必苛求。宗谱中记载的“雍正朝”、“雍正中”，笔者认为更准确一点。

二、张氏夫妇到底是崇明人还是金西张氏后人？其实通州张氏的祖籍也是江南常熟，而崇明人中有许多也来自苏州、常熟等地，他们的语言虽略有区别，但均属吴语语系，“江北人”均称“沙蛮话”或“沙地话”。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口口相传，把崇明人误传为江南人，把能说“沙地话”的张象九夫妇误传为崇明人都不奇怪。不过，从张家沙走出去的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工程处处长、有“铁头”之称的张学成，就说自己的祖上是金西三姓街人；旧时，老一辈人祭祖扫墓时，张家沙的张氏后人都会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始迁祖张象九的墓前公祭，仪式结束后，在张家老园聚餐一顿，费用从祭田的收入中支出；笔者在走访中，接触到的老人都反映张家沙的张氏曾经编有张氏家谱，只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没有保存下来。

以上仅是我们在研究通州骑岸张家沙过程中的管见所及，纯属抛砖引玉之言，祈请专家学者教正。

(作者地址：南通通州区金沙镇通州花苑7号楼307室 电话：18012207789)

# 难以忘却的名人墨迹

周思璋

如皋是一个文化古邑，文物丰富。由于社会变革和战争，不少文物已荡然无存了。近年来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可是有的地方藉保护文物之名，行摧残文物之实，制造假古董。有些古建筑侥幸逃脱了“文化大革命”，却未能逃过“城市大改造”，实在令人痛心。回忆往事，想起了几十年来曾经寓目和听到乡里前辈津津乐道的名人墨迹，略举一二，俾作雪泥鸿爪。可惜有些建筑物上的石刻或砖刻，铁划银钩，堪称墨宝，但未曾具名，年代久远，作者何人已不可考矣！

## 董其昌书“得全堂”匾

冒广生先生《龙游河棹歌》中有一首：“认取双桥夹故居，谢公五亩劫灰余；奋髯我亦谈光复，三字香光旧榜书。”作者自注：“汝九太守（梦龄）尝乞董文敏书“得全堂”匾额。余于赎屋后复得之于骨董家，今悬厅事，顿还旧观。”冒梦龄是冒襄之祖父，曾请董其昌写“得全堂”三字，制匾挂在厅上。冒襄晚年家境败落，日食艰难，将住宅出卖。“得全堂”匾也辗转流入古物商家。民国初年，冒广生赎回冒襄旧宅，又购回此匾，复悬于厅上。光复三百年旧物，欣喜莫名。可惜数年之后，又被日寇劫运回国。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敏。工诗文，善书画。书法初学米芾，后自成一派。

回忆民国二十七年（1938）春，我十岁时，随母亲下乡逃难，端午节后回城。那时十室九空，富家大宅都被日军占据，金银珠宝被掠劫一空；书籍、字画和家具则用于烧火。有一天，我听人说，日本人将沙元炳、冒广生、郭仲达等人家的字画和古书，令人抬到南门外上船。我也跟着邻人到城外，站在远处看了一会儿。“得全堂”匾大约即在此时被运走的，不知是否还在人间。

## 名人写的招牌

清末民初，如皋商业繁荣，城内外店铺鳞次栉比。大店皆不惜重金请名家写招牌，制成黑漆底金字。

### （一）汪洵书“大福来字号全福嫁妆”

如城多数店铺的招牌少则三字，多则五字。西大街有一家开于清光绪末年的大福来嫁妆店与众不同。他家的招牌是金底黑字，高约一丈，“大福来字号全福嫁妆”九

个大字;左边有“阳湖汪洵”四个小字。三间店面的檐下有半圆柱形的三块黑底金字招牌,是“金银首饰”、“铜锡器皿”、“嫁娶妆奁”。大福来开业时,先父从扬州农村来如皋,在邓广润嫁妆店学生意(当练习生)。听说大福来老板是镇江姓胡的富商,资金一万银元。经营的品种和招牌都是仿照邓广润;因为邓广润是全县闻名的百年老店。大福来金碧辉煌,焕然一新,远远胜于老态龙钟的邓广润。他家开办费就用掉一千银元,其中请汪洵写了21个大字,笔资130块银元。那时三块钱就可以买到一石(读“担”,量词,10斗为1石,约合100公斤)秈米。

汪洵(?—1915),原名学瀚,字渊若。后更名洵,字子渊。江苏常州阳湖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书法家颜真卿,得其神骨,又参以他帖而变化之,工力甚深,兼精篆隶。晚年辞官在上海鬻字,笔资颇高。

先父又说,大福来因为管理不善,人员贪污盗窃,仅开业三四年即亏蚀殆尽,不得不转让给他人,由独资改成合资,在招牌上角增加了“裕记”两个小字。再过了几年,“裕记”又改成“绥记”。这块招牌用了五十多年,至1959年拓宽街道时被毁。

### (二)于右任书“杏林春满”、“韩康事业”

西大街鱼行口西有一家诸葛实裕药店,店主是浙江兰溪诸葛村的药材商人,于清乾隆年间来如皋,承接了一开于明朝的药店。至清朝后期已发展成为全县药业之首。民国初年整修门面,增加了招牌。三间门面朝南,对面柜台。东柜卖饮片。里面朝南的金字招牌是“实裕字号”;外面朝西南是“杏林春满”四个草字,下款“于右任”。西柜卖丸散膏丹、药酒花露。朝南的招牌是“实裕老店”;外面朝东南是“韩康事业”,也是于右任的草书。

于右任(1876—1964)字伯循,陕西三原人,国民党元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先后任国民党联军驻陕总司令、陕西省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和监察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等职。他的草书被推为全国第一,因此从这里经过的书法爱好者总要停下脚步,欣赏这“沧海腾龙”的草书。

“实裕字号”据说是一位书法神童写的,字很老练;可是“裕”字的“衣”旁少写了一点,成为“衤”旁。创业的老板只研究药材,不注意书法。及至招牌做成竖立后,才有人看出字写错了。老板舍不得花钱重做,就这样用了200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斫毁。“实裕老店”是他家的一位老板诸葛鲁(字若愚)写的,端正敦厚的颜体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诸葛鲁任最高法院推事,江南解放前去了台湾。

### (三)韩国钧书“龙凤园”

龙凤园在西大街焦家桥东,原来是清茶馆,开业于光绪年间。民国初年扩展业务,早上增售点心、面和肴;中晚卖饭菜,包办筵席,成为茶菜馆。请海安韩国钧先生写了店名,制成金字横匾,挂在店堂内。

韩国钧(1857—1942)字紫石,世居海安(清代属泰州)。光绪五年举人。民国二年(1913)被推为江苏省民政长,二年后辞职。民国十一年(1922)又任江苏省省长四年。

### (四)唐驼书“恒大号”和“宏裕茶庄”

民国十九年(1930),在如城经营同和泰火腿腌腊公司和森大木行的徽商程幼海,在西大街大治巷西创设恒大南货号。石库门上有石刻的“恒大号”三字,是上海有

名的书法家唐驼写的；店堂内柜台上另有“恒大号”和“山海奇珍”两块金字招牌也是唐驼手笔。

安徽石埭富绅陈劭吾是南通张季直的亲家，于民国初年来如城定居，与人合资开创公裕钱庄。陈去世后，家产由他的继配夫人陈邕如掌管，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继承了开于如城西街的翟仁和茶庄，改名“宏裕”，有东、西两店。招牌也是唐驼写的。

唐驼（1871—1938），原名成烈，字孜权，号曲人，江苏武进人。因写字坐姿不正而成驼背，改名唐驼。书法驰名于沪上，时称唐体。上海许多著名企业的招牌都是他写的，如中华书局和南京路的老介福绸布店。与沈尹默、马公愚、天台山人并称题额写匾四大圣手。

#### （五）谭组云书“迎宾旅社”和“广雅楼”

西门内贾家空场的迎宾旅社，开于民国初年，店主是中医陆子音。新式表门上有石刻的“迎宾旅社”，大门上有红底黑字对联：“迎之倒屣，宾至如归”。都是海安谭组云撰书的。

南门内苏家巷有一家规模较大的广雅楼旅社，是镇江籍名商道少吾所创。初名大雅楼，经营“镇扬式”菜肴和早点。数年后改业旅社，更名“广雅楼”，朝东表门上石刻“广雅楼”和大门对联：“广延嘉宾，雅集斯楼”。也是谭组云手笔。

谭组云（1876—1949）名德钟，字孝先，号高谭。皈依印光大师后法名德备，晚号海陵老人。祖居江西南昌，晚年居江苏泰县海安镇。民国时蜚声海上书坛。

#### （六）马公愚书“源大成钱庄”

1947年开业的源大成钱庄在县政府前南大街杜宅，门垛子上挂的二尺多高的铜招牌，是上海马公愚所书。

马公愚（1890—1969），浙江温州永嘉人。民国初年曾在家乡创“东瓯美术会”。后来任中学教师 and 上海美专、大夏大学教授。是有名的书法篆刻家。

1949年初，如城区有大小店铺一千多家。1956年初和1958年底两次私营工商业大合并，废除旧的店名，但有的店面和招牌还在原处。1958年12月至1959年1月拓建海阳路和跃进路，拆毁了南门内、外大街和东、西大街的一部分。被拆的店铺招牌与房屋同时被毁。1966年“大破四旧”，所有的招牌全部被毁；即使早已停业的店铺，也怕被加上“妄想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不得已将废旧的招牌也斫毁。

### 其他毁失的名人墨迹

#### （一）冒起宗书定惠寺楹联

清代如皋寺庙较多，光绪末年，“毁庙兴学”，有的改成学校；广福寺则改作县议会；玉皇殿改作女工传习所。“大跃进”时，有的寺庙作为工厂，有的作粮库，有的改成民宅。定惠寺（原名“定惠寺”，光绪末年改今名）是硕果仅存的一座。大殿上原有一块“庄严福地”的金字匾，是某朝钦赐御笔；另有一块“辉映中华”，是光绪末年从北京设法“请”来的慈禧太后“墨宝”。历来皇帝、太后的“御笔”，多数是大臣代笔的赝品。倒是大殿柱子上有一副金字长联，下款是“大明万历XX年弟子冒起宗定位改向”。明朝中期开始，冒家即是定惠寺的大施主。在重建大殿时，冒起宗不仅布施巨款，还出钱

令和尚到浙江嘉兴请来藏经,布施给该寺。据冒襄《重修定惠寺说》,重建大殿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开工。原来山门和大殿都朝南,因筑城后,山门在城脚下,出入不便,故改成朝北。所以要“定位改向”。1966年“破四旧”,定慧寺首当其冲,佛像、佛经、法器和匾对等全部被毁。现在殿上重制的“慧映中华”匾是请百岁翁苏局仙所书。不知何人将“辉映中华”误写成“慧映中华”,以致苏老以讹就讹,不免贻笑于方家。

冒起宗(1590—1654),字宗起,号嵩少。冒襄之父。明崇祯进士,以吏部主事升郎中,任山东兖西佥事,调湖南衡永参议、襄阳监军。又以山东按察副使督上江漕储。辞归。清顺治十一年病歿。

#### (二) 史鸣皋书海月寺额和对联

海月寺初名观音堂,始建于北宋。清乾隆年间重建,增砌楼阁和钟鼓二楼。客厅屏门上有史鸣皋撰书的对联:“深院观心,院外六桥桥上月;闲窗纵目,窗前一镜镜中花。”山门上石刻“海月寺”横额;照壁墙上“无碍大悲”和对联:“到此即生善果,何须远觅慈航”,都是史鸣皋手笔。解放前海月寺几经改建,仅存山门和钟鼓二楼,现已整修更新。山门上“海月寺”三字是补制的。

史鸣皋字荀鹤,号笠亭。本城人,住南门内益人桥北之东。乾隆十六年进士,历任浙江昌化、象山知县,升广西梧州同知、柳州知府。工书,善画花草竹木。《如皋县志》和《中国人名大辞典》皆有传。

#### (三) 戴联奎书刘氏宗祠匾

刘氏宗祠在海月寺之西。原来厅上有戴联奎尚书写的匾。“大跃进”时,刘氏宗祠作为人发猪鬃加工场,此匾不知下落矣!

戴联奎(1751—1822),字紫垣,本城人。晚年住冒家巷,府邸尚在。他以乾隆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嘉庆年间多次升迁至兵部尚书。以书法著称,但存世的已不多。《如皋县志》有传。

#### (四) 谭延闿书冒氏宗祠匾

冒氏宗祠在学宫后巷,原为冒襄家之北宅,清康熙四十年(1701)改作冒氏宗祠。旅沪的友人冒荫寰说:“曾听到本家长辈说过,冒家祠厅上有谭延闿写的匾,可能是鹤老(冒广生字鹤亭)请他写的。”冒氏宗祠在1954年粮油统购统销后,曾作为居民粮油供销点;“大跃进”时又改为绣花厂。2010年,仅存的明朝建筑大厅和门堂均被拆。

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又字组安,号畏三,湖南茶陵人。光绪三十年进士,授编修。辛亥革命时为湖南军政府民政长、参议院院长。后来任湖南省长兼湘军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工书法,能诗。南京中山陵孙中山总理墓碑是他所书。延闿之弟泽闿(1889—1947),字瓶斋,也以书法驰名。兄弟二人均与冒广生为诗文之友。

#### (五) 王文治书“义参天地”

京江会馆全称为“京江旅如同乡会馆”。在县政府西烟店巷内。“京江”是镇江古名,故民间皆称为“镇江会馆”。光绪末年,镇江籍商人集资在会馆内创设“私立京江小学堂”。幼年曾在京江小学读书的戴家驹先生说,关帝殿上有王文治写的“义参天



地”匾。“大跃进”时，京江会馆被拆，“义参天地”匾亦被毁。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镇江府丹徒县人。乾隆二十五年中探花，曾官翰林院侍读学士、云南姚安府知府。一度出使琉球，文名播海外。诗文成家，工书画，精音律，为当时四大书法家之一，又与袁枚等同为四大诗家。

#### (六) 张人杰书“颐园”

颐园在海月寺东，建于光绪末年，为沙平斋(绳正)之别墅。后来为沙平斋长子元榘(字士度)之住宅，前园后宅。人称“沙家花园”。沙元榘自清末至民国初年，主管如皋县教育先后 23 年。他于民国初年在园内建西式楼一幢，又改建园门，请张人杰写园名，刊石砌于门上。“大跃进”时，颐园作为木器生产合作社。后来改建厂房，园门被拆，石刻不知下落。

张人杰(1876—1950)，原名增澄，字静江。住浙江吴兴南浔镇。祖业蚕丝及海盐，为浙江巨富。张因少年时跌伤腿骨，一足跛。辛亥革命前后，他以大量经济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孙中山亲书“丹心侠骨”以赠。后又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并以经济支持蒋介石。1925 年后，任广东国民政府常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理主席、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主席、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浙江省政府主席。在浙江大办实业，筹资作地方建设，举办“西湖博览会”。日军侵华后赴瑞士，转美国，病逝于纽约。

#### (七) 冯玉祥书“安乐家”

民国十六年(1927)，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兼医生海深德在如城冒家桥河南，购地建住宅，由名匠龚义成承建，中西合参式房屋。有天水池、地下室、花坛、草坪，并有壁炉。中式大门上有“安乐家”三字石刻，下款“冯玉祥”。海深德于日寇侵华时回国。解放后，“安乐家”作县委招待所分部，房屋改建，石刻散失。

2014 年 6 月

# 活跃在《国医砥柱》里的通如名医们

## 一 亭

《国医砥柱》是“北京国医砥柱社”社刊，也是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医刊之一。1937年1月1日，《国医砥柱》创刊，陈立夫和彭养光等名人为“北京国医砥柱社”顾问，于右任为《国医砥柱》题写刊名。参与《国医砥柱》编述工作的名医遍天下：丁福保、焦易堂、施今墨、张赞臣、时逸人、曹炳章、陆士谔、陆渊雷和秦伯未等等。笔者藏有近40本不同期的《国医砥柱》（惜缺创刊号），从中发现《国医砥柱》虽为北方名医主办，但特别关心通如地区中医的发展。

《国医砥柱》创刊之初，北京国医砥柱社便借助《国医砥柱》积极发展分会。第七期《国医砥柱》（1937年7月印行）便出现了筹备通如地区分会的消息：《奖励分会筹备组织通告》中刊登了“江苏吕四分社筹备主任张宝仁和岔河分会筹备主任曹惕安”的名字，并配有二君的玉照。也是从同年同月开始，如皋顾亦武、杨鸣皋、赵月恒、海门黄毓麟、南通丁桂馨、孙澍盈、孙绳武等等通如读者陆续入会。据第十期《国医砥柱》，三个月后，北京国医砥柱社在江苏积极筹备四个分会，其中三个在通如地区：田振声负责“江苏如皋分会”，杨鸣皋和曹惕安共同筹备“江苏岔河分会”，张宝仁由“吕四分社”筹备主任升为“江苏南通分会”筹备主任。

1939年初，北京国医砥柱社还曾筹备“皋东分会”，其中缘由要从如皋姚世琛说起。姚先生曾经撰文《一年零七个月我所要讲的话》（刊于第十三、四期合刊《国医砥柱》）。他是一位医药爱好者，与沪上医学名家丁仲英、盛心如、张赞臣和陆渊雷常有鱼雁往来；但是突如其来的身心疲惫，使他一年七个月不能接触外界。等身体恢复，他发现自己喜欢的《国医砥柱》依然存在，实为安慰（民国时期，战乱频繁，“长寿”刊物不多）。出于崇拜杨医亚（北京国医砥柱社社长）等人保护中华医药文化的精神，病后初愈的姚先生积极向乡人介绍《国医砥柱》。他曾去丰利镇，向当地医会主席欧育璜和执委王玉材推销《国医砥柱》，受到欧、王的热情款待。随后第十三、四期合刊《国医砥柱》便刊登了邀请姚先生为“皋东分会”筹备主任的消息。

大约从1942年开始，《国医砥柱》不能按月出版。战后复刊，每月一期，但是分会人员变动较大。第51期上刊有《国医砥柱社各地分社一览表》，1946年底，“江苏如皋分会”主任马冠群，“南通分会”袁绳武。马先生是如皋名医。他在第57期《国医砥柱》

上发表了《如皋分社成立感言》。1947年3月30日,如皋召开了分会成立大会,群医聚集,盛极一时。如城旧时有会,已停顿多年。同年下半年,“国医砥柱社”还抓紧发展“四安(今南通通州区四安镇)分社”。《国医砥柱》先后刊发了《国医砥柱社四安分社附设新中医研究社组织章程》和《四安分社成立宣言》。1948年2月,第65期《国医砥柱》刊发了《四安市分社成立纪念》的照片,有分社社长陈滋全、研究主任顾楚征等等。一年后,南通全境解放。因此“四安分社”很有可能是“国医砥柱社”在通如地区成立的最后一个分会。

通如名医是《国医砥柱》月刊健康发展的忠实砥柱之一。

朱南山、朱鹤皋和朱小南父子三人都是南通名医。笔者藏刊显示,从1937年到1941年,朱鹤皋先生一直是《国医砥柱》撰述部主任之一。从第23期起,即1941年7月,朱小南也开始出任《国医砥柱》撰述部主任。朱鹤皋与《国医砥柱》关系密切,可能与名医钱今阳有关。钱今阳是“国医砥柱”社顾问、研究室主任和“上海分会”会长。朱鹤皋和钱先生是好友。1939年2月,在第十三、四期合刊的《国医砥柱》上,钱朱二君“同台演出”:各自发表了一篇作品。当时恰逢朱鹤皋的父亲朱南山逝世,钱先生写有《挽南通朱南山》:“擅医术,具仁心,妇孺蒙麻,噩耗遽传同一哭;有余庆,在积善,箕裘克绍,令名远播足千秋。”同时“刊中刊”《中国女医》在同期《国医砥柱》上创刊,钱今阳题签。《中国女医》辟有专栏“女医小传”。第一篇“小传”就是“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南通朱鹤皋”在1939年元旦撰写的《武进钱宝华先生序》。钱宝华就是钱今阳的姐姐。一篇挽友父,一篇颂友姐,《国医砥柱》见证了南通朱家和武进钱家的医缘和友谊。

姜春华和朱良春是民国中医界的后起之秀,他俩在战后的《国医砥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据《南通县志》和《姜春华》(宋光飞撰写)等书文记载,姜春华(1908—1992),南通金沙人,出生中医世家,曾随陆渊雷学医,成名沪上,有“沪地新中医青年领袖”之称;解放后,长期任上海华山医院中医科主任,晚年为上海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述书文均未提及姜先生与《国医砥柱》月刊的医缘。笔者的藏刊显示:姜春华从1946年底(第51期《国医砥柱》出版)已经是此刊的编委之一。此时的姜春华年富力强,作为编委,他还“亲自上阵”,数次为《国医砥柱》撰写高质量的医学论文,有《再论中国医药问题》(第56期)、《中医病症之科学观》(第61期)、《中医病症之科学观——黄疸》(第65期)和《中医病名之科学观——消渴——伤寒》(第70期)。这批论文让姜春云名扬北方医界。在《国医砥柱》的帮助下,《国医砥柱》月刊社出版了姜春云的专著《中医生理学》、《中医病理学》和《中医诊断学》(较阅者就是《国医砥柱》主编杨医亚先生)。《姜春华》一文曾经统计了姜氏的著作,上述三本书是著者最早的著作。

朱良春是南通家喻户晓的名医。他生于1917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是章次公、朱南山等名医的学生。朱良春与姜春华是同乡,又是“异地同事”。从笔者所存最后20多期《国医砥柱》中所印编委名单中,姜春华和朱良春总是名列其中。何来异地?当时姜春华已至上海工作,而朱良春在南通悬壶济世,并创办南通中医专科学校(可见2011年《中国中医药报》所刊《朱良春小传》)。1947年初,朱良春在第53期《国

医砥柱》上发表了《呕吐篇》。此文原作者是日本医家青木幸三郎,译者是朱先生,介绍了呕吐的起因和疗法。译文通俗流畅,显示了朱先生的翻译才能。

陈爱棠先生是如皋中医的领袖。《国医砥柱》创办之初,陈先生为“如皋县中医公会常务主席”。1937年,中华民族正处危难之中。“北京国医砥柱社”是一个爱国组织,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保存和发展中医,帮助国人摆脱‘东亚病夫’之名”。陈先生非常赞同,他为《国医砥柱》创刊题字:“力挽狂澜”(刊于第2期《国医砥柱》)。不仅如此,他与朱鹤皋等通如名医一起出任《国医砥柱》撰述主任之职。陈先生对于《国医砥柱》最大的贡献是将如皋医界的各种重要动态通过《国医砥柱》告知全国同仁。即使陈先生卸任“如皋县中医公会主席”,如皋中医公会与《国医砥柱》的良好关系如同一种习惯得到了保持。从第2期(1937年)到第57期(1947年),十年间,《国医砥柱》报道了大量如皋中医公会的消息,有《如皋县中医公会公函》和《1946年12月如皋县中医师公会成立》等等。这批消息是研究民国如皋中医公会的重要资料。关于如皋中医公会的历史,目前相对容易找到的第一手资料是《如皋医学报五周年汇选》(笔者手头就有两本,同城两位友人有三本,网上也曾见过)。此书于1930年出版,之后如皋中医公会如何发展呢?正好《国医砥柱》的相关内容“最好的衔接”,填补了“两战(‘抗战’和‘内战’)时期”如皋中医组织发展史的空白。

黄星楼与陈爱棠格外有缘,不仅是同乡,而且是“老同事”。在编印《如皋医学报》时,两人都是创办人,开始由陈爱棠全面负责,后来黄星楼成为了陈的接班人。《国医砥柱》创办,黄星楼与陈爱棠一起成为《国医砥柱》的撰述主任。1947年4月,第54、55期合刊《国医砥柱》刊登了黄先生的大作《热霍乱转舌缩病案》。无论是历史价值,还是医学价值,这篇文章在当时都十分有意义。据《霍乱》记载,1946年夏,如皋及周边地区发生震惊全国的大霍乱,死亡率达到20%—50%。据《扬子晚报》的《1946年的“上海小姐”评选》等文记载,为了救灾,上海当时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选美“上海小姐”的比赛,可见如皋疫情非常严重。黄星楼作为如皋内科高手,他遇到一位年仅二十一岁的霍乱病人许峰银,家住如皋西门外陈家缺,其病已由“热霍乱转为舌缩病”。黄氏坚守“苦寒辛凉兼化浊法”开处方,许氏连服两剂,再以食疗,“死里逃生”,完全康复。民国时期,霍乱是常见难治病。《热霍乱转舌缩病案》正是黄氏治愈此病的成功医案,通过《国医砥柱》,可为外地医师借鉴。

如皋名医周筱斋最值得一述。据《从医回忆录》等文记载,周侗生(1889—1989),字筱斋,如皋东马塘人(今属如东)。祖籍浙江宁波府东乡慈谿县车轮桥,后迁居江苏如皋县东马塘镇,世代为医。解放前曾是“如皋县中医公会马塘分会主席”,解放后长期在南京中医药大学执教。周先生是撰写医学论文的老手,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便成为《如皋医学报》的主要撰稿人。《国医砥柱》创办后,他更是笔耕不辍,成为通如医师在《国医砥柱》发表文章数量最多的一位。1937年3月,从第三期《国医砥柱》开始,周先生成为《国医砥柱》的撰述主任。同年2月15日,周筱斋在晓塘(马塘古名)惕庐医室写下了一篇《〈国医砥柱〉月刊发刊序》(刊于第四期《国医砥柱》)。这篇“纪念序”记述了周先生的心语:多年来,中西医在中国是此长彼消,在中医危难之秋,“杨君医亚国医中之有心人也……(周)敢不稍尽绵薄,本‘匹夫有责’之旨,而追随

诸先生以谋挽危图存复兴绝学耶。”周先生并未食言。随后他的佳作连二接三地发表在《国医砥柱》上。《中国医家应取之趋向》刊于第五期“评论”中首篇，提出了“沟通中西，取长补短，不着哲理，不迷科学，摒弃空言，趋重事实”的为医道理。《心理疗法我之实验》最为有趣，发表于第六期“经验实录”第一篇。30多岁的李堡曹家园少妇殷氏，偶见巨蛇，蛇走人病，腹部疼痛，时缓时急，百药不治，疑是蛇怪，求神拜佛，依然无效。周先生晓之以理（给予病人心理暗示），世间并无蛇妖，再用药治理，殷氏病除。周氏的心理辅助疗法让外地医家耳目一新。《痢疾症为实》（第八、九期合刊）、《特敏症漫谈》（第十期）和《素灵选粹新释》（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只有此篇署名“周侗生”，其余均署名“如皋周筱斋”或“周筱斋”）等大作也先后刊于《国医砥柱》。周先生通过《国医砥柱》将自己治病经验全盘托出，同仁共享，造福病人。

为《国医砥柱》撰文的通如作者还有南通陈寿民、陈滋全、陈伯涛和如皋汤如芳、贾黻卿等人。最后笔者着重介绍下彭效黄医生。彭效黄，又名彭汉书，南通人，民国时期曾在南通行医，并在泰县曲塘镇北刘庄的文辅医院任职，兼治内外科；解放初期在如皋平西区从事多年医务工作。彭先生喜读喜藏医刊，笔者所得《国医砥柱》全是彭氏旧藏。在手抄本《程松崖眼科》中，彭先生写有抄录此书的“缘起”，从中可以知道彭家曾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五月和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十二月两遇火灾，其中部分书刊遭焚，主人痛心疾首。笔者所存部分《国医砥柱》留有焦黑色，可谓“劫后存书”。彭先生也是国医砥柱社会员。笔者在1938年9月出版的《国医砥柱》上发现了他的玉照，照片下面清楚地写有他是南通人。因为彭氏爱书，笔者才能哀集多本医刊，整理出通如医师对于《国医砥柱》的贡献。

《得南通彭汉书旧藏〈国医砥柱〉有感》：人去刊在心无奈，唯有书缘最是真。残简旧书当自珍，梓里医史激心魂！

（通讯地址：如皋市如皋中学英语组 周婷收）

# 沙地庙会

盛永康

所谓庙会,正如《辞海》所说:“庙会亦称庙市,是我国的集市形式之一,唐代已存在,在庙宇节日或规定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故名。”至于沙地庙会始于何时,笔者尚未考证出来。

清代嘉庆二十五年,我的家乡海门中部地区的长兴镇曾建造了一座长兴关帝庙。随之,这块沙地亦传入了庙会活动。每逢庙会,周边的父老乡亲似赶集般蜂拥而至,并且不受行政区域的限制。于香烟袅袅中,商贾云集,人山人海,茶坊酒肆林立,杂耍百戏杂陈,一派老幼皆可参与的盛大节日活动的景象。而且,庙会置有不错的菜肴,款待四方众乡亲。

沙地庙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以祭祀神仙菩萨为主的,如城隍、关帝、观音等;以鼓励农业生产为内容的,如春牛会、十月朝、龙王会等;以文体娱乐为内容的,如哨船会等。其中以第一类居多数。

从沙地庙会的活动规模看,有一年举行一次的,有一年举行两次的,有单独一庙举行的,也有数庙联合举行的,还有室内室外之别,大部分是相互结合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庙会的规模、内容越来越扩大。

家乡那座关帝庙的庙会,尤其是关帝诞辰——农历五月十三日的庙会活动,内容丰富,形式繁多,盛况空前。每年逢到此日,首先燃放烟花爆竹,随后队伍出发,也就是“出会”。红、黄、绿、白、黑五色旗(象征五色云彩)开道,南货店拿红旗,米店人员举黄旗,竹行、烟纸店、煤炭店分别拿绿、白、黑旗。接下来是威武的“龙虎将”,由绸缎庄店员做向导,抬着关老爷的大轿;豆腐店雇工高举护卫旗,队伍整齐,锣鼓铿锵,和尚吹奏着乐器,从各处来的关老爷的信徒紧跟后面。他们穿着红衣红裤,象征着替关帝受罪,有的还赤膊上阵,以示自己是重犯。数位青壮年手执藤条,藤条上装着响铃,发出阵阵叮当之声。有的青年左臂上以数只钩子穿于皮肉里,钩子上挂着大锣,右手拿着棒敲打,以表诚心诚意替关帝受罪。当地镇上沿街搭起了社棚,整夜灯火通明。出会队伍来到社棚停下来,鼓乐齐鸣,演戏唱曲,这就叫“迎会”。

翌日近中午时才全部通过所有社棚,然后队伍回庙上堂。首先举行祈福、上供、献艺及送神等例行程序。接着,关帝庙戏楼开始演剧(其中有的是专业戏班,也有的

是民间艺人)谢神,所演内容大多数以歌颂关公英雄业绩为主,如《十里单骑》、《单刀赴会》、《华容道》等,但禁演《走麦城》,切忌再现英雄的悲惨结局。庙场上,各种杂耍游艺,大显身手,热闹数日,竟达到了里三层外三层、人山人海的景象。此种庙会,亦是文人墨客消闲聊天、吟诗作对的好去处。可见,庙会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是旧时当地的盛大节日。

庙会活动是因地制宜举行的,每次一般二至三天,最长不超过七天。举行庙会的日期是根据农时季节确定的,大多安排于农闲时,如农历的正月至四月以及七至九月等。反之,在农忙的五、六、十、十一月极少举行庙会。

其中,春牛会也是沙地较大型的庙会。原先是从祭农坛开始,后来才固定于立春之日。一到这天,四乡农民一早就把所养之牛牵出来,并选拔健壮的耕牛洗刷一净,披挂上彩绸缎带,两只牛角间扎起大红绣球。待到卯时,庙场上排列全副硬牌执事,三班衙役,六科司事,及地方上士农工商的代表人物。镇上各行各业分别承担“打莲湘”、“扮地戏”和民间杂耍活动,诸事齐备后,总管就传报上司,上司率领当地有名绅士,手拈长香,簇拥在春牛后面。出发时,鸣炮三响,锣鼓班敲起了“将军令”锣鼓,细乐班奏响乐曲《朝天子》,鼓乐喧天,震耳欲聋。打头是“肃静”、“回避”的头马牌,随后队伍依次行进,无数民众立于庙场四周。牛倌将全身披挂的耕牛牵往中央,摆开香案、素食,有绅士们向春牛行礼;于是一只只壮牛绕场一周,供众人评赏。接着,又一阵鞭炮巨响,才算结束,按次回去。这样的春牛会,虽有求神保丰收之意,但亦鼓励农民养好耕牛,促进了春耕生产。

沙地庙会还是民间文艺的大会串,为民间文艺的继承发展提供了良机。那时,乡间差不多都有自己特色的民间文艺来到庙会表演,其中包括歌唱、舞蹈、演戏、武术、民乐、杂技以及工艺美术等。诸如走马灯、踏高跷、打花鼓、扭秧歌、打莲湘、舞龙灯、大头娃娃、旱船、贝壳舞、叠罗汉、坐唱班、小热昏、敲鼓亭、锣鼓龙舟、年画、剪纸等不一而足。所以说,沙地庙会亦是旧时群众文化娱乐活动的盛会。

沙地庙会活动中还传播了一定的文化知识。那时老百姓的文化程度普遍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文化娱乐极端贫乏,不能不说庙会的活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庙会期间,民间文艺队伍带着具有特色、具有竞赛性的节目汇集在庙宇广场上表演,蔚为壮观,让群众欣赏评论。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如果没有这种庙会,也就没有那样规模宏大的表演、交流民间文艺的时间、场所。没有世代相传的庙会,肯定有许多民间文艺不能得以保存。所以,沙地庙会对于繁荣、交流、保存、发展民间文艺有推波助澜的独特作用。

庙会期间,商家云集,茶坊酒肆林立,一片叫卖之声不绝于耳,糖制小鸟、纸糊“风车”、摇糖鼓、大饼油条、糕点茶食、花布绸缎、应有尽有,服饰鲜艳、琳琅满目,杂货繁多、要啥有啥,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真好比现时的“展销会”那样闹猛之极,也犹如前些时候的海门金花节那样精彩纷呈。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善当时物质匮乏、经济落后的状况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

兼收并蓄。”故而,沙地庙会与一切旧文化一样,有其糟粕,也有值得借鉴和改造利用的部分。

沙地庙会糟粕的主要方面是:宣扬唯心主义。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沙地庙会活动亦属宗教的组成部分。一座庙宇,一个个锦袍玉带的王侯和并肩坐着凤冠霞帔的诰命夫人,两侧皂隶差役配备齐全,与人世官衙无异。一座庙宇就相等于一座衙门,不仅接受老百姓顶礼膜拜,而且许多老百姓在庙会时穿着罪衣罪裙,充当犯人,跪拜叩头。更有甚者,要用十二只细钢钩扎入手臂肌肉里,下悬三五斤到十来斤重的铜锡香炉,名曰“扎肉提香”,其残酷程度亦与人世官衙无异。这就是对老百姓的愚弄、奴役和压迫啊!

但是,老百姓对神仙也颇有大不敬之处,这正如鲁迅先生议论“灶司菩萨上天用饴糖堵嘴”一样,亦有把龙王甩在太阳底下暴晒三天的情景出现,这是人们对于疏于职守的菩萨老爷的惩罚。

话得说回来,沙地庙会毕竟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它还寄托着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真诚爱情的追求,对深受封建压迫的劳苦大众的同情。据传,沙地有位小姑娘爱上村里的一个小伙子,但受到父母和亲属的阻挠,小姑娘不能如愿,含冤投河自尽。她死后,冤魂不散,夜夜到村里作怪,弄得家族中不得安宁。这使村里那个小伙子十分感动,结果亦自尽身亡。村里人感慨万千,既为了求太平,又为了成全他们死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就造了座妹妹庙。庙里塑了小姑娘的神像,旁边造了小伙子的像,庙宇正殿后,还布置了一间新房。从此,村里安宁了。那些追求自由恋爱的青年,暗中祈求他们保护,后来竟发展到祈求他们保佑人口太平、年景丰收。故每年在那小姑娘的忌日举行庙会。

沙地庙会,实际上是旧时农村文化活动集中的表现形式,如今,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事业中,已经远远超过旧时那种庙会并做到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促进民间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总之,沙地庙会亦属一种文化遗产,而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民族的根。我们要因势利导,借鉴和改革庙会的传统形式,并充实到群众文化活动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作者地址:海门市常乐镇长兴老街 邮编:226142 电话:82713760)



有人说,乡村文明是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文明之根,许多古老的农具则是乡村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一些代代相传已越千年的农具,只能带着乡愁与怀念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了……

## 最后的石器(三题)

夏俊山

### 碌 碡

朋友告诉我,海安仇湖的白龙寺有一只碌碡,不少人在碌碡前跪拜、焚香——我早就听过仇湖有一头小白牛化为白龙升天的传说。如今,这民间传说才有了续集:小白牛化龙升天,碌碡带不走,丢在湖底,后来有人梦到碌碡所在的位置,下水去摸,真的找到了,就是现在供奉在白龙寺的这一只。

毛泽东《贺新郎·读史》中说:“人猿相揖别,只几块石头磨过。”人类最初使用的劳动工具就是石头,而碌碡,原本就是一种古老的石器农具。至于它源于何时,海安境内有青墩新石器时代遗址,不过,那时的石器应该是小型的,没有碌碡这么复杂。碌碡进入文字记载,笔者知道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大小麦》有注云:“治打时稍难,唯伏日用碌碡碾。”宋代诗人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也写到碌碡,其中有诗句云:“系牛莫碍门前路,移系门西碌碡边。”按此诗意,当时的碌碡应该已随处可见了。

作为农具,碌碡的主要用途是压平打谷场,碾压谷物使其脱粒。在我的乡下老家,人们把前者叫“做场”,后者叫“碾场”。

“做场”在庄稼登场之前,先把一块结实平坦的场地整平,然后把表面的土耙碎耙细,用碌碡滚一遍碾平整,然后均匀地泼上水,洒上一夜,第二天早晨,撒上麦糠,再一次地拉着碌碡,一圈圈地滚压。碌碡有棱齿,滚压前,要备上一摊稀泥,掺上麦糠,拉着碌碡在里面滚上一滚,将碌碡的齿沟填满泥,使表面变得平滑。南宋诗人范成大在《秋日田园杂兴》中写道:“新筑场泥镜样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用表面平滑的碌碡平整后,再扫去麦糠晾晒干的新场,确实能给人“镜样平”的感觉。

“碾场”要把填满沟槽的泥去掉,恢复碌碡的棱齿。那时,每个生产队都喂养着几头牛,“碾场”时,要先放场——用叉子把收割上场的麦捆解开,在场上铺成厚薄适中的一圈。接着把碌碡挂上专用的拉架。碌碡的两头不一样粗,碌碡粗的一头要朝外,这样更适合拉着转圈。把牛套上后,一声吆喝,牛鞭一扬,牛便拉着碌碡不断地滚动,

一圈一圈地在麦草麦穗上碾轧。这时的打谷场就像一台旧唱机,在麦子铺成的唱片上,牛拉着碌碡的唱针,咯吱咯吱的声音,像风吹着一扇半掩的木门。这声音跟嘹亮的赶牛号子汇成了一首交响曲,让人们心里热乎乎的,似乎看到了丰收的希望。

“秋天到,稻上场。拉起碌碡来碾场,满场的稻谷泛金黄……”与碾压麦子不同的是:碾压稻子要给牛戴上竹篾子或铁丝编制“笼嘴”——牛不吃麦草,爱吃稻草,戴上“笼嘴”后,它就只能一心一意干活了。

收完稻谷,进入冬闲,碌碡没有什么用途,只能孤寂地躺在场边。乡间没有娱乐的去处,这时,会有人聚集到场上,比赛掀碌碡,看谁力气大,这也可以算是一年之中除了打场,人们同碌碡的又一次亲近吧。有些碌碡,用得太久了,表面的棱齿模糊了,变得平滑起来。这样的碌碡难以碾下谷粒,必须请石匠前来洗碌碡。随着叮叮当当的单调而清脆的敲击声,石匠的鏊尖有节奏地一点点在碌碡上向前移动,碌碡表面的棱齿又变得清晰起来,乍一看,很像麦穗的图案。

人类文明史,实际上是农耕文化的进化史。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到来,碌碡被遗弃是必然的。不料,碌碡又成了白龙寺中的神物。看来,碌碡并没有彻底淡出我们的生活,它留给我们多少记忆,多少遐想啊!

## 碓

夜里做了个梦,梦中又听到了舂碓声;醒来,竟记起小时候奶奶让我猜过的一则谜语:“木公鸡,啄白米,啄来啄去啄不起。”谜底就是碓。

古时将硬物砸碎或者将谷类去壳,起初是用臼。《易·系辞下》记载:“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手执木杵臼舂粮食,效率很低。要舂更多的粮食,就得用碓了。因此碓是臼的更新换代产品。它的构造不算复杂:碓身是一截长木头,粗的一头叫“碓头”,碓头下安一根饭碗粗,约一尺半长的圆木,圆木跟碓身形成一个7字,下端装有金属的碓齿,圆木叫碓杵(俗称碓扁儿)。碓身中间是支撑点,后面是舂米人脚踩的地方,叫碓尾,碓尾有一尺左右削成平滑的,可便于用脚使力踏上去。为使碓头能高高腾起,碓尾下挖一个小方坑,叫“碓坑”。碓尾上方拉有绳子,或吊一根横木,左边站一个人,右边站一个人,手挽绳或握横木,借以稳住自己。碓的关键部位是碓杵和碓臼。碓杵末端镶有铁片圈,铁片圈前面凸出三四行碓齿。“碓臼”是用石头凿成的,它是一个上大下小的圆锥形石窝,内空,臼壁上有石匠打制的浅浅的螺纹线。

舂碓多为两人,彼此各用一只脚踩在碓尾上,有节奏地踏动碓身尾部,碓头便一起一落,碓杵也随着一起一落重重地砸在碓臼内的稻谷上,稻谷中舂出了米,就用筛子把米筛出来,然后把筛出的稻谷再倒进碓臼,如此反复循环约一个钟头,一碓臼的稻谷便舂成白米。谜语中的“木公鸡,吃白米”说的就是这一情景。

舂碓声是一首古老的乡村歌谣,它吟唱着劳动者的沉重与艰辛,也吟唱着他们的聪明与才智。因为碓巧妙地运用了杆杠原理,与更古老的用臼手工舂米相比,既省工、省力,又提高了工效。汉文帝时有民歌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见《前汉书·卷四四·淮南厉王传》)。从古人借舂米讥其兄弟不相容,可以想见,当时,碓与人们的生活联系已经十分紧密。

更有意思的是,碓跟禅宗可能也有不解之缘。据史料记载,禅宗六代祖慧能原先就在碓房舂米。有一天,禅宗五祖弘忍命各徒弟作偈,若悟大道,将选为继承人。慧能在碓房,也作一偈,因不识字,请人写在壁上,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见了慧能所作偈,第二天,就偷偷来到碓房,问:米熟了没有?慧能答道:米早熟了,只差没有筛子。五祖用拐杖在碓上敲了三下走了,慧能会意,三更时来到五祖住处。五祖为慧能讲金刚经。慧能大悟,终为禅宗第六代祖。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所在的大队有了碾米机,碓不再作为舂米的工具,但每个生产队通常还保留着一张碓。到了年底,大家都喜欢用碓磕粉,因为碓磕的糯米粉质量好。记得一到年底,磕粉的得先排档。有个叫贵爹的,年年都在生产队的场棚里帮大家安排磕粉的先后,也就是排档的顺序。排档时间长了,大家就说说笑笑,嘻嘻哈哈、叽叽喳喳,孩子们没事干,就到磕粉的那边玩,看大人舂碓,筛粉。

碓除了用来加工粮食,还可用来舂油石灰。那时,每个生产队都有木船。要维修的木船拖上岸后,修船的师傅便把石灰拌上桐油,用碓一遍又一遍地舂,舂好的油石灰和上麻丝是填补木船缝隙不可缺少的材料。

如今,农用木船早已被水泥船取代,而超市出售的水磨糯米粉,其质量与木碓舂的米粉比毫不逊色。古老的木碓就这样淡出了乡村,淡出了我们的生活。然而,夜里的梦分明告诉我:它并没有淡出我的记忆。

## 石磨

海安有一条奇特的石磨路,它由 400 多扇磨盘组成,静静地躺在吉庆镇南的新四军“联抗”烈士陵园里。

看到这条石磨路,往事就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海。

记得童年时,我猜过一则谜语:“上下分两块,背上嘴张开。吃粮上身转,腰里粉出来。”谜底就是石磨。在乡村,石磨是重要的劳动工具。听老辈人说,并不是什么石头都可以成为石磨的,能够成为石磨的是那些坚硬、厚重、密度均匀的石头,经过石匠师傅千锤万凿出得深山,再经一番钎削斧刻,凿出穿绳的圆孔,喂料的磨眼,磨面的槽齿等,一副石磨才算大功告成。

我家也曾有过石磨,就安置在堂屋的一角。石磨下面有高约 2 尺的木架,木架上是磨塘,磨塘是木质的,上面是石磨,随着石磨转动,面粉就落在磨塘里。石磨由上下两扇磨盘组成。下面一扇中间稍稍有些凹,像很浅的盘子,中间的圆孔里竖着一根拇指粗的铁轴,用融化的明矾浇铸固定的。竖着的铁轴高出一寸多,有人叫它“磨扁儿”,上面一扇磨盘中间有一固定的铁管,叫“磨脐儿”。将铁管套在铁轴上,上下两扇磨盘变吻合在一起,转动上面的一扇磨盘便可以磨面了。

我曾仔细观察过磨面的过程:一根绳子一头拴在屋梁上,一头系着磨杆,磨杆有丁字形的,但更多的是丫字形。上面的磨盘上有一固定的横木,伸出磨盘边外的一头有孔,将磨杆一头的木轴插入横木一头的孔,手握磨杆不断地推拉,推动磨盘。上面的磨盘有有一手臂粗的孔,喂料用的,叫“磨眼”。磨面的时候,倒在石磨顶端的粮食,顺着磨眼流进隆隆转动的两扇石磨中间,在交错的磨齿转动下被研磨,越来越碎,最

后从磨齿中流出,落在磨塘里,再集中到盘篮里,用箩筛筛,筛出的粗粒再重新研磨。富裕人家磨面,只磨三遍,留下较多的麸皮。穷人家继续磨,虽然面粉质量差了,但麸皮少了,可吃的就多了。

石磨用的时间长了,里面的磨齿磨平了,便磨不碎东西了,这时就要请石匠重新给它打出新的磨齿,这叫打磨,也叫锻磨。锻磨大多在秋收以后,锻磨匠来了,先是把磨盘的上升反过来,放在地面上安置妥当,锻磨匠手中的工具便有节奏地在磨盘上动起来,直到磨齿锋利……

在乡村尚未通电的时代,石磨是加工粮食、赖以生存的工具,是大家生活的守护神。它起源于何时呢?有资料说,制作石磨工序多,雕凿难,在铁器尚未出现的时代,石磨是不可能出现的。用铁铸造工具,大约开始于战国早期,因此,最早的石磨应该就诞生在这一时期。据《世本》等文献所记的“公输般作碓”推断,石磨最初的名字叫碓,汉代才叫做磨。宋代诗人王禹偁作诗道:“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诗人借对石磨的描写,表达了自己想“转身”而大展宏图的心愿。这说明在宋代,用石磨加工粮食已经十分平常。

岁月悠悠,日落日出。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大队建起了粮食加工厂。那古老甚至是原始的石磨,也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今天,当石磨组成一条奇特的路映入我的眼帘时,我心灵的天空顿时飘来一片片云彩,过去的的生活,过去的情景,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眼前……

(图见封三)

(通讯地址: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226600 手机:13912402745)

# 陈氏祖训传千年

陈寅生

2008年,我在编写海安县曹家庄陈氏家谱时,广泛征集散居在各地的陈氏家族资料。解放前就居住在台湾的堂兄陈德鉴寄来一本台湾“桃园县陈氏宗亲谱”,内中有这样一篇祖训:

明明我祖,汉史流芳,训子及孙,悉本义方。  
仰绎斯旨,更加推详,曰诸裔孙,听我训章。  
读书为重,次即农商,取之有道,工贾何妨。  
克勤克俭,毋怠毋荒,孝友睦姻,六行皆臧。  
礼义廉耻,四维毕张,处于家园,可表可坊。  
仕于朝野,为忠为良,神则佑汝,汝福绵长。  
若背祖训,暴弃疏狂,轻违礼法,乖舛伦常;  
貽羞家祖,得罪上苍,神则殃汝,汝必不昌。  
最可憎者,分类相戕,不念同宗,偏论异乡;  
手足干戈,令人忧伤,愿我族性,怡怡雁行。  
通以血脉,岁岁登堂,同底于善,勉哉勿忘。

80多岁的远房堂叔陈志瑞看到后说:这也是我们曹家庄陈氏的祖训,原先我家也有一本陈氏家谱,毛笔抄写的,上面就有这样的祖训。小时候,父亲是要我们背诵的。解放后,认为这是封建的东西,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就丢失了。不过,到现在我还能背一些。接着,这位平常我接触不多的老堂叔就背了起来。

这事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为什么台湾桃园陈氏的祖训竟与我们江苏海安曹家庄陈氏的祖训相同呢?我决心进一步寻找资料,做深入的探讨。

后来,我发现,这篇祖训是东汉的名人陈寔写的。陈寔生于公元104年,卒于公元187年。

陈寔家居颍川许(今河南省葛市古桥乡陈故村)。父亲名源,以耕读持家。

陈寔在乡间,以良好的道德风范感染他人,很有威信。有一天夜里,一个小偷潜入他家屋梁上准备行窃。陈寔知道后,把孙子叫到面前,给孙子讲孔子不饮盗泉之水的故事,要孙子堂堂正正做人,感动得小偷跳下梁来,向他磕头认错。陈寔对小偷说:“你认错了,也是个君子,你是梁上君子。”这就是“梁上君子”这个词儿的由来。

由于陈寔家教严格,优良的家风代代相传,陈寔的后代出了许多了不起的人物,冠盖相继。在汉晋时,社会上流行“汝颍多奇士”的说法。因为颍川陈氏声誉高,所以后世陈氏多有自称为颍川陈氏之后的,颍川陈氏也就流播全国。

陈寔下传十六代,到了陈霸先,陈霸先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创陈朝的陈武帝。

陈朝灭亡之后,陈霸先的后人迁居到江州德安(今江西德安县)。

到唐宪宗(806—820年)时,有位叫陈伯宣的,隐居在庐山批注《史记》,他很有学问,朝廷多次征召他出仕,他都辞谢了。朝廷只好拜他为著作郎。著作郎相当于现在吃财政饭的专业作家。他所住的地方山青水秀,风景优美,有懂风水的人说:陈伯宣后世儿孙一定兴旺发达。

陈伯宣下传五代,人丁果然兴旺起来。他的分支数世同居,大家讲究孝道和义气,相处非常和睦,唐僖宗(公元874—888年在位)时,被旌表为“义门”,这便是“江州义门陈氏”的来历。

伯宣下传八世,有位叫陈崇的,官至御史大夫。这时,“江州义门陈氏”已有700多人聚族而居,为使内外和同,“子孙无间言而守义范”,陈崇亲自订了33条家法,把家庭成员的言行都规范在内,让全家族共同遵守。

他们建起书堂,聘请有名望的老师教育子弟。同乡的许多异姓子弟也跟他们一起学习,受陈氏德行的感化,乡间风气越来越好。公元962年,宋太祖赵匡胤亲自写了“义门陈氏”四个大字的匾额挂在陈氏的大门上,并赐给御书三十多卷,上书“真良家”,又赐给他们十二个字,作为家世传承排序之用。到了公元984年,义门陈氏已是十世同居,人口2000多人。政府免除了他们的杂税杂役,授族长为文林郎、太长卿、奉礼郎。宋太宗亲自作诗赐给他们,诗文是:

水阁山斋架碧虚,亭台华表耀门闾。  
祖宗泽衍插纓第,子弟风承孝义庐。  
是聚壁奎常焕彩,花联棣萼每添辉。  
颍川郡派传千古,芳震江州绍有虞。

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朝廷重新旌表义门“锦屏堂”三个字,给他们置锦屏一座。宋真宗命史官将“义门陈氏”家法抄写多份,王公以上每家一本,让他们教育家人学习陈氏孝义家风。

宋仁宗时“义门陈氏”聚族而居者已达三千人。仁宗赐给陈氏门联一副:

三千门内同居次,五百年前共造家。

仁宗还赐堂联一副:

庄分七十二州郡人间第一, 义聚三千九百口天下无双。

人丁兴旺,但田宅却难以扩展,生活上遇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解决困难,他们曾分迁部分人口去四川,但不久这些人又都回来了。

这时,义门陈氏聚族而居者有3900多人,先后登科中举的403人,在朝大臣18人,担任刺史、司马、参军、县令的290人。

嘉佑七年(公元1062年),大臣文彦博等人联名上书,指出义门陈氏所聚人口太多,在朝野势力太大。于是,宋仁宗指令州郡官员奉旨监视陈氏分家。

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陈氏族老一起,将陈门产业分成大小 270 余庄,另又奉旨买田宅 80 余庄,共约 360 庄。由陈门各派系分别抽签,以分定迁居的去向和产业。所分 360 庄遍布大半个中国,所以后来有“天下陈氏出江州”的说法。迁至江苏的地方有:苏州、扬州、镇江、南京、徐州等地。

明朝初年,朱元璋在苏州实行“丁二抽一”,一户有两个男丁必须迁一个到苏北里下河水乡垦荒种田。曹家庄陈氏便是那时从苏州阊门迁徙到海安疇口的。

曹家庄陈氏又是何时从疇口迁至曹家庄的?因家谱和祖先牌位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毁了,我们去疇口查访,又因年代久远,已无法考查。

陈氏在曹家庄的世系字次是:家、有、鸿、升、晋、善、志、德(生)、守、慈(曹家庄陈氏将“慈”写为“其”,疇口陈氏写为“心”。我们认为写为“慈”较为恰当)。

陈德银家中保存有一块陈氏的砖雕墓碑,上书“大清太学生先考陈公有德之墓”。这可以说明陈氏的第二代已经埋葬在曹家庄。据此推断:陈氏迁居曹家庄至少也有 300 多年历史了,这当在清朝康熙年间。

陈氏从汉末的陈寔父子起,并“以耕读持家”,千百年来,陈氏一直是书香门第,有史可查,颍川陈氏先后共出了六个状元。迁至苏州的一支,还出了一个状元——陈初哲(公元 1751 年-1796 年),精通满文,曾参与校对“四库全书”。迁居曹家庄的陈氏,延续了陈氏书香门第的风范,在曹家庄河南开辟了一片风水地。有纸垛、墨垛、笔垛、砚垛,还有笔架垛。苍天之下,碧水之中,一片文房四宝呈现其中,这不仅显示了陈氏是书香门第,更是企求后代以读书修身养性为本,求取功名。

偏居水乡的陈氏,在清朝出了几位太学生、举人、秀才,实属不易。现代又出了多位教授、学者、作家、高级工程师、医师、律师、中小学教师。

在战争年代,为了求生存,我的做塾师的伯父将我们老五房“德”字的弟兄,都改为“生”字,我的堂大哥陈霖生曾就读于西南联大,1947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是台湾一家电视台的台长,唱遍全国的《一剪梅》的词就是他写的。他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是大学教授。我的堂二哥陈霖生和二嫂,都是老高级工程师,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大儿子陈驰出了 10 多部长篇小说,是国家一级作家,大孙女陈欣瑶,是北京大学的文学博士生。我本人是中学高级教师,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出版了 250 万字的著作。我的儿子 21 岁本科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市政府工作,也是廉洁奉公。

前面提到的堂叔陈志瑞,解放后一直在金融部门做领导工作,几十年来,直到去年去世,都没听说他贪污过一分钱。这些年去世的几位堂叔,都是国家干部,都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读书上进,为政清廉,所有这些,追根溯源,都与老祖宗陈寔写的那篇祖训有关。

陈氏祖训、陈氏家风,已经传承了 1800 多年。我编写家谱时,还将这篇祖训收录在内,希望它继续传承下去。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 联吟通州

陶国良

在全区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中,我们发现并收录了一大批很有知名度和历史文化价值的地名。每个地名都有一个精彩感人的故事。现将部分地名辑成对联,以飨读者。

卞里庙 阩家庵	凤凰地 麒麟桥	黑鹿灶 白衣庵	龙潭口 鹤颈弯	奈无港 夹裆桥
必觉镇 定兴桥	蕃瓜巷 芙蓉桥	花园地 丹房村	龙门埭 天王桥	排河观 <sup>④</sup> 通明宫
船帮巷 塌水桥	关帝庙 观音堂	海洼荡 野门堂	凉棚镇 温家桥	螳螂港 虾蟆庄
丁涧店 金家庄	桂花弄 葫芦环	进鲜港 运盐河	老木厂 新圩村	青云巷 玉带桥
横马路 竖石河	枸杞坝 茨菇头	九圩港 八字桥	灵芝坝 凤仙村	缺口路 尖子田
大撇港 小墩桥	缸井井 巴掌桥	夹江路 料子桥	行根里 <sup>②</sup> 竹栅桥	轿子巷 瓦屋园
洞坝口 斜河头	歌腔巷 戏台墩	姜家渡 何园桥	磨框镇 <sup>③</sup> 扇子桥	千步巷 尺八桥
掉车柄 <sup>①</sup> 摇手弯	广慧寺 万愿楼	芦芽嘴 藕花池	马躺路 牛车桥	千禧苑 万岁宫



三里镇	团结巷	兴隆灶	骑岸掌印	十八里河口
五甲直	胜利桥	永盛村	李港捕鱼	四万步田庄
二总渡	弯头镇	盐仓路	老河口站	教场河边巷
七房村	长河滩	米市桥	新三门闸	锁壳房子庄
三角渡	为民弄	辕门弄	太平大队	新世纪大道
四化桥	广济桥	口字桥	安康小区	老河房小街
三合口	文博路	元帅庙	海边海晏	东西五里庙
四丫桥	景泰桥	魁星楼	江岸江平	南北两山佛
十匡埭	蚊子港	羊子角	裤子港闸 <sup>⑥</sup>	金南地藏庙
一门闸	丝瓜桥	牛坝头	落水鬼桥	五接天后宫
上河口	乌龟地	越江路	西亭旧场 <sup>⑦</sup>	老人坝土坝
下爬桥	黑鱼沙	渡海亭	东社新街	新三园菜园
双龙坝	五马路	转河尾	麻虾子榨	五甲二门荡
叠石桥	三姓街	虹桥头	黄猫儿桥	三余一社村
松苗坝	新市巷	紫薇观	东社西社	古沙八景美
柏树墩	老正街	天竺山	南兴北兴	石渚二公贤
四总庙	夏四店	新地新灶	三总路站	运盐河柳影
八角亭	袁三圩	老圩老墩	六姑娘桥	香光寺钟声
太阳殿	香山殿	六圩土坝	东西三十里	余北北潭口
翠微楼	淮提庵	八总洋桥	南北二川门	袁南海海村
唐灶港	西禅寺	虹西垂钓	新坝高沙土	城南通吕大道
季家园	东祭坛	进东担鲜	老墩小圩塘	镇中建设旺街
同心灶	小闸口	陈家酒店	余西大悲殿	李港横港川港
协力村	大石桥	季埠木行	金沙延寿庵	潘圩范圩保圩
耒耜路	斜路口	五总埠子	无梁土地庙	新九门闸海口
畚箕环	犁头尖	二甲坝头 <sup>⑤</sup>	有柱斗香台	老十八总岸头

十分头有上下 三十里坐东西	遥望港边遥望哨 团结河口团结闸	于家坝汤家坝兄弟坝 师范桥模范桥姊妹桥
连岛大桥贯南北 鱼湾水道说古今	江中瑰宝开沙岛 海滨福地通州湾	金沙金乐金余金石港 银树银河银杏银刘桥
南山湖畔南山寺 翠园路头翠园桥	陈墩陈埭陈良坝 顾灶顾园顾高桥	四港四安四总四十里 双墩双闸双坝双皮桥
古沙古镇古江口 南海南山南布洲	大乐齐乐永乐同乐 合丰后丰新丰庆丰	新坝新生新华金大地 通扬通吕通榆古运河

## 注：

- ①掉,有回、转义,如掉头、掉车、掉络子等。
- ②行,为名词,普通话读为 háng。
- ③磨,为名词,普通话读为 mò。
- ④观,道教场所,普通话读为 guàn。
- ⑤头,当地方言读阳平调,普通话读为 tóu。
- ⑥闸,中古音为阳入调,此处为仄声。
- ⑦场,普通话读为 chǎng 此处为仄声。

# 买碗“买”出一首诗

王其银

前不久,在一位喜欢收藏的朋友那儿看见橱柜上有只碗,黑不溜秋的泛着青花,朋友见我目光所及便拿过来告诉我:这是明代的,有点残。

接过碗一打量,碗四周有画有字,画是泛舟水上的人物,像是“草船借箭”图;字有数行,写得潦草,只约略认得一两个;托在手上一敲,叮叮当当,有如铜罄之声。心想这碗上的画可涂抹,字却不太好模仿,再听这声音应该是个老东西。问了价钱,还个价便买下了。

到家后,仔细辨读碗上的字(见图一),不太好认。几经折腾总算认出几个,比如“有”啦、“鱼”啦,还有“无人载”啦等,但读起来总觉得不成句式。接着搬出字典、诗词名句集来查,还是没头绪。再看碗上的画,三个人坐在船上,一人在船尾执篙,像是泛舟中流;远处有山,天上有云有月亮,好像还有鸟儿飞过,细想想又不像是“草船借箭”,因为“草船借箭”总得在船上画几个草人……

正无可奈何,儿子回来了,见我拿着个大碗便问我淘到什么宝贝。我说:“宝贝不是宝贝,但这上面的字能读出来就好了。”儿子接过碗,左看右看,也读不成句。放下碗他掏出手机

摆弄一番,说碗上的字像是两句诗,并用手指着碗上的字读出:“有客得鱼临赤壁,无人载酒出黄州。”我一听,再一看,觉得还像回事,便问他怎么查的。他说:“我把认得的‘无人载’几个字输进去,一查查到扬州有个人买了把壶,壶上也刻了这几个字——那是首诗,你看……”



图一

我接过手机仔细端详，机屏上果然有个没嘴没把的壶，壶身上清晰地显着一首诗(见图二)：

五百年前续此游，水光依旧接天浮。  
徘徊今夜东山月，恍勿当年壬戌秋。  
有客得鱼古赤壁，无人载酒出黄州。  
吟成一浦千山寂，孤雀横江掠小舟。

壶的另一面则画的是“东坡夜游赤壁图”(见图三)。藏壶者在图片上下还附了些文字，说壶是民窑的东西，“普品，残器，年份倒还老，身材也不错，喜欢它的诗情画意”，并说自己“一直在找这把壶上题诗的出处，但没找到”，也就是说不知道诗的作者是谁，但从多方面搜索找到的几首都是题在瓷器上的，个别字有出入，应是画瓷匠人笔误或讹传所致。显然此诗当时很流行。发帖人还列出有差异的几首诗，其中有：

(1)“五百年前续此游，水光依旧接天浮，徘徊今夜东山月，仿佛当年壬戌秋，有客得鱼赞赤壁，无人载酒出黄州，吟成一浦千山寂，孤雀横江掠小舟。”

(2)“五百年前续此游，水光依旧接天浮。徘徊今夜东山月，仿佛当年壬戌秋。有客得鱼临赤壁，无人载酒方黄州。吟成一浦千山寂，孤鹤横江掠小舟。”

(3)“五百年前续此游，水池依旧接天浮。徘徊今夜东山月，循纒当年壬戌秋。有客得鱼临赤壁，无人载酒出黄州。吟成一涌千山寂，孤鹤横江掠小舟。”

认真推敲这几首有出入的诗，觉得“容”字为“客”字所误，“恍勿”应为“仿佛”，“涌”为“浦”字误，“雀”字应为“鹤”字，其中第二首错讹最少，最接近原作者的诗句，只是“无人载酒方黄州”应为“无人载酒出黄州”。因为苏东坡曾贬任黄州团练副使，有《初到黄州》、《别黄州》等诗行世，故“出”与上句“临”刚好相对。这样看来，比较准确的全诗应为：

五百年前续此游，水光依旧接天浮。  
徘徊今夜东山月，仿佛当年壬戌秋。  
有客得鱼临赤壁，无人载酒出黄州。  
吟成一浦千山寂，孤鹤横江掠小舟。

那么诗题和诗的作者是谁呢？查来查去，仍无结果。苏东坡夜游赤壁为宋神宗元丰壬戌年(1082)，500年后是个概数，大致可推为明万历到天启年间(1582-1621)，是哪位诗人在月色中游赤壁写出这样充满怀古之意且脍炙人口的诗句呢？古代交通不



图二



图三

便,诗句刊行也不像今天这样迅捷,比较大的可能是有条件夜游赤壁的诗人游了之后写出诗句,刻在什么地方,受人推崇,然后再在瓷器上流行的。

可猜测总归是猜测,必须有实证才行。过了许多日子,与一位吴姓朋友闲聊谈起这诗,他也感到惊讶,怎么会有好诗句查不到作者的呢?遂自告奋勇再查,一查查出个名朱宗恂的明末秀才曾在“赤壁夜游端砚”上铭刻此诗,诗句全文与前面推测的“比较准确的”完全一致,且在最后落款:“甲寅冬日,宗恂。”另有印文“宗恂”。该端砚随形巧作“赤壁夜游图”,且镌刻上述铭文诗,具“甲寅冬日,宗恂”款,还有印文,应该是朱宗恂使用把玩的文房用品。如无新的发现,似可推测为朱宗恂写的这首诗,诗题即“赤壁夜游”。那么为什么瓷器上留有这首诗的时候不标作者的名字呢,原来这里面与满清入关后滥施暴政有关。查“甲寅”明末清初有 1614 或 1674 年,清兵 1644 年入关,完全占据北方后开始南下,沿途遭到明末将士和遗老遗少的抵抗,清兵除大举屠杀抵抗者外,开始在意志上挫折汉人的心态,推行“留发不留头”的高压政策,而嘉定娄东人朱宗恂正是“以留发故”被清兵“梟首东门”的。既因抗清复明被诛杀,他的诗句自然无人敢标明出处了。

至此,似乎可以推论,朱宗恂 1614 年冬天在随形砚上刻了该诗,清兵南下时流露出保明抗清的形迹而惨遭不幸,此后他的义举或许被一些人称颂,其诗句被写在瓷器上,但却无人敢标明是他的诗了。

官窑东坡夜游赤壁瓷器(见图四)令人向往,民窑也有好东西,扬州那位朋友淘的残器就很珍惜,我这只碗有朱宗恂的两句诗,有夜游赤壁图且大致完好,也值得把玩保存了。

令人哑然失笑的是,朱宗恂被梟首,清代官窑、民窑仍有艺人敢写他的诗,这说明“天高皇帝远”,总有顾及不到的地方……



图四

(通讯地址:海安县委宣传部 邮编:226600 电话:13485153240)

# 为贾佩峰民间文学笔记选本写的总跋

尤世玮

《南通故俗》是“贾佩峰民间文学笔记选本”的第四部，它的出版，为这套“选本”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凡是仔细阅读过这套著作的人，肯定都会由衷地敬佩收集整理和研究著作者：贾老以八十高龄，花费了比常人要多得多的精力，系统地整理了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他通过田野作业获得的五千余件民间文学资料；而且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所涉及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以及相关的民俗事象和口头表现形式追根溯源，旁征博引，并上升到学术的高度条分缕析，编就这套内容丰富、学理性颇强的民间文学笔记选本，为南通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拜读贾老编著的这套“笔记选本”，心中豁然开朗，它的鲜明特色，跃然纸上。

从民间发现，用文化进行解读。贾老是山东人氏，上世纪五十年代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初来南通时，南通话一句也听不懂。但是他凭着对民间文化的赤诚和热爱，几十年来入乡问俗、入乡随俗、入乡记俗、入乡研俗、入乡传俗，成为一位比南通人更了解南通民间文化的外乡人。以《南通故俗》为例，他开宗明义：“说的是南通历史的行为风俗，展现的是江海平原文化底蕴的丰厚。”“风俗是一种意识形态，对地方发展有推动；它是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看出社会的变化。”大家知道，南通的地域文化是江海文化。由于它形成的物质基础——地域是逐步形成的，再加上文化的主体——人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因此构成了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民间文学作为母体的生成物，其“母体”——江海文化是它生前的肥田沃土；同时，它与其它的文化形态又共同组成了十大精深的“母体”。多元、多样性必然产生差异，差异才更体现丰富。虽说同样是“婚俗”，崇川的言传婚俗与通东地区歌咏婚俗的同异，归结到根本上是地域文化的差异。把握了这个关键，贾老便能从内容、形式到语言、结构诸方面进行很好的对比和区分，并且从文化根源上找到答案。这样的分析归类，涉及民间文学的本质，自然比“捡进篮子就是菜”、单纯罗列介绍的效果要好得多。同时，也较好地说明了“风俗从根本上是动态的，是与时俱进的”道理。

从本地实际出发，用比较凸显特点。贾老的一大功绩，是在前人采集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有所发现，渐入化境。他整理出的民间长篇叙事诗《红娘子》就是一例。吴

语地区的民间长篇叙事诗,虽然长期以来在民间广泛流传,但很少被录之于文字,供广大读者讽吟和传诵;近代即使有,也多被删改,变成唱本形式,不再是民间的“原生态”了。贾老作为有心的收集者,他从在狼山疗养时听到歌手陈状姑娘唱山歌,便一而再,再而三,先后一百多次深入挖掘,以后又通过如东缪二银等其它途径进行补充,广泛收集《红娘子》的素材;作为认真的整理者,他忠实于记录,反复对比,去粗取精,合理组合,使之完整且合乎情理。同时如同加以注释,他把不同版本对照后没录用的内容仍妥善保存,便于研究者参考,态度十分严谨。因此,《红娘子》这首广泛流传在南通地区的长歌,无论在内容、结构上还是在形式、表现方法上都给人带来了一种新鲜的信息,并在不少地方表现得相当奇特。这是由红娘子这个传奇人物自身的特点(思想高尚、心地坦荡、光明磊落、敢于抗争等)决定的,也是由南通地域特点(濒江临海、开拓开放等)决定的。再通过与吴语地区其他的民间长歌仔细比较(如《严家私情》、《魏之郎》、《沈土歌》、《五姑娘》等),找出它们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点,追索它们各自的时代依据和地方特点,这样才能够发现《红娘子》的新颖和不凡之处,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和它的自身价值。当然,从中也探索了口头文学创作的可塑性,传播过程中的再创造性与多版本之间关系等有关民间文学带规律性的问题。

从分析归纳入手,用理论统筹提高。现在人们可能存在一种错觉,认为民间文学只要记录下来,稍加整理,保持原汁原味就行了,不需要研究与提高。其实,忠实于民间口头流传,用文字等形式保持原汁原味当然重要,这是对口口相传的传承人的尊重,也是民间文学永葆生命力所在。但是,记录和整理都应是理性的,应当遵循自身规律,进行科学筛选和展现;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归纳,深入研究,用学理攫取精华,使民间文学上升到学术的层面,其固有的魅力得以进一步显现,从而熠熠生辉。这两者是不能偏废的,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提高,目的都是使这些瑰宝记录一个时代,并能永世流传,为老百姓所喜爱和接受,从中吸收精神营养和社会正能量。

贾老就是这样的有心人,他的认识也是在几十年的实践中逐步提高的。贾老的这套“笔记选本”就是充分体现了这些方面:往往在每一部分开篇之前有题记(或说明);在每一篇文章之后有点评(或述其人其事,或谈编后印象)。这些文字,短小精悍,精彩纷呈,一语中的,都是他精心采编、研读后的心得体会,有的分门别类,精选举例;有的引经据典,加以考证;有的引伸发挥,举一反三;有的提炼精华,画龙点睛;还有的本身就是一篇颇具学术性的论文……他以学者的风范对每一种南通的民间文学样式,诸如民间故事、山歌、号子、俚语、口语、利市、谚语、歇后语、牌儿经、童子书等等,都有切合南通实际的概括和精辟的分析。读着这些文字,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跟随着步入民间文学的百花园,在那里获取真、善、美的熏陶和享受。

这部巨著的编成出版,对广大读者来说,是增加了通过民间文学了解南通历史文化的管道;对贾老来说,是了却多年的心愿,使民间文学“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然而,我更深切地感受到的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贾老的无私奉献的精神。2001年7月13日,贾老曾写信给我,他说:“近年来,我利用离休在家的时间,把手头上的歌谣资料大体梳理了一下,形成了这本《南通歌谣汇编》。”“近闻市文联拟启动‘集成’工

程,并将歌谣纳入其中。如果此事办成,不但对口述者和搜集者是个交待,对南通历史和江东父老是个交待,而且使这批既是东方文化又是地方风俗的民歌有了归宿,有了娘家。”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溢于言表。

几十年来,尤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和本世纪初三次较为集中的民间文艺普查和采购活动,我们南通有一批民文工作者、收集到许多珍贵的资料,其中有一部分由市文联、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整理出版,一部分汇总作为内部资料保存;但还有相当部分保存在当年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手中。他们为这些资料的取得,付出了辛劳,功不可没。然而严格地说,这是一种职务行为,所收集的资料,也应当属于南通而不属于个人。贾老有这种文化自觉,而且通过艰苦努力,终于把这些来自民间的瑰宝经过整理奉还给民间,使之得以流传,这是十分值得称颂的!我在市文联工作期间,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制度不严,举措不力,未能建立完备的文艺档案和一系列配套办法,加上整理出版工作抓得不够紧,以致有些手头保存有资料而又因种种原因未能将其公之于世的同志,在他们“远行”之后,一切也被湮灭,这是何等的可惜!现在反思,这不能不算我工作中的一大失策和遗憾。岁月荏苒,当年抢救遗产的人现在似乎又要有人去“抢救”他们了,从贾老身上,是否应当得到某些启示?

贾老不嫌我浅陋,命我写点读后感想。恭敬不如从命,还是按我的老习惯——有感而发,见笑于方家了。谨此为跋。